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9期 2019年6月

研究論文

- 台灣戒嚴時期的「假新聞」：〈南海血書〉案例
- 中國愛國網紅的民族主義之形成與內涵：
以周小平文章的內容分析為例

研究誌要

- 數位時代的國族認同建構研究：
以學術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Nations and Nationalism 為例

歷史與現場

- 鄰居殺人：波蘭二戰期間耶德瓦布內小鎮的屠猶秘史

書評

- 思想、主義、信仰的後勤支援：
評介德布雷的媒介學與《普通媒介學教程》

學術翻譯

- 道德恐慌下的「他者」：2011~2016 三家英國報紙建構的歐盟移民形象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 年 6 月創刊

半年刊，6、12 月出刊

出版：2019 年 6 月 第九期

主辦機構

媒體改造學社

編輯顧問

卜衛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井迎瑞	台南藝術大學
王春泉	西北大學
王嵩音	中正大學
王毓莉	文化大學
史安斌	清華大學（北京）
吳予敏	深圳大學
呂新雨	華東師範大學
李金銓	香港城市大學
林元輝	政治大學
林東泰	臺灣師範大學
林靜伶	輔仁大學
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學
胡光夏	世新大學
胡泳	北京大學
倪炎元	銘傳大學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
翁秀琪	世新大學
張志安	中山大學（廣州）
張裕亮	南華大學
張錦華	台灣大學
張國良	交通大學（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學（新竹）
陳衛星	中國傳媒大學
單波	武漢大學
曹晉	復旦大學
劉海龍	人民大學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
趙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蕭蘋	中山大學（高雄）

編輯委員會

主編	馮建三	政治大學
編輯委員	林富美	世新大學
	林麗雲	台灣大學
	陳光興	交通大學
	羅世宏	中正大學(執行編輯)
助理編輯	劉忠博	華南理工大學

出版

發行人 媒體改造學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5221499

傳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網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黃勻祺

封面設計 馮議徹

訂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本刊採用創意公有授權條款，如下



目次

編輯室報告：	i
--------	---

一般論文

台灣戒嚴時期的「假新聞」：〈南海血書〉案例.....邱家宜/1	
中國愛國網紅的民族主義之形成與內涵： 以周小平文章的內容分析為例.....劉忠博、陳娟、邵成圓/31	

研究誌要

數位時代的國族認同建構研究： 以學術期刊 <i>National Identities</i> 、 <i>Nations and Nationalism</i> 為例...楊鎬民/63	
---	--

歷史與現場

鄰居殺人：波蘭二戰期間耶德瓦布內小鎮的屠猶秘史.....艾曉明/87	
------------------------------------	--

書評書介

思想、主義、信仰的後勤支援： 評介德布雷的媒介學與《普通媒介學教程》.....唐士哲/123	
---	--

學術翻譯

道德恐慌下的「他者」：2011~2016 三家英國報紙建構的歐盟移民形象童靜蓉、左嵐東著，呂慈芸、黃仁禧譯／羅世宏譯稿校閱 (詳見本期編輯室報告說明)	
---	--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九期
2019 年 6 月

稿約

稿約詳情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編輯室報告： 民族主義／國族認同的形成與建構

本期圍繞民族主義（nationalism）及（或）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等相關主題，匯集了五篇論文（包括兩篇研究論文、一篇研究誌要、一篇歷史與現場，以及一篇學術翻譯論文）。此外，與往期一樣，本期也有一篇深度書評。

邱家宜博士的〈台灣戒嚴時期的「假新聞」：〈南海血書〉案例〉一文，從知識社會學角度重新檢視 1970 年代末期的「南海血書」事件，挖掘當年威權體制黨國宣傳機器如何操作某種「亡國感」的焦慮，意圖透過渲染民間恐共心理來削弱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正當性與社會基礎，力求達到「維穩」之統治目的之歷史過程：權力永遠拒絕真相被解碼，為了政治目的，它可以肆無忌憚地製造人民的同意、共識，或甚至是某種愛國情緒或國族認同。雖然分析的是歷史事件，但對「假新聞」現象成為社會與學術議題的當下，既有反思歷史的意義，也深富觀照現實的意義。

劉忠博教授、陳娟教授與邵成圖博士候選人共同撰寫的〈中國愛國網紅的民族主義之形成與內涵：以周小平文章的內容分析為例〉，以中國大陸「愛國網紅」周小平（批評者謔稱其為「周帶魚」）的網路文章為分析對象，發現其中夾帶某種「愛國網紅民族主義」，而這種特殊品種的民族主義又恰恰是受到官方鼓勵的產出。本文指出，周小平所代表的這種民族主義，是一種「維護既有政權的民族主義」，對內是「護黨愛國」，對外是「反美批日」。這種緊貼黨國權力、鼓吹「正能量」與顯然是內外有別的操作，成為某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網路民族主義。

國族認同建構的研究，在數位時代有何不同？在〈數位時代的國族認同建構研究：以學術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Nations and Nationalism 為例〉一文，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楊錄民分析兩本學術期刊近二十年刊發的研究

論文，希冀探知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的趨勢、特徵及理論發展。他的分析發現，相關研究論文較少對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理論關係進行探討。楊鎔民建議，從文獻中提煉出的若干概念，例如「去地域化」、「虛擬社群／國家」、「網路的文化親密性」、「文化的空間化」與「數位資本主義」，或可對數位時代的國族認同建構研究提供新的考察方向。

第四篇論文－〈鄰居殺人：波蘭二戰期間耶德瓦布內小鎮的屠猶秘史〉－的作者是艾曉明教授，她不僅是中國大陸知名學者，也是享譽國際的獨立紀錄片導演。這篇她在 2018 年花了兩個月閱讀與觀影、隔年又重新修訂的思考與書寫成果裡，艾曉明謙稱這是她「讀楊·T·格羅斯的《鄰人》及相關影片筆記」。說是筆記，但其實已經自成相當完整的體系，本文帶領讀者深入解讀的不僅是歷史與現場，也涉及歷史記憶與紀錄的理論與方法，並延伸至紀錄片影像的對話。

編委會高度推薦讀者艾曉明這篇文章，也推薦讀者觀看她在 2017 年完成的紀錄片【夾邊溝祭事】。與《鄰人》這本書在 2000 年出版時探討的是 60 年前發生的波蘭小鎮猶太人屠殺事件一樣，【夾邊溝祭事】直面發生在 1957 年中國「反右運動」期間發生的人權迫害慘劇：夾邊溝是甘肅酒泉附近的一個勞改農場。1957 年有多達 3 千名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被送到夾邊溝勞改，在生存條件極度惡劣的情況下被迫從事密集勞動，最終紛紛在飢寒交迫的非人待遇下死亡，倖存者只剩下 300 人左右。

經過 60 年的緘默，當年倖存的夾邊溝受難者目前已是寥寥可數。5 年前的清明節前後，艾曉明在偶然的機緣下前往夾邊溝農場祭拜當年死去的受難者。其後，艾曉明克服各種阻撓，幾度走訪夾邊溝及附近的幾個勞改農場，並在各地訪問了倖存受難者和受難者家屬，留下了珍貴的影像紀錄。可惜的是，多位受訪的老人來不及看到最後完成的紀錄片即已陸續辭世，而迄今能看到這部片子的大陸民眾可能也很有限：不僅百度上難以搜到【夾邊溝祭事】的超連結，相關頁面也很快就被刪除。

50 歲以後才開始邊學邊拍紀錄片的艾曉明，用這部紀錄片祭奠歷史苦難，是為了不遺忘。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下，記憶就代表著一種反抗，因為極權的鞏固與張狂，正是從人們的遺忘開始的。

而過去幾年來發生在歐洲的敘利亞難民危機，以及大量移民跨越疆界湧入歐洲的現象，也觸發了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媒體和民眾的多重反應，排外／仇外、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方興未艾；媒體如何再現移民形象，厥為關鍵因素之一。為了洞察媒體如何建構歐盟移民形象，本期原另擬刊登童靜蓉教授與左嵐東合撰的〈道德恐慌下的「他者」：2011~2016 三家英國報紙建構的歐盟移民形象〉一文，這篇原以英文發表，經作者同意由呂慈芸、黃仁禧譯為中文的論文，因為英文期刊出版商的版權政策，我們無法將中譯版公開上網；對本篇論文中譯版有興趣的讀者，歡迎主動與本刊編委會聯繫。

最後，讀者也千萬不要錯過本期的深度書評。唐士哲教授以〈思想、主義、信仰的後勤支援：評介德布雷的媒介學與《普通媒介學教程》〉為題，不僅介紹法國媒介學大家德布雷（Régis Debray）其人其事，更深入解讀了他的思想軌跡和《普通媒介學教程》一書，讀後應有不同於、或甚至是超越主流傳播理論思維框架的知識啟發。

《傳播、文化與政治》編輯委員會

2019 年 6 月 23 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九期
2019 年 6 月

台灣戒嚴時期的「假新聞」： 〈南海血書〉案例

邱家宜*

本文引用格式

邱家宜（2019）。〈台灣戒嚴時期的「假新聞」：〈南海血書〉案例〉。《傳播、文化與政治》，9:1-30。

投稿日期：2018 年 8 月 29 日；通過日期：2018 年 12 月 6 日。

* 作者邱家宜為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e-mail: eve59chiu@gmail.com。

《摘要》

1978 年 12 月 19 日《中央日報》副刊刊載據稱為逃離南越途中罹難難民阮天仇絕筆信的〈南海血書〉，該信事後證明為署名譯者的朱桂所虛構，當時正逢台灣政治反對運動興起，〈南海血書〉問世，透過媒體、學校、機關全面推廣閱讀，「今天不做反共鬥士、明天成為海上難民」成為當時流行的政治宣傳口號。執政者透過「血書」內容，成功將南越陷共與陷共前南越人民對阮文紹政府的反對與抗爭連結在一起，明確影射當時正在迅速發展中的台灣政治反對運動將會導致與南越相同後果，透過民間恐共心理，意欲削弱仍處於萌芽階段之政治反對運動的正當性與社會基礎，力求維持國府政權穩固。針對這個台灣當代新聞史上有名的「假新聞」事件，本論文將從知識社會學角度，探討當年黨國文宣體制的綿密運作，如何運用國內外情勢與社會集體心理焦慮，以虛構的故事為引爆點，操作出掀動整個社會的風潮，塑造成如假包換的「社會真實」。

關鍵詞：王昇、朱桂、社會真實、南海血書、假新聞

壹、前言

「假新聞」(fake news) 這個字眼最近幾年非常火紅，由於一些研究者指出，刻意製造、迅速散佈於網路的不實消息，影響了幾場西方民主國家的重要選舉結果，尤其是 2016 年希拉瑞·柯林頓與唐納·川普的競選結果，被認為足以影響美國總統選舉結果，使假新聞問題頓受全球熱議。網際網路可以瞬間跨國流動，去中心化的訊息產出特性，似乎使得越是訊息自由的地區，越容易受到假新聞的侵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些網際網路被嚴密監控的地區（中國、朝鮮）在政府的屏蔽與控管下，雖不像自由民主國家那樣，受到來自境內或境外（例如俄羅斯、馬其頓 Veles 小鎮）的假新聞攻擊（Subramanian, 2017, February 15），但控制訊息流通的政府往往本身就在系統性的製造假新聞。

其實所謂「新出現」的現象，未必真的那麼新。當我們稍微回顧過去，會發現「假新聞」並非起自今朝，而是有其淵遠流長歷史（羅世宏，2018，頁 53-54）。國家或當權者集中化、系統性製造假訊息來控制人民、穩固統治的歷史階段並未完全過去；在全球化的網路鏈結基礎上，著眼於國際對抗或個體牟利動機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 虛假訊息的產製與傳播又方興未艾。從知識社會學角度考察，大眾傳播媒體做為傳遞資訊與形塑公眾認知的重要機制，為近世人類歷史上顯著現象。政治史家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即指出，十九世紀以降的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大眾傳播媒體的關係密切（Anderson, 1983）。看似每天內容翻新的新聞媒體，其實扮演不斷重複提醒其讀者對國族界線、社會群我關係、自我認同歸屬的參考框架，甚至在社會因衝突紛擾而出現整合認同危機時，發揮修補裂痕、再整合的功能。

傳播理論家凱瑞（James Carey）則跳脫上述的涂爾幹式（Durkheimian）功能論觀點，雖然同樣強調媒介的儀式性，但卻是從掌握權力者即掌握媒體話語權的批判性角度來審視媒介的儀式性（Carey, 2009, pp. 15-17）。從凱瑞的觀點出發，掌握權力者所具有的話語權，包括對所要散布傳遞之訊息的篩

選、詮釋，甚至製造。當權力高度集中，訊息傳遞的方向就會從權力集中的一端流向另一端，1978 年年底到 1979 年間發生在台灣의「南海血書事件」，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貳、「南海血書」的出現及其背景

一、「血書」的出現與社會迴響

1978 年 12 月 16 日，美國卡特政府宣布 1979 年 1 月 1 日起將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當時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隨即發表聲明譴責美國，宣布台美外交關係中斷，並立刻停止當時正熱烈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競選活動。¹三天後的 12 月 19 日，《中央日報》副刊刊出一篇文長三千多，名為〈南海血書〉的文字，這篇署名「阮天仇絕筆（朱桂譯）」的「血書」，描述一群南越難民漂流荒島、食飲難友血肉後飢渴而死，最後一人死前以鮮血在襯衫上書寫，留下恨極共產黨統治，並痛斥南越陷共前其境內反政府運動，及執政者仰賴美國卻終遭「偉大盟邦」背棄的這封「血書」。

此「血書」後來被證實是一文學性虛構文字，但在當時台灣社會，大多數人卻以其為真實，並掀起席捲全島的風潮。除《中央日報》在 1979 年 1 月 10 日開始發行單行本，隨即不斷再版重印。當時台灣的各級學校均「自動自發」要求學生閱讀該「血書」，並以撰寫心得（朱復良，1979 年 1 月 9 日；〈各校紛以「南海血書」作為愛國教材教育廳認意義重大〉，1979 年 1 月 12 日），改編成舞台劇演出（嵇若昕，1981 年 4 月 27 日；〈復興高中禮堂 今明公演話劇〉，1979 年 10 月 28 日）等種種方式來推廣。透過學校體系大力操作推動，大多數於 1960 年代在台灣出生成長、受教育的人，對這封「血

¹ 當時的中央民代選舉並非改選立法院全部的委員成為另一屆次，而是基於維護中華民國主權及於中國大陸地區的「法統」，仍繼續 1948 年的屆次，稱第一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增補選，保留中國大陸其他各省立委席次（去世者由候補者遞補至無人可遞補為止），只「增補選」台灣地區立委名額。該次選舉為第三次增補選，因台美斷交以及隔年的美麗島事件，而一直延後到將近兩年後的 1980 年 12 月 6 日才舉行。

書」都印象深刻。直到 20 多年後，當 2001 年 9 月 3 日【民視異言堂】節目播出「南海血書」、「南海神話」兩個單元時，²許多小時候曾經撰寫閱讀心得的台灣觀眾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這封「血書」竟然是虛構的，「血書」的作者「阮天仇」，其實根本不存在。

雖然早在 1979 年 6 月，當時擔任台北縣蘆洲國中教師，後來成為民進黨重要理論家的林濁水，就已經在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創刊號上，對「血書」的真實性提出犀利質疑（林濁水，1979），但或因黨外雜誌流通受限，在當時並未影響「血書」在台灣社會中如火如荼的散佈。

林濁水在這篇〈拙劣的南海寓言——剖析「南海血書」的真相〉中，判斷「血書」為虛構的幾個證據包括：在飢渴中苦撐四十二天的臨終之人，竟能以螺絲尖這種不吸水物體沾血在不易書寫的襯衫上完成三千字長篇？越文為拼音文字，所需書寫面積比中文更多，寫成此篇內容恐需十件襯衫面積，要用鮮血在髒污的襯衫上如此書寫，會用掉多少血，一個瀕死者會有如此多的己身鮮血可用於書寫嗎？「血書」中對 1959-1963 年間越南總理吳廷琰當政時期南越社會物質條件的描寫與事實不符，倒像是對當時台灣社會歷史經驗的描述，顯然是要以反對吳廷琰獨裁的南越「民主鬥士」等「野心份子」，來影射台灣當時正在興起的黨外反對運動，明顯「指桑罵槐」（頁 46）。除了「血書」附記中所提到的「血衫」這個重要證物，在舉國閱讀「血書」的風潮中，始終未曾出現；林濁水還發現，「血書」中竟然出現跟許信良在「中壢事件」（詳見後文）後所說的：「我們真像他們說的『永遠只有十三歲』」一模一樣的句子。種種巧合，都證明這封神秘「血書」事實上是「要寫給台灣一千七百萬人民看的！」（林濁水，1979，頁 47）。

該文對於「阮天仇」所形容，讓其痛恨到能「活著咬他一口，死也甘心。」的「偉大盟邦」的描述，也做了如下詮釋：

因為國民黨散佈謠言說美國人用美鈔資助黨外人士競選，所以阮天仇就說：不要讓「盟邦」「以大使館為司令台和庇護所，運用大把鈔

² 【民視異言堂】從 1998 年 8 月推出以來，一直是民視最重要新聞性節目之一。本文所引述的兩個單元，是由民視記者高人傑、李惠仁所製作。

票，收買野心份子。到處製造事端。」…甚至於以激動的情緒說：「我們的政府行政效率是有點顛預，官吏難免貪汙，人民不像傳說中的美國那麼自由，但絕大多數的越南人民生活仍能在安定中逐漸進步。只是野心份子極少升官發財機會。」（林濁水，1979，頁 48）

林濁水認為，綜觀「南海血書」通篇，控訴越共還在其次，最主要的論罪矛頭是指向「民主鬥士」與「偉大盟邦」。「血書」的寓意是：既然南越殷鑑不遠，台灣自救之路就很明白了。只要打倒「民主鬥士」（其實就是黨外人士），打倒「盟邦」（美國），就一切都解決了（林濁水，1979，頁 49）。林濁水認為，〈南海血書〉最大的目標，是醜化黨外人士。

二、作者朱桂的證言

如果說林濁水 1979 年 6 月發表的這篇文章是對〈南海血書〉真實性的質疑，那 2001 年 9 月 3 日【民視異言堂】播出的「南海血書」、「南海神話」兩個單元，就是對〈南海血書〉歷史之謎的真相還原。這兩個單元的內容後來被剪輯成紀錄片【1979 南海神話】，並獲得 2001 年台灣的「90 年度文建會紀錄影帶獎」佳作獎。

2001 年距離台灣解除戒嚴（1987 年）已經十四年，台灣已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但當年這篇深植人心的〈南海血書〉事件依然真相未明。其實說「真相未明」，並不完全正確，因為在「血書」刊出的一年後，《中央副刊》曾經刊出署名「仲父」的短文，以編者身分表示：

「南海血書」像一枚投擲在油海裡的燃燒彈，與愛國家、愛民族的热情相起伏，構成一個悲憤壯烈的偉大場面；去年這幾天，要求轉載翻印的電話不知凡幾，而張貼的壁報還不算。身為編者，為了應付這種感情的浪潮，不能不知道得多些，以便回答四面八方的詢問，於是寫信給朱桂先生，把他由基隆請來。朱桂先生說，「南海血書」是一部小說的書名，已寫好久了，在中副發表的這篇「南海血書」乃那部小

說的最後一章。所根據的資料都是真實的，寫出來的故事、人物、情節，卻是由這些資料綜合起來，再創造出來的典型，所以它的真實性，側重在文藝方面，因為它是文藝創作；不在新聞方面，因為它不是新聞報導…（仲父，1979年12月19日）。

依據這篇短文，《中央副刊》其實已經公開承認〈南海血書〉是「文藝創作」。不過很弔詭的是，中副的說詞前後反覆，或者說已經造就的「社會真實」太難違逆，直到五年多之後，《南海血書》單行本仍繼續販售，在該刊登出的「好書介紹」中，依舊說「血書」是由朱桂翻譯，阮天仇用自己的血寫在襯衫上的絕筆信而成（嘉彬，1984年10月27日），卻完全不提「仲父」在1979年的編者告白。³

根據製作這個專題的民視記者李惠仁回憶，⁴當時他與民視同事高人傑一起調查此事，但只有「朱桂」這個名字是唯一的線索。他們於是把當時北市的電話號碼簿中，所有登記為「朱桂」的電話號碼一一撥打，發現住在虎林街的朱桂，很可能就是他們要找的人。在電話中提出造訪的請求被拒，但兩位積極的記者並不死心，他們跑到朱桂家附近，在市場買了一籃水果，背著攝影器材就直接按鈴求見。

受訪時已經患有帕金森氏症的朱桂，在影片中直接了當的回答記者提問，承認〈南海血書〉是他寫的。說他寫「血書」是「根據當時的情勢」，「那是越南難民所遭遇的，把幾個故事連在一起。」記者問他為何會想到用「阮天仇」這個筆名，朱桂回答：「天怒人怨啊！越南人姓阮的多啊！」（高人傑、

³ 「中央副刊」在「血書」問世一年後刊登這篇短文，顯示當時對「血書」真偽確實存在爭議。但此「告白」動作顯然並未發酵，根據作者以「南海血書」關鍵字檢索《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資料庫發現，直到李惠仁、高人傑的影片問世之前，提到血書為「文藝創作」的，仍然僅有「仲父」此篇。

⁴ 李惠仁後來離開主流電視媒體成為一名獨立記者，2011年以揭發農政單位隱匿禽流感疫情的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I】（2011）獲得卓越新聞獎「電視類調查報導獎」。其他重要的作品包括【睜開左眼】（2009）、【不能戳的秘密II：國家機器】（2013）、【蘋果的滋味】（2015）、【并：控制】（2018）等。2018年獲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頒發「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是一位優秀的調查記者。此處所引述內容，為李惠仁本人親自口述。

李惠仁，2001，08:55 - 09:33）當事人現身說法，歷史謎團終於解開。

1979 年 7 月，也就是「南海血書」問世後 8 個月，朱桂出版了他的文集《歷史圈外》，在這本寫實與虛構並置的文集最後，饒有寓意的，以附錄的方式收錄了這篇〈南海血書〉。對照刊登於「中央副刊」的版本，這篇附錄文字雖在文末仍保留「阮天仇絕筆」字樣，但並未如在中副刊登時標明為「朱桂譯」。兩者間的不同還在於，中副版本最後的「譯者附記」，並未出現在文集版本中。「譯者附記」是這樣寫的：

內弟有一天到南海打魚，在一個荒島上發現十三具屍骨，和一堆大海螺壳，這份血書就裝在該海螺壳裏。字跡模糊，我只將其大意揣摩著翻譯出來。際此美國對我背信毀約，與共匪偽政權搞「關係正常化」，越南人民的血淚未止，卡特政府今後勢必更難以取信於任何自由國家了。

如果這段「附記」並不是朱桂所寫（證據是前述附錄文字並未收入），應可合理假設為中副編輯所加。

僅僅一百多字，這個「附記」卻成功的把一篇文學作品偽裝為紀實文獻，將朱桂由作者變成譯者，將「血書」由虛構變成真人真事。雖然朱桂在個人文集收錄〈南海血書〉時，將「譯者附記」拿掉，等於間接否認此「附記」是他的作品，而將「血書」還原為文學寫作。但在此之前的 1979 年 5 月間，他仍一度對外表示，自己保留有據以完成「血書」的難民遺物，並批評以「血書」為題材的電影拍得太爛（〈大好題材被人粗亂拍 南海血書作者表惋惜〉，1979 年 5 月 15 日）。不論他當時是依照計畫，或者配合局勢發展演出，可以確定的是，雖然「血書」的真實性已被質疑，但在 1979 年底「仲父」的文章出現之前，主事者的規劃顯然是要將「血書」操作為一個真實文件。

「阮天仇」是虛構的，但朱桂則真實生存於近代的中國及台灣。根據國史館檔案所保存的一份，包含由朱桂本人所填寫之自述的〈總統府人事調查表〉記載（〈朱桂〉，國史館藏），朱桂於 1921 年（民國 10 年）出生於甘肅省平涼縣，1941 年 8 月加入國民黨，1943 年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該年

9月進入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地方自治科就讀。

原為國民黨黨校的中央幹部學校與中央政治學校，於1946年合併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根據政大官網上的校史資料，中央幹部學校系創立於1944年，較朱桂在資料表中所填寫的1943年還要晚一年。但政大官網亦記載：「中央幹部學校的創立，緣於民國三十二年，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通過的。在此之前，三民主義青年團曾設立青年幹部訓練班於武昌珞珈山，是為中央幹校的前身。」因此，朱桂應是在訓練班時期進入該校。朱桂就讀中央幹部學校期間，蔣經國是中央幹部學校的教育長，校長則是蔣中正（茅家琦，2003，頁111）。1946年7月畢業後「復於廬山參加夏令營，並一度從軍」。⁵從其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廬山夏令營的學、經歷可以看出，朱桂的背景可說是血統純正的蔣氏父子子弟兵。

因此，雖然無法確定朱桂登在「中央副刊」的這篇「血書」，究竟是自發性投稿，還是受邀而作，可以確定的是，朱桂當時的身分雖然是一名教師，不是軍人也不是政府官員，但他過去曾跟隨蔣經國辦事，在總統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長室」的人事檔案中，存有他的個人資料。由這些線索看來，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所培養的朱桂，後來會成為「血書」的「地下作者」，似乎並非偶然。而「血書」的出現，只是整個國府政戰系統，在面對當時台灣劇烈變動的內外政治社會情勢，為穩固政權所採取的全面文宣策略的一環。

⁵ 從現藏國史館的該筆資料看來，朱桂從1947年8月開始在上海擔任中學教師（私立正誼中學），並在1949年1月到台灣的員林中學教書，因此他所說的「一度從軍」，應該只有1946年到1947年間。根據【1979南海神話】影片中旁白敘述（09:40處），以及李惠仁的轉述，朱桂受訪時曾對記者談到，自己年輕時曾經追隨當時擔任贛南行署專員的蔣經國，在江西「打老虎」，不過此說應該存疑。因為如果此一說法屬實，只可能是他在重慶中央幹校就讀時，就曾經前往江西協助過當時擔任中央幹校教育長的蔣經國（當時蔣經國經常往返於贛南與重慶間），因為蔣經國在1945年二月間，朱桂從中央幹校畢業之前，就已經奉蔣介石之命，離開即將淪陷於日軍之手的贛南，轉往重慶了（茅家琦，2003，頁108-109）。但他與蔣經國的淵源還有另一個線索，根據朱桂在追悼摯友朱延勳的〈我與延勳〉（朱桂，1979，頁65-206）一文中指出，1948年他在上海「參加了上海經濟管制行列」（朱桂，1979，頁194）。當時在上海主持這場與孔宋集團正面衝突之經濟管制的，正是蔣經國（蔣經國，1988，頁45-165）。

三、「內外交迫」下的政治作戰總動員

國府中央遷台後，台灣的在野政治力自 1960《自由中國》雷震案後，沉寂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邱家宜，2011），直到 1970 年代後期，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才又開始浮上檯面。1977 年 11 月 19 日，因桃園縣長選舉過程中國民黨作票，引發支持許信良的大批群眾包圍中壢警分局，並造成一名大學生遭軍警射擊死亡，是為「中壢事件」。「中壢事件」是之前分散各地，尚未組織起來的「黨外」力量集結的開始，黨外力量集結所形成的「類似政黨」，對當時的國民黨政權造成很大壓力（詹嘉雯，2007，頁 113-115）。

1978 年的台灣，除了內部政治反對力量逐漸成形，國府還要面對的是美國與中國建交的迫在眉睫。「南海血書」會在 1978 年 12 月 16 日美國卡特政府宣布與中國建交的三天後出現報端，並非偶然，可解讀為國府在面對內外情勢下，整體文宣戰的一部分。具體的證據包括：就中美建交與台美斷交前後，也就是〈南海血書〉問世的前後，台灣當時仍在政治力控制下的三家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正在聯播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監製，「中國電影製片廠」製作的【越高淪亡實錄】紀錄片，該紀錄片是蒐集世界各國新聞記者在越南、高棉淪陷前後實地拍攝的影片剪輯製作而成。三台聯合首播時間，在「血書」問世前的 12 月 4 日晚間九點到十點（〈越高淪亡實錄 電視明天播出〉，1978 年 12 月 3 日），並於「血書」刊出的隔日（12 月 17 日），又分三種語言（台視閩南語、中視國語、華視客語），在比之前更黃金的時段（晚間八點到九點）重播（〈電視台明重播 越高淪亡實錄〉，1978 年 12 月 16 日）。台北市新聞處之後也將該紀錄片在新公園（現已改稱「二二八紀念公園」）音樂台，以及台北市各社區中，免費放映給民眾觀賞（〈四部愛國電影 今晚開始輪映〉，1979 年 1 月 20 日）。

12 月 5 日，也就是三台聯合首播《越高淪亡實錄》的第二天，《聯合報》第七版刊登了一篇署名「尼洛」的〈「越高淪亡實錄」的播映〉，文中指出：

共產黨在它統戰的地區中，絕口不提它要宣傳的共產主義，他要強調的是這個地區的「內部矛盾」，這矛盾不外幾種，如貧富間的矛盾，

地域上的矛盾，長官對部屬間的矛盾，政府對民眾中的矛盾等等，把這個地區弄成由內部不和而到內部鬥爭，一方面分散了對付共產黨的注意，另一方面對消了一大部份的有望力量，說得不好聽的，就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手法，這個地區「親痛仇快」的事情發生得越多，就是它的統戰越顯出了功效（尼洛，1978 年 12 月 5 日）。

「尼洛」本名李明，政戰學校一期畢業，是王昇的學生（尼洛，1995，頁 19-23）。這篇評論的重點放在社會內部矛盾衝突，將會導致共產黨勢力擴張，與「血書」中「阮天仇」對南越陷共前，其社會中「民主鬥士」與「野心份子」種種作為的控訴異曲同工。而這時，〈南海血書〉尚未問世。

判斷「血書」是整體文宣戰之一部分的另一個證據，是正當「血書」風潮捲起後不久，隸屬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的《青年戰士報》也開始刊登〈南海血淚〉系列報導。總共二十六篇報導，從 1979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22 日，在該報 5 版逐日刊登了一個多月，並於連載結束五天之後的 2 月 27 日，就立刻發行了單行本（李元平，1979）。作者李元平中校當時是該報副總編輯，受國防部邀請，參加由新聞媒體記者與藝文界人士組成的參訪團，前往設在澎湖白沙鄉講美村的越南難民營參訪。⁶1979 年 1 月 18 日，《青年戰士報》3 版刊出李元平從澎湖發出的〈越南難民浩劫餘生，逃亡過程充滿血淚〉，是最早刊登相關報導的新聞媒體（李元平，1979 年 1 月 18 日）。文中指稱「清風號」倖存難民在 1 月 17 日首度透露，受困荒島時曾吃難友屍肉求活，並預告該報即將連載相關報導。如果說登在副刊的文章可以是虛構的文學作品，但登在報紙新聞版面的報導，就必須要根據事實。因此「阮天仇」的「血書」所尚未完全滿足的紀實性，便由〈南海血淚〉的報導來接力完成。

比對當時與李元平一起前往採訪的其他報社記者的報導，⁷可以發現，李

⁶ 澎湖白沙鄉講美村的越南難民營在 1977 年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簡稱「救總」）成立。1977 年 6 月 16 日有兩批越南難民漂流至屏東小琉球海域，為了安置難民，救總先是利用澎湖西嶼鄉繼光營區設立「越南難民臨時接待所」，後來進入台灣海域的難民人數越來越多，政府遂委託救總，於 1978 年 12 月 1 日在白沙鄉講美村舊軍營成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劉吉雄，2013）

⁷ 依據李元平在 2015 年接受紀錄片導演劉吉雄訪問時的描述：「本來是國防部軍事發

元平的報導不但整體篇幅長達七萬字，且對難民食人肉的過程與細節有更多具體描寫。除了吃人肉的情節讓人印象深刻，更值得玩味的是，李元平在好幾篇報導中，都記載瀕死的難民在臨終前，針對南越陷共所發表的長篇大論。例如，他的報導中敘述第一個在死前主動同意讓難友食其屍身的裴文政，在臨死前對難友說：

我快死了，你們就要吃我所貢獻的肉了，因此請相信我：國際上出賣與被出賣的陰謀詭計我一無所知，但是我懂得：那種怨天尤人最多的人，同時也必然是靠天靠人最多，而靠自己最少、責己最少的人。...我便臨死絕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國家註定可以出賣別的國家，有任何國家可以左右別的國家的命運。除非那被出賣的國家、那命運被人左右的國家，他本身內部分崩離析、開門揖盜、引狼入室，凡事奴顏卑膝仰人鼻息，一切為別人之命是從的，這就另當別論（李元平，1979，頁 98-99）。

在李元平筆下，另一位願意捐獻身體延長難友性命的伍維城在死前說：

就是因為自己人在大難臨頭的時候，彼此爭得你死我活，無視於大敵當前，才把我們的國家搞丟在共產黨手中，男女老少，冒死逃難，為什麼我們還不覺悟（李元平，1979，頁 104）？

言人請了幾個文藝界作家還有新聞界人士，像是司馬中原、朱西甯、蕭颯、中國時報大記者傅崑成幾位，一票人從台北出發就到難民營。」（劉吉雄，2016）。同行的《中國時報》記者傅崑成在 1979 年 1 月 20 到 1 月 23 日也寫了系列報導，在總標題〈當為鬥士，毋為難民：越南難民訪問錄〉下的第四篇報導〈哭泣的珊瑚礁〉的近尾聲中，傅崑成以十分簡要的筆法，描述了難民為求生而食屍肉的情節（傅崑成，1979 年 1 月 23 日）。不過，後來傅崑成在受訪時，對當時情景的說法是：「我沒有訪問到哪一個人說他吃人肉，我不記得。」（高人傑、李惠仁，2001，19:40 處）。另一位也同團採訪的《聯合報》記者翁台生，則只在 1 月 19 日的《聯合報》3 版寫了一篇報導，文中對「吃人肉」情節的表達更為含蓄：「他們祭拜已故難友，而特別懷念其中的十位。因為在他們掙扎於珊瑚礁求生存時，這十位難友在不支去世前，答應用自己身上的肉延續生存者的生命。」（翁台生，1979 年 1 月 19 日）

已死之人的遺言應是由生者轉達，荒島既無紙筆，生還者的記憶是否真能將這些長篇字句一一復原不無疑問。而「出賣別的國家」、「國家內部分崩離析」等種種論述，呼應「血書」中所控訴的「偉大盟邦」與「民主鬥士」。

而就在該系列文章開始連載的當時，高雄縣黨外老縣長余登發父子因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案被捕，引發了黨外政治人物齊聚抗議的「橋頭事件」。⁸橋頭事件發生隔日，《聯合報》的「黑白集」刊登不具名評論指出：「最近發生一位南部聞人涉嫌參與叛亂組織案件，這位聞人以『民主鬥士』自居。令人聯想「南海血書」和這篇血淚交織的血書所痛譴的越南『民主鬥士』。」（〈「民主鬥士」〉，1979年1月23日）這顯然是把「血書」視為真實來引述。

在「仿真」的「血書」問世後，憑藉對「清風號」生還者的採訪，李元平曾也試圖在他的報導中尉「血書」的真實性辯護，他說：

「南海血淚」連載完畢後，有許多讀者想在文後附錄的「清風號」一百四十六位難民名單裏面，尋找「南海血書」的作者阮天仇，可是沒有結果...在這裏可以奉告關心的讀者們：「血淚」是「血淚」，「血書」是「血書」，然而，是「血淚」也罷，是「血書」也罷，都各有其人，也各有其事。發生在南海上的難民漂流悲劇，情節有輕有重，有幸有不幸。並非「血淚」或「血書」便足以道盡（李元平，1979，頁127）。

不過他在2015年接受紀錄片導演劉吉雄訪問時改口說：「我的報導就跟〈南海血書〉有所區隔。像林濁水有政治意見，他針對的是〈南海血書〉，不是我的〈南海血淚〉。」（劉吉雄，2016）

⁸ 「血淚」開始在《青年戰士報》開始連載的同一天（1979.01.21）凌晨，高雄縣的黨外老縣長余登發與其子余瑞言因涉及「吳泰安匪諜案」在八卦寮自宅被便衣上銬帶走，1月22日，包括許信良、施明德、張俊宏、林義雄、黃順興、邱連輝、黃信介、陳菊、陳婉真、胡萬振、何春木、曾心儀等黨外人士，都前往余登發故鄉高雄縣橋頭鄉進行示威抗議聲援余登發父子，是為「橋頭事件」，是繼「中壢事件」後，台灣黨外力量的又一次集結。

四、黨報、軍報、老三台與王昇的角色

往前追索當時新聞媒體的報導，可以發現，「清風號」難民船相關消息最早出現在《中央日報》上的時間點，是 1978 年 12 月 13 日，也就是「血書」問世的六天前。當天該報三版使用「合眾國際社」外電，編譯成〈越南難民獲救前在荒島上 境況慘絕人寰 沒有一家能完全活下來〉，報導中描述一批已經抵達澎湖的越南難民，在獲救前曾受困珊瑚礁 42 天，也提到有生還者透露曾「吃人肉」（〈越南難民獲救前在荒島上 境況慘絕人寰 沒有一家能完全活下來〉，1978 年 12 月 13 日），這些情節，後來都出現在朱桂筆下虛構的人物「阮天仇」所描述的自身遭遇中。

因此合理的解釋是，朱桂在看了這則外電報導後，發揮文學的想像，寫就了「血書」；李元平則是在「血書」創造的熱潮中，回頭去報導「清風號」難民的遭遇，報導中不時借用已死之人的「死前告白」，呼應「血書」中對「偉大盟邦」與「民主鬥士」的控訴，讓本是虛構的「血書」，彷彿真有了事實的基礎。還原此事經過可以看出，當年透過黨報（《中央日報》）與軍報（《青年戰士報》）的聯手合作，在台灣當時因為台美斷交，許多人擔心台灣前途岌岌可危而充滿焦慮不安的社會氛圍中，成就了此一跨越 1978 年到 1979 年的「南海神話」。

當年這場政治作戰總動員的範圍，還包括三台聯播的連續劇《西貢風雲》。根據當時媒體報導，國民黨黨營的中影公司原本打算將〈南海血書〉故事拍成電影，但後來決定改拍電視劇（〈電視劇「西貢風雲」下月三日三台聯播〉，1979 年 6 月 30 日）。⁹這部由三家電視台聯合製作的三十集連續劇，從 1979 年 7 月 3 日開始在三台周二到周六晚上八點到九點的黃金時段播出，¹⁰與〈南海血書〉問市相距已半年多。該劇是將〈南海血書〉與〈南海血淚〉

⁹ 〈南海血書〉後來還是被拍成了電影，出品人為伍玉麟，由柯俊雄、王寶玉主演，片名改為【南海島血書】。〈南海血淚〉也拍了電影，由蔡揚名導演，王冠雄主演。兩部電影的票房都很差（林濁水，1979，頁 46）。

¹⁰ 1970 年代，台灣曾出現在晚間黃金時段，三台常態性「聯播」節目的現象。根據當時擔任台視節目部經理的何怡謀指出，1976 年元月開始，國防部總政戰部開始長期徵用三台晚間九點到九點半時段進行聯播，最早播出的節目是總政戰部監製，

的內容加以擴大延伸，加上「清風號」難民在南越陷共前之生活的題材，以及對南越陷共過程的描寫。《聯合報》在【西貢風雲】第一集播出當天刊出的社論中，對該劇內容就提前做了「劇透式」的描述：

其最後五集固然和〈南海血書〉相似，映出的是一艘「清風號」如何在船上難民給越共檢查站人員沒收了所有隨身財物之後，駛離西貢，發生故障，飄流了多天擱淺在一個珊瑚島上，經台灣漁船「財富號」救起的劫難故事。但整個主題，則置於八年越戰導致南越淪亡的經過（第一集至第十一集），以及越共侵踞了南越後奴役迫害老百姓的暴行（第十二集至第廿五集）。其前的如阮文紹之被逼解職，陳文香的繼任掙扎，楊文明之終於投降，固然都是真人真事，我們記憶猶新。其後的越共之如何洗劫西貢，勞改下放，迫得人民甘於冒死逃亡，較之報章片段的新聞報導，尤見真切而一貫。」（〈又一頁血的歷史教訓——鄭重推荐三台聯映的「西貢風雲」〉，1979年7月3日）

顯然《聯合報》的社論撰寫者，在該劇公開播出前，就已經對該劇全部內容有了掌握。由於社論代表報社立場，此篇社論與前文舉出的尼洛與「黑白集」不具名專欄文章，顯示該報也以某種方式被納入由黨報、軍報領頭，三家電視台後續接力的整體政治作戰文宣計畫中。¹¹當時《中國時報》、《聯合報》的發行量遠高於《中央日報》與《青年戰士報》，但兩大報是民營體質，因此總政戰部在體系上無法直接指揮，但仍透過與個別作者的連結進行操作。不過相較於黨報、軍報，兩報的表現十分節制。就報紙版面而言，《中國時報》對「血書」的著墨比《聯合報》更少。

中國製片廠製作的【寒流】；接下來還有【證言】、【風雨生信心】、【河山春曉】、【煉獄兒女】、【這一家】、【艷陽天】等等。1979年播【西貢風雲】的時段比起之前，又是更黃金的時段，竟把三台廣告最多、利潤最高的八點檔連續劇時間給徵用了（何怡謀，2002，頁226-227）。

¹¹ 比較有趣的是，如果根據本文註10，當時《聯合報》記者翁台生也參加了李元平等前往講美村難民營的訪問團，但他只寫了單篇報導，不但比李元平少，也比同團的《中國時報》記者傅崑成少，似乎顯示記者個人對此議題有一些自己的判斷。從兩報記者對講美村參訪後撰寫報導的節制表現看來，應已掌握相關內部資訊。

1978 年到 1979 年間，越南難民船大量湧向南海，成為顯著的國際人道救援問題（〈越南難民大逃亡 三百艘船隻結隊 駛向泰馬東海岸〉，1978 年 12 月 7 日）。1979 年 1 月 11 日，也就是〈南海血書〉問世不久，在台灣正捲起風潮的時候，當時台灣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在行政院會中宣讀了一份聲明，聲明中提到：「歷史告訴我們，相信共產黨謊言的人，都只落得悲慘的下場。波羅的海三國的被蘇俄併吞，大陸的淪陷，越南的淪亡，都是我們記憶猶新慘痛的教訓。今天我們不能做一個為自由而奮戰的鬥士，明天我們就會淪為飄流海上的難民。」（〈今天不做自由奮鬥戰鬥士 明日將為飄流海上難民〉，1979 年 1 月 12 日）蔣經國的談話擲地有聲，當時全台各大新聞媒體幾乎全部頭條披露。在〈南海血書〉領頭帶動風潮，國府的政治作戰部門非常有組織、有效率的運用此一局勢，在台灣島內製造出「今天我們不能做一個為自由而奮戰的鬥士，明天我們就會淪為漂流海上的難民」的全民精神總動員狀態。而當時總縮此政治作戰文宣大任的，是當時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

早在台美斷交、中美建交之前，當時由鄧小平當權的中國，已經開始對台進行「和平統一」策略。提出「三通」訴求，希望盡快「通航、通郵、通商」。蔣經國則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反制（許雪姬，2004），並指示王昇成立「反統戰小組」。「反統戰小組」又稱「固國小組」，1980 年初改名為「王復國辦公室」，即是知名的「劉少康辦公室」前身（魏萼，2014），由國家安全局、國防部、外交部、警備總部、行政院新聞局、國民黨文工會等單位抽調人員組成，以抗衡中共「對台辦公室」的對台統戰（尼洛，1995，頁 356-357），依據王昇的說法，該團隊：「是中央黨部祕書長辦公室下面的一個特殊幕僚群...不辦業務、不對外發公文、也不用印信。」（尼洛，1995，頁 367）這個「不留痕跡」的隱形小組，就是「血書」一系列文宣佈局的幕後推手。

前文曾提及（參見註 5）「血書」作者朱桂在 1948 年曾參與蔣經國主持的「上海經濟管制」，當時王昇是執行經濟管制的主將（蔣經國，1988，頁 113-137），因此可以確定具有政戰血統的朱桂，除在中央幹部學校曾經是蔣經國的學生，與蔣經國的愛將王昇也曾經一起工作。而「血書」後續之「血

淚」的產出過程中，王昇的愛將朱西甯曾與作者李元平一起前往澎湖講美村難民營參訪，¹²朱西甯在〈後事之師——觀「西貢風雲」雜感〉一文中描述了這段參訪過程，同樣也把虛構的「血書」當成事實來描述，他在提到「清風號」難民自述吃人肉時說：「放眼無涯的天水相接卻乾渴得急吮剛剛嚥氣者的血管——人到得那種地步而斃，連血液也都稀淡得不成其為血液了，想不到那血小板的匱乏，唯一的用途竟是利于血書……」（朱西甯，1979年7月4日）。這樣的描寫，已經把「血書」與「血淚」情節交織為一，將真實與虛構融為一體。¹³

朱西甯後來在1980年初發表的〈將軍令〉一文，也為王昇是「血書」這一連串文宣主軸之幕後設計者提供了證據：

¹² 朱西甯（1927-1998）是知名軍中作家，1972年以陸軍上校官階退伍後專事寫作，他曾在〈將軍令〉一文談及與王昇的淵源，對王昇極盡吹捧：「從顧客們指指點點裡，高山仰止的見著四大金剛之一的將軍那正在緩緩昇高著的背影——也就只是那一瞥，將軍一身打縐的卡嘰中山裝，非常平常的清簡澹然，中等身裁，一點也不覺搶眼，或只合公司裡一名清潔工友罷，然而我有一種油然而生的，卻又似無端的肅然。這是我與將軍結緣的老早的一個起頭，現世裡活真活現的神話，可說是仙緣罷，但也就似乎足足預示我與將軍至今三十餘年不易不渝的親與疏...將軍有一種極富煽動性的魅力，...那些看來平凡無奇的課程，到得將軍開講，一樣的也竟是擊楫而誓的慷慨悲歌。那已不止是我單純的有效受教，從而還破除了我學院派的迂闊，讓我發見並信服即使學術傳授，火熱、激情、雄辯、氣勢，都會是那樣的必要而更奏效。將軍確是大開了我輩視界、眼光、和見識；...不想七八年後奉調參謀本部，竟又倖為將軍屬下。怎生是好呢？這只好說是命該我有此福分造化了。...而像我這才不出眾，貌不驚人的平庸之質，蒲柳之姿，若想將軍青睞，那才不知天高地厚呢。好在我也自甘澹泊，單只念及同儕中唯我得識將軍最早，又是神話裡來去的唯我得知將軍最深，則誰還能比得我與將軍如此的至親而又至疏！」（朱西甯，1980年1月23日）。

¹³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朱西甯該文在「聯合副刊」登出的同一天（1979年7月4日），《聯合報》在二版刊出〈「向國建會建言」系列座談之三：文化建設勿急功近利 宣傳工作宜真確可信〉一文，綜合整理包括李亦園、葉啟政、楊國樞等人對政府文宣政策的建言，其中提到：「有效果的宣傳，應當是具有『可信性』的宣傳，當接受宣傳者對宣傳內容發生懷疑，這種宣傳是發生不了效果的。這是在討論『宣傳』時，首須注意的一個角度。...宣傳應以基本的事實材料為內涵，並在常識所能接受的範圍內予以運用。最近，有關『南海血書』的問題，引起許多討論，甚至對該項血書的真實性發生懷疑。果真如此，則宣傳者所欲收穫的功效不但未必能達成，且民眾對發動此項宣傳者的本身或已產生了「反宣傳」的印象。」（陳祖華、黃年、高惠宇、翁台生，1979）似乎顯示當時該報中隱然存在有對「血書」議題不同的操作方向。也顯示台灣知識界當時對「血書」現象很想說點什麼，但其委婉的提醒呼籲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在當時相較於老三台等主流媒體的排山倒海宣傳，顯得相當微弱。

將軍最有資格來說越南的，將軍曾應吳廷琰邀請，前後赴越十次，協助越南政府建立美國最為反對的政治作戰組織。...將軍指出越南淪亡起因于共黨的分化所受謀害最重。共黨說你是北越人，他是越南人；說你是本土人，他是華僑；你是越南人，他是美國人；你是學生他是警察；你是民主鬥士他是政府特務；你是佛教徒他是天主教徒；...將軍大為慨歎，說出他的名言：「世人只曉得和尚不會做共產黨，不曉得共產黨會做和尚。」這可不令人自然的聯想到今日此間的分裂分子所作所為，說你是本省人他是外省人，你是黨外他是黨內，你是鄉土作家他是御用文人。而幾個挾教會以自重的甚麼牧師甚麼議長，又何嘗不令人錯覺「基督徒不會做共產黨」？（朱西甯，1980 年 1 月 24 日）

前文中所提，王昇對越南陷共原因的分析，很明顯與「血書」是同一基調。

繼「血書」、「血淚」之後的【西貢風雲】電視劇，由於需徵用三台電視八點檔黃金時段，自然需要有管電視台的新聞局派駐人員的「固國小組」協助協調。對於所寫的〈南海血淚〉內容被改編成電視劇，但自己卻完全沒有被徵詢，李元平回憶：「那時候有一個小組，開了很多次會，我的階級太低，沒有資格去參加，那時候做決策的是梅長齡，還有王先生，就是王昇。」（高人傑、李惠仁，2001，25:01-25:41）梅長齡原為國民黨黨營事業中影公司總經理，1979 年間轉任中視總經理，正是【西貢風雲】拍攝與播放期間。而李元平口中的「小組」，指的就是王昇所領導的「固國小組」。

如前述朱西甯文中所言，王昇與越南淵源極深。1960 年初越南總統吳廷琰訪問中華民國後，王昇被蔣經國派往訪問，停留三個月期間，以對共產黨政治作戰專家的身分，與吳廷琰、阮慶、阮文紹、阮高祺、陳善謙等越南政治高層建立良好關係（尼洛，1995，頁 309-319），甚至在 1960 年底再度組團訪越，並在吳廷琰遇刺後協助越南建立了政戰制度（國史館檔案，020-011003-0023）。這使得 1979 年國府政戰文宣體系，之所以會選擇以越南難民的遭遇，做為「內批民主鬥士、外打偉大盟邦」敘事架構的題材，試圖對治島內政治反對運動，並控訴美國在外交上的背棄，更有脈絡可循。

透過對越南難民悲慘遭遇或純屬虛構、或參雜真實內容的編寫與呈現，黨報、軍報連篇刊載，加上三台戲劇每晚播出，再配合全國各級學校的閱讀心得寫作比賽、話劇演出等等，讓「今天我們不能做一個為自由而奮戰的鬥士，明天我們就會淪為飄流海上的難民」的政治宣示，經由報紙頭版標題，在當時的台灣社會中，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功能，成功形塑了某種「社會真實」。當「社會真實」的大廈成功被建造，「血書」中那件染血的襯衫究竟存不存在已不重要，中學教員林濁水合理的質疑也立即淹沒在依循主流敘事框架，汗牛充棟的訊息中。如同【1979 南海神話】所指出：

儘管林濁水在《八十年代》上以比〈南海血書〉更長的文字駁斥血書內容只是國民黨的統治神話，但《八十年代》只發行七期就被全面查禁，而〈南海血書〉則印刷了數百萬本，全台各級學校師生人手一冊，阮天仇的國仇家恨，豈是林濁水一篇文章就可以泯滅。（高人傑、李惠仁，2001，8:08 - 8:28）

參、從文學的虛構成為社會的真實

一、「南海血書現象」的群眾心理基礎

雖然在現實使用上充滿歧義，但如果從生產者意圖的角度，「假新聞」（fake news）大致可分為故意或非故意的被產製出來兩大類。前者是誤導性的造謠（disinformation），後者則是人云亦云的道聽塗說（misinformation）（Weedon, Nuland, & Stamos, 2017, April 27; Caplan, Hanson, & Donovan, 2018）。如果根據這個定義，「中央副刊」將〈南海血書〉改裝為真實文件的譯文，是製造了一則蓄意誤導讀者的訊息（disinformation）。接下來一連串將該文件視為真實存在的新聞報導、影像呈現，則可能是蓄意誤導的延伸，也可能是道聽塗說（misinformation）的擴散，都可包涵在「假新聞」的範圍。

但如同當代的各種「假新聞」氾濫現象，不能只簡單的以有人蓄意造假、

惡意抹黑、騙術詐財等個體道德違失來解釋，而必須考量具壟斷性佔有率的社群媒體，以其運算法透過偏好設定放大極端言論，對使用者所造成的影響等等。如果只簡單以「黨國文宣機器的愚民政策」去看待這個近世台灣歷史上轟動一時的「南海血書現象」，可能無法真正理解這樣一個情節相當不合理的故事，在當時的台灣社會何以竟能如此觸動人心、掀起風潮，並在當時國府政權內外交迫的情勢下，相當程度的強化了台灣民眾對既有政權的認同與向心。歷史學者李永熾從當時台灣民眾心理狀態的角度，提出了他的詮釋：

退出聯合國的時候，台灣也一批移民潮出來了，大家就往美國跑。接著第二波，所謂的「中美斷交」也就是台美斷交的時候，又有一批，等於說是逃亡潮，也是往美國或是其他地方去跑，所以在這種危機的心理狀況之下，大家就把自己這種心理上的感覺，和當時像〈南海血書〉之類這些東西互相結合在一起，所以裡面的荒誕，裡面這些不合情理的東西，大家都會拋開（高人傑、李惠仁，2001，15:54-16:40）。

如果不是有這種集體的心理狀態支撐，很難解釋朱桂的兒子朱大明兒時的親身經歷。因為在朱桂投稿「中央副刊」前曾經先看過原稿，所以從一開始就知道〈南海血書〉只是父親伏案幾小時後所產出的一篇虛構文章的朱桂的兒子朱大明，在當時所看到的，令他印象深刻、甚至怵目驚心的種種現象：

那時候郊遊烤肉嘛！從台北火車站坐車去十分寮瀑布，你到車站就看到人家發這個東西：「不要再玩了，台灣要滅亡了！」而且是老兵，是真的老兵，而且他是自費刻銅板油印的，整個抄出來這樣油印，你的感覺會很可怕，中華路天橋上面到處在發這個東西，就是南海血書嘛！不會寫就寫阮天仇（高人傑、李惠仁，2001，15:16-15:45）。

這是朱大明兒時親眼所見。一篇從時事發揮想像，純屬虛構的文學作品，卻引發一連串實實在在的社會效應，「血書」雖然是假的，但在當時所引發的「血書效應」卻是不折不扣的一種「社會建構的真實」（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二、社會建構的真實

社會學家彼得·伯格 (Peter Berger, 1929-2017) 指出，在人類社會中被視為「真實」的，有些是已被明確建制化的客觀真實 (objective reality)，例如語言、宗教 (Berger, 1966, pp. 34-46)；有些則是個體透過社會化過程的內化而成就的「主觀真實」(subjective reality)，主觀真實經由社會化過程而形成，除了兒童成長過程中需經歷將個體安置於社會的「初級社會化」(primary socialization)，個體還需透過各種「次級社會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 以應對其社會生活 (Berger, 1966, pp. 129-147)。每一個社會中的個體，都是透過與他人互動來確認自己的身分、形塑對己身與社會的認知，而不論是在哪個層次的社會化過程中，除了「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例如父母、配偶、家人等對個體具有關鍵影響力，其他「非重要他者」(non-significant others)，例如通勤交通工具上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或人們每天在電車上閱讀的報紙，也發揮著形塑或維繫主觀真實的一定作用 (Berger, 1966, pp. 149-152)。

不像社會的「客觀真實」往往具有強大的固著性，社會的「主觀真實」相對具有可變動性，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例行性、甚至儀式性的互動來進行維繫才能持續 (Berger, 1966, pp. 147-163)。在這類「主觀真實」的相關討論中，大眾傳播媒體的角色經常被著墨。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指出，每日出刊的大眾傳播媒體（當時主要是指紙本印刷的報紙、雜誌）在形成近代民族國家這種「想像共同體」（一種「主觀真實」）時，所發揮的國民共同參與的、儀式性作用 (Anderson, 1983)。凱瑞 (James Carey) 在其媒體相關研究中，也強調傳播媒體的「儀式性」功能更勝於資訊傳播功能 (Couldry, 2003, p. 19)。

凱瑞對「真實」所提出的洞見，使得他的討論特別合適用在分析「南海血書現象」。他是如此描述「真實」與權力的關係：

「真實」是稀有資源，如同所有稀有資源被各方爭奪...權力的基本形式就是如何界定、配置、展現這資源...在現代，「真實」因為近用能力而稀少：僅少數人得以號令決定結果。有人可以說，有人只能聽，有人可以寫，有人只能讀，有人拍電影，有人看電影（Carey, 2009, pp. 66-67）。

從權力者掌握訊息內容、掌握世界與社會詮釋權的角度，凱瑞強調傳播的儀式性功能：一種為了達成假想中之和諧世界的功能。在他看來，傳播的儀式性在於：著墨於典範建構與維繫更勝於創新實驗，維護前提更勝於提出主張，重視架構更勝於內容（Couldry, 2003, p. 65）。凱瑞從古老的字源中找到傳播（communication）這個字的儀式性意義源頭，他指出，傳播從一開始就與分享（sharing）、參與（participation）、協作（association）、夥伴關係（fellowship）等意義有關。他認為，傳播的儀式性觀點是從維繫社會整合，而非克服地理空間阻隔來理解傳播的社會功能，從此一觀點出發，傳播最重要的功能是為了重現共同信仰，而非傳遞訊息（Couldry, 2003, p. 15）。

讀報如同望彌撒，每天出刊的報紙內容並無新意，重要的是對讀報者某一世界觀的重覆形塑與確認。撰寫或閱讀報紙都是儀式性、戲劇性的行動，呈現讀者眼前的並非純粹的訊息，而是各方勢力的爭鳴與抗衡。例如：一則關於美國金融危機的報導，其實是對抗傳統敵國德國與日本的愛國表現；一則關於女性政治會議的報導，則牽涉支持或反對婦女解放兩造的抗衡（Couldry, 2003, pp. 16-17）。

依據伯格與凱瑞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看法：做為閱聽者每天認識世界與社會的重要媒介，新聞媒體所呈現的「真實」，是一種經由新聞內容產製者與閱讀者互動後所產生的「社會建構的真實」。而具有較大權力的一方，往往主導或決定了真實該如何被建構，也就是決定了新聞媒體會呈現那些內容，以及如何呈現；呈現在新聞媒體上的訊息內容，是各種力量抗衡下的結果，訊息的產製與接受過程所要發揮的最重要功能，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消息傳遞，而是要確保掌握話語權的一方所欲鞏固的世界觀、或對事情的理解框架，可以傳達給接受訊息的一方，並獲得確認。

如果依據這樣的觀點來解讀「南海血書現象」，會發現在 1970 年代末期，黨國體制依舊掌控各個權力面向的台灣社會中，出現這樣一件現在看起來很荒謬的案例，其實並不奇怪。甚至可以進一步推論，「血書」事件應該只是黨國勢力掌控的媒體機構，所曾經產出的諸多有利統治的「社會真實」中，較為顯著的案例。

三、一則「假新聞」如何建構「社會真實」

在〈南海血書〉的案例中，當時依然高度掌握媒體話語優勢的黨國體制，顯然已經認識到政治反對勢力的挑戰越來越強，但台灣當時絕大多數的新聞媒體對「中壢事件」、「橋頭事件」等對後來台灣政情影響深遠的政治抗爭事件卻幾乎沒有報導。亦即統治集團已認識到的現實，卻由於媒體向維護執政者方向極度傾斜，相關事件的消息都被刻意掩蓋，所以尚未成為大眾普遍了解的「社會真實」。相反的，透過具有實質權柄的組織性力量（例如「固國小組」），夠透過對黨報、軍報的直接控制，與對其他具有「侍從性格」之民營報紙的間接影響，¹⁴配合當年越南難民潮湧現的外在局勢，成功地在台灣社會中，引導、製造出從 1978 年底一直延續到 1979 年下半年的「南海血書現象」。

相較於台灣島內政治反對運動開始崛起，讓執政者面臨政權穩固性遭撼動的危機感，當時台灣民間普遍存在的危機感，主要來自台美斷交。台灣人民擔心美國與中國建交後，可能會放棄自 1954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簽訂以來，以武力保衛台灣於中國統治之外的承諾，擔心台灣很快會被中國併入。這就是前文提到，李永熾所描述的，當時台灣民間很普遍的心理焦慮。〈南海血書〉以及之後隨之而生的一系列論述，在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這種危機感中，被循序漸進、有計畫地端上檯面，並如幕後推動者所意料，甚至程度可能超乎其意料的，獲得了社會迴響。

¹⁴ 學者林麗雲借用政治學上「保護主與侍從」關係的概念，來解釋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與當時民營報業的關係（林麗雲，2000）。

透過對難民海上逃亡慘狀的披露，將社會注意力引導向「今天不做為自由而戰鬥士，明天就淪為漂流海上難民」的一整套敘事架構。一方面批判此一敘事中最後放棄南越，未來也可能放棄台灣的「偉大盟邦」美國；一方面以敘事中被指為直接導致南越陷共，反對吳廷炎、阮文紹政權的南越「民主鬥士」們，影射台灣內部政治異議人士，將會讓台灣的下場如同南越，台灣人民的下場一如越南難民，達到妖魔化黨外政治運動的效果。其對後者的著墨，往往甚至更甚於前者。

《中央日報》對〈南海血書〉的真偽態度隱晦，直到一年後才承認其為「文學創作」。而在此之前，經過〈南海血淚〉採訪「清風號」難民相關報導的加工加料，以及全台各級學校的心得寫作比賽，透過學校、老師做為學童社會化過程中「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強調與示範，以及假日站在中華路天橋上發〈南海血書〉手抄油印本的老兵等這類「非重要他者」(non-significant others)的不斷提醒，南越「亡國」的血淚教訓，透過對〈南海血書〉的詮釋，轉譯為當時台灣民眾對現況的感受與理解。

整整一年間，「血書」以各種不同版本的變形與分身出現在新聞媒體、學校教材、電影、電視八點檔聯播，以及難以計數的學生閱讀心得寫作、周記感想與作文比賽的內容中，高密度的訊息重複，發揮「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的效果，¹⁵讓一篇原本虛構的文字，毫無疑問的建構出了影響廣泛，且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社會真實」。正如凱瑞所說，「真實」是稀有資源，通常是由權力者決定其內容；也正如「中央副刊」曾經針對「血書」熱潮是被製造出來的指控，理直氣壯的反駁表示：

如果事實真的如此，那麼，成千成萬的人爭著閱讀，是「製造」出來的，幾十萬本「南海血書」相繼售罄是「製造」出來的；無論閱讀，無論購買，無論抄寫、翻印、張貼，都伴隨著一個行動，也都是「製造」出來的...一篇轟動的作品，必與時代潮流、民族情感相表裏，

¹⁵ 伯格在談到維護「主觀真實」的日常社會互動時曾指出，雖然重要他者的意見通常對個人影較大，但：「當十個一般的熟人連續表達了相同的看法，其影響力就會開始超過持相反意見的摯友。」(Berger, 1966, p. 152)

要得天時，得地利，得人和才哄得起來，動得起來（仲父，1979年12月19日）。

當「三人成虎」的「社會真實」論述，以其強大的自我複製能力，掩蓋了〈南海血書〉其實是一文學性虛構的種種跡象，也掩蓋了當時就已經出現的零星質疑，分享共同情感與焦慮的「願意相信」，會凌駕了真偽辯證的「可以相信」，也就不足為奇了。

肆、結語：媒體話語權反映社會權力結構——「假新聞」的前世今生

本文回顧 1979 年年末開始，在台灣社會中延續至少一整年的「南海血書現象」。在台美斷交、黨外政治力量隱隱騷動的時局中，專科教師朱桂一篇以越南難民死前絕筆信形式呈現的文學作品，被《中央日報》副刊以添加「譯者附記」的方式，戲劇性的被假扮成一篇譯自發現於大海螺中的襯衫上，以越南文寫就的「血書」。從「血書」刊登之前不久，由總政戰部監製的【越高淪亡實錄】已經在三台黃金時段聯播過兩次看來，當時擔任總政戰部主任，也就是實際領導「固國小組」的王昇及其團隊，已經確立以越南陷共、難民潮湧入南海周邊國家，做為面對台灣內外變局的文宣敘事題材。並將敘事主軸定調為——不能依賴「偉大盟邦」（決定與台灣斷交的美國）、不能相信「民主鬥士」（正在集結、影響力迅速擴散的黨外政治勢力），否則下場會跟南越一樣。在台美斷交後，害怕成為海上難民的集體心理下，「血書」在台灣社會一度掀起了很大的浪潮。

《中央日報》副刊「加工變造」了朱桂的文章，把這篇三千多字的虛構文字化妝為真實文獻的譯本，成了「投擲在油海裡的燃燒彈」，透過學校系統的全面動員，讓學校以及學校裡的老師——對學生來講的「重要他者」，成為傳遞相關訊息的重要管道，在〈南海血淚〉、【西貢風雲】的後續強化下，平面、電視主流媒體與教育體系的聯手，在台灣社會中成功塑造了「不應仰賴美國、不要信任黨外」這個隱然成為社會共識的「主觀真實」。雖然事後

證明「血書」是虛構，但此一透過主流媒體與學校系統不斷推動的「次級社會化」過程所形成的「主觀真實」，在當時台灣社會中，卻一度成為不折不扣的「社會真實」，其影響力持續了好一段時間。恐懼是統治者控制人民最好的方式，「南海血書現象」印證了這點。

用凱瑞的觀點，掌握政治經濟權力的一方，便掌握說話的權力。當年「南海血書現象」出現的時空環境中，那種透過黨國控制的新聞媒體與教育體系牢牢掌控話語權的情形，在網路普及的今天，似乎已經成為過去。由於只要連上網際網路，幾乎人人都可以上網傳播訊息，過去黎民百姓、芸芸眾生「只能聽、不能說」的狀況，已被網路「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訊息傳播模式取代。但從近年的發展觀察，這種看似「去中心化」的發展，卻可能是一假像。因為觀諸今日種種現象，任何訊息要在茫茫網路世界中發揮倍數加乘效果的影響，與其是否能迎合、運用具市場壟斷性的網路平台—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網路社群媒體臉書—演算法（algorithm）密切相關。

像臉書這樣的社群媒體平台，雖不產製內容，卻透過「使用者產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成為最大的訊息製造場，在壟斷性的佔有率下，網路世界中的行動者若欲發揮影響，選擇與其協作容易，選擇違逆其邏輯萬難，而平台只要能掌握大量使用者個資，便可能進行訊息操弄，有效影響其社會結果，不論訊息內容是真是假。於是我們又回到凱瑞的古典命題——**權力與話語權的相伴相生**，不論此一權力是來自政治還是經濟基礎（雖然兩者無法截然區分）。從這個角度來看，「南海血書現象」的殷鑑便顯得歷久彌新。

參考書目

- 〈又一頁血的歷史教訓——鄭重推荐三台聯映的「西貢風雲」〉（1979年7月3日），《聯合報》，第2版。
- 〈大好題材被人粗亂拍 南海血書作者表惋惜〉（1979年5月15日），《中國時報》，第7版。
- 〈中央幹部學校之創立與規模（民國33年至35年）〉（無日期）。取自政治大學網頁 <http://archive.nccu.edu.tw/history5.htm>。

- 〈今天不做自由奮鬥戰鬥士 明日將為飄流海上難民〉(1979年1月12日)，《聯合報》，第1版。
- 〈四部愛國電影 今晚開始輪映〉(1979年1月20日)，《聯合報》，第6版。
- 〈朱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29000112652A。
- 〈各校紛以「南海血書」作為愛國教材教育廳認意義重大〉(1979年1月12日)，《中央日報》，第4版。
- 〈「民主鬥士」〉(1979年1月23日)，《聯合報》，第3版「黑白集」。
- 〈電視台明重播 越高淪亡實錄〉(1978年12月16日)，《聯合報》，第7版。
- 〈電視劇「西貢風雲」下月三日三台聯播〉(1979年6月30日)，《聯合報》，第7版。
- 〈越南政府請我派員協辦軍中福利及政戰研究班教學〉，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1003-0023。
- 〈越高淪亡實錄 電視明天播出〉(1978年12月3日)，《聯合報》，第7版。
- 〈越南難民獲救前在荒島上 境況慘絕人寰 沒有一家能完全活下來〉(1978年12月13日)，《中央日報》，第3版。
- 〈越南難民大逃亡 三百艘船隻結隊 駛向泰馬東海岸〉(1978年12月7日)，《中央日報》，第2版。
- 〈復興高中禮堂 今明公演話劇〉(1979年10月28日)，《聯合報》，第7版。
- 尼洛(1995)。《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
- 尼洛(1978年12月5日)。〈「越高淪亡實錄」的播映〉，《聯合報》，第7版。
- 朱西甯(1979年7月4日)。〈後事之師——觀「西貢風雲」雜感〉，《聯合報》，第12版。
- 朱西甯(1980年1月23日)。〈將軍令〉(上)，《聯合報》，第10版(聯合副刊)。
- 朱西甯(1980年1月24日)。〈將軍令〉(下)，《聯合報》，第10版(聯合副刊)。
- 朱桂(1979)。《歷史圈外》。台北：東大圖書。
- 朱復良(1979年1月9日)。〈「南海血書」的激盪〉，《中央日報》，第6版。
- 仲父(1979年12月19日)。〈南海血書〉，《中央日報》，第10版(中央副刊)。
- 何怡謀(2002)。《台灣電視風雲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李元平(1979)。《南海血淚》。台北：青年戰士報。
- 李元平(1979年1月18日)。〈越南難民浩劫餘生，逃亡過程充滿血淚〉，《青年戰士報》，第3版。
- 阮天仇(1978年12月19日)。〈南海血書〉，《中央日報》，第10版。
- 林濁水(1979)。〈拙劣的南海寓言——剖析「南海血書」的真相〉，《八十年代》，創刊號，頁45-49。

- 林麗雲 (2000)。〈台灣權威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台灣產業研究》，3: 89-48。
- 邱家宜 (2011)。《戰後初期 (1945-1960) 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
- 茅家琦 (2003)。《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高人傑、李惠仁 (2001)，【1979 南海神話】。台北：民間全民電視台。
- 翁台生 (1979 年 1 月 19 日)。〈珊瑚礁上人吃人 驚魂甫定弔亡魂——越南難民逃奔自由.同舟一命.百劫餘生.四十二天.非人生活.九十七人.絕地喪身〉，《聯合報》，第 3 版。
- 許雪姬 (2004)。《臺灣歷史辭典》，頁 64-65。台北：遠流。
- 陳祖華、黃年、高惠宇、翁台生 (紀錄) (1979)。〈「向國建會建言」系列座談之三：文化建設勿急功近利 宣傳工作宜真確可信〉 (1979 年 7 月 4 日)，《聯合報》，第 2 版。
- 詹嘉雯 (2007)。《中壢事件與台灣政治轉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嵇若昕 (1981 年 4 月 27 日)。〈南海血書感人故事忠孝國中搬上舞台〉，《中央日報》，第 9 版。
- 傅崑成 (1979 年 1 月 23 日)。〈當為鬥士，毋為難民：越南難民訪問錄〉 (四) 「哭泣的珊瑚礁」，《中國時報》，第 3 版。
- 嘉彬 (1984 年 10 月 27 日)。〈好書介紹——南海血書〉，《中央日報》，第 10 版 (中央副刊)。
- 蔣經國 (1988)。〈五百零四小時〉，《蔣經國自述》，頁 45-165。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劉吉雄 (2013)。〈例外之地・陌生人〉，《文化研究》，17:217-224。
- 劉吉雄 (2016)。〈【難民船上的人】我們的人類啊，最後生死之間的那種抉擇〉，《獨立評論》。上網日期：2018 年 3 月 31 日，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45/article/5061>
- 魏萼 (2014)。〈析論「劉少康辦公室」的歷史意義〉，《海峽評論》，227 期。上網日期：2018 年 7 月 5 日，取自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6615.html>
- 羅世宏 (2018)。〈關於「假新聞」的批判思考：老問題、新挑戰與可能的多重解方〉，《資訊社會研究》，第 35 期，頁 51-86。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 Berger, Peter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 Caplan, R, Hanson, L, & Donovan, J. (2018). Dead reckoning: Navigating

- content moderation after “Fake News. Retrieved July 5, 2018. From Data &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 Web site:
<https://datasociety.net/output/dead-reckoning/>
- Carey, Benedict (2018, Jan. 2). Fake News’: Wide Reach but Little Impact, Study Suggest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Dec. 5, 2018,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02/health/fake-news-conservative-liberal.html>
- Carey, J. (2009). 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pp. 11-28. Routledge.
- Carey, J. (2009). Reconceiving Mass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pp. 53-67. Routledge.
- Couldry, N. (2003).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ubramanian, S. (2017, February 15). Inside the macedonian fake-news complex. *Wired*. Retrieved July 5, 2018, from
<https://www.wired.com/2017/02/veles-macedonia-fake-news/>
- Weedon, J., Nuland, W., & A. Stamos (2017, April 27). Information operations and Facebook. Retrieved Dec. 5, 2018 from:
<https://fbnewsroomus.files.wordpress.com/2017/04/facebook-and-information-operations-v1.pdf>

A Fake News of Taiwan's Martial Law Period : Nanhai Blood Letter

Eve Chiu*

ABSTRACT

On Dec. 19th 1978, supplement page of Central Daily News published an article called “Nanhai blood letter”. The article was signed by the named “Ruan, Tian-Chou” as his last words when dying on a coral reef in South China Sea by its description. The letter has been proven fake and found out was invented by a college teacher named Jhu, Guei of Northern Taiwan. At that time, Taiwan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was rising and “Nanhai blood letter” was promoted on a large scale by media, schools, various institutions for confronting the trend. The popular slogan was “Being an anti-communist fighter today, or becoming a refugee at sea tomorrow. Taiwan governors connected Vietnam's falling into communist ruling and Vietnam people’s opposition of Ruan Wen-shao regime successfully by “Nanhai blood letter” and related propaganda. The strategy alluded that rapi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would lead Taiwan to the same fate of Vietnam. Through the manipulation, KMT governors weaken the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movement which was still in its budding stage and striv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of the existing regime by people’s fears of communist party.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the notorious “fake news” and discuss from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erspective. The discussions include how the powerful KMT propaganda machines used 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anxiety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to create a wave throughout Taiwan; how a fictional story became a social reality by being believed to be true.

Keywords: fake news, Guei Jhu, Nanhai blood letter, social reality, Sheng Wang

* Eve Chiu is a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eve59chiu@gmail.com

中國愛國網紅的民族主義之形成與內涵： 以周小平文章的內容分析為例

劉忠博、陳娟、邵成圓*

本文引用格式

劉忠博、陳娟、邵成圓（2019）。〈中國愛國網紅的民族主義之形成與內涵：
以周小平文章的內容分析為例〉。《傳播、文化與政治》，9:31-61。

投稿日期：2019 年 3 月 10 日；通過日期：2018 年 6 月 1 日。

* 作者劉忠博為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email:liupublius@gmail.com
陳娟為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email: foxisfox@126.com
邵成圓為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媒體與新聞學院博士候選人，
email:liupublius@gmail.com。

《摘要》

中國大陸的「官方民族主義」與「網路民族主義」之間，二者存在既互補又分離的矛盾，前者需要後者展現愛黨愛國，然而後者卻時而超過官方的控制範圍，甚至對於官方產生批評之聲。近年來社交媒體橫空出世，中共視這類新興媒體（微信）為重要的輿論陣地，在其尚未能完全掌控之前，為了引導網路上對外的輿論，需要民間寫手的助力，而受到官方支持、並由網路紅人所建構的「愛國網紅民族主義」，即是在此脈絡下形成。本文試圖探討愛國網紅民族主義之內涵，以親官方的網路紅人—周小平—發表的文章為例，透過內容分析法檢視其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態度／立場。研究結果顯示，在分析的 506 篇文章之中，周小平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國家或地區持有明顯的不同態度，談及前者時多集中於讚揚，其中政治類話題的讚揚比例最高（且無任何批評）；對於後者而言則多為批評。值得注意的是，周小平對於中國大陸民眾的評價（不管是讚揚或批判），多集中於社會文化類的話題，而對於政治類的話題，則表現出中立，這也顯示出，在周小平看來，人民應該要無涉於政治。周小平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維護既有政權的民族主義」，對內是護黨愛國，對外是反美批日，而對比於早期的網路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已不存在批評國內事務的觀點。

關鍵詞：中國大陸、官方民族主義、網紅政治、網路民族主義

壹、研究背景及問題

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之後，每每宣稱中國要承擔大國責任，並積極融入世界的經濟體系之中；2017 年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上，習指出中國實乃世界貿易的新擁護者，甚至強調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張銘坤譯，2017 年 11 月 10 日）。然而，另一方面，在積極融入世界經濟的同時，又因為政治議題時而抵制境外商品。例如同年 2 月，韓國樂天公司因將其用地轉讓美韓共建薩德飛彈防禦系統（THAAD），便遭致中方抵制，不僅中方在其官媒宣傳抵制境內樂天百貨，還敦促國民勿往韓國旅遊，而韓國為了反制，也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投訴中方「在旅遊及銷售方面限制韓國」（〈韓國向世貿組織投訴中國抵制韓貨〉，2017 年 3 月 20 日）。2018 年 1 月與 2 月之際，前有全球連鎖的萬豪酒店在其問卷調查中把台灣、香港、澳門、西藏列為國家，後有中國賓士在其 Instagram 發布的宣傳廣告上，引用達賴喇嘛的名言「放寬心胸看萬物，視野更遼闊（Look at situations from all angles, and you will become more open）」，這兩者都遭致中國網路輿論的抵制，人民網甚至批評賓士如此行為是「與中國人民為敵」（〈中國賓士廣告引達賴名句 人民網：「與中國人民為敵」〉，2018 年 2 月 7 日）。

這種因為政治事件而發生的抵制，在中國不乏前例。2008 年，時任法國總統的薩科奇與達賴喇嘛會面，或 2012 年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島進行國有化的作為，在中國國內都引發不小的騷動，如前者引發群眾集結抗議法籍企業（家樂福），而後者則導致日本廠牌汽車遭致焚毀。中國在融入全球經濟發展的同時，時而因個別的政治事件，繼之引發與經濟發展抵觸之矛盾，中國政府又該如何處理這種矛盾呢？

楊山（2017 年 3 月 2 日）認為，中國政府一方面要煽動人民情緒，威嚇外交上的對手，另一方面又為了避免群眾行為失控，進而造成反社會秩序，於是發展出「官辦激進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根植於黨內文宣系統的新媒體平台，它既可以扮演輿論先鋒的激進角色，也可以在關鍵時刻急踩煞車，避免引發社會運動；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將抵制

限縮在個人的消費行為，「身為中國公民，你只需要以個人身份，避開韓國品牌，不去旅遊，不搞代購，換個『替代品』就可以了」；在楊山看來，這種民族主義可收可放，官方可用之因應不同需要。

這種根植於新媒體平台的民族主義有其治理的根據。依 Anderson (1991／吳叡人譯，1999) 之見，民族主義的建構離不開傳播技術，就此而言，印刷術是讓群體成員得以超越面對面、特定地理時空的限制，進而讓跨地域的想像共同體得以形成。時至今日，數位技術與網際網路的發展，讓民族主義有了不同的樣貌；與前述「官辦民族主義」相對的說法，便是中國的「網路民族主義」(cyber-nationalism)，這種論點強調民族主義自民間發起、由下而上、利用網路技術的特性。在印刷技術主導的時代，中國官方還可透過官媒（如《人民日報》、《環球日報》）建構其可收可放的民族主義，但是當一般民眾掌握傳播工具，並能透過網路來建構民族主義之時，官方就必須想方設法來加以控制與利用。

在新媒體時代，即使官媒可以建構一如楊山所言的「官辦民族主義」，這些官媒還是得面臨與其他個人媒體的競爭（如個人微博、微信公眾號），閱聽人不一定都會選擇官媒的信息來閱讀，無怪乎其領導人習近平曾說「要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張明杰，2017 年 5 月 12 日），不難想見中國官方極為擔憂失去網路這樣的輿論陣地。然而，如此憂慮是有其現實基礎的：鄭素俠（2017）研究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媒介使用之間的關係，發現民眾在接觸政治類新聞時，非官媒（微博、微信、網路社區）的接觸頻次要高於官媒（如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人民日報》），並且「愈是不經常通過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官方媒體獲取政治新聞、時事評論等消息，而是選擇通過微信微博、網路論壇等非官方媒體的線民，愈可能具有民族主義傾向」（鄭素俠，2017，頁 149）。由此可見，在新媒體時代，官方欲建構官辦的民族主義並非易事，而民族主義也比較容易從網路（而非官媒）上形成。

然而，這種自下而上的網路民族主義，並非每次都是順行官方的意志，偶爾也會擦槍走火，反傷官方自身。Cairns 與 Carlson (2016) 研究 2012 年的釣魚台事件時發現，微博上的部落客將其批判矛頭不僅指向日本，更直指

中國政府的無效率與貪腐。也因此，官方發現了民間在批判西方的同時，也可能批判國內（政府），或者批判西方與國內並不衝突，因此對於這種由草根民眾所發起、建構的對外意識形態，並不樂見其成長茁壯。

在中國日益主動捲入全球事務、又不時面臨國際紛爭的情況下，官方如何在官媒之外，找出既可強化官方立場，又可稀釋民間批判的力量，這項議題就成為我們關心的焦點所在。針對這項議題的研究，不僅能理解中國官方如何化解經濟全球化的矛盾，也能夠替官方民族主義的討論，增添一些知識積累：楊山的「官辦民族主義」令人想起 Anderson（1991／吳叡人譯，1999）的觀點，特別是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內部出現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即是歐洲各王室對於群眾性民族主義的反動。雖然這兩種民族主義有其不同時空條件的差異，無法直接類比，但我們或可借助 Anderson 的啟發，探討掌權者（政府）如何回應或抑制來自網路（民間版本）的民族主義。

就此而言，那些與官方親近的個人媒體，便成為我們觀察的焦點。本研究選取周小平的網路文章（包括部落格、微博、微信公眾號），作為分析焦點，探討這類來自民間的個人媒體如何在與官方契合的主旋律之下，闡釋中國對外的意識形態。而選取周小平的原因，首先他本來是一名經營個人部落格的寫手，2006-2007 年之間，曾獲選為中國十大部落客。目前經營的微信公眾號之粉絲數超過 77 萬（截至 2017 年 4 月時，粉絲數達 77 萬 3054 人）；周小平與共黨或官方雖無正式的雇傭關係，但他曾在 2013 年 8 月應中國中央電視台之邀，暢談「微博『大 V』的社會責任」，爾後還參加多個省分／省委所主辦的「網路時代的資訊與輿論」論壇。更重要的是，2014 年 10 月 15 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文藝工作座談會」，會中除了多名文藝工作者之外，還有兩名以「網路作家」的身分與會，其中一名便是周小平（另一名是花千芳）。根據媒體報導，習近平談及網路文學時，特別問及「聽說今天來了兩位元網路作家，是哪兩位啊？... 周小平、花千芳迅速站起來並向總書記舉手示意」，並且在座談會結束時，「習近平還走到他們面前，親切地說：『希望你們創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習近平寄語網路作家周小平花千芳：希望創作更多正能量作品〉，2014 年 10 月 16 日）。

爾後周小平（與花千芳）一炮而紅，而周小平甚至還得到官媒的發聲支持。例如，周小平在 2014 年 9 月的一篇文章〈夢碎美利堅〉，內容細數美國的種種缺失，並推崇更為先進平等的「中國夢」，部落客方舟子見聞後於 10 月 20 日展開反駁，撰文批評周文列舉的事實存在諸多錯誤，實有誤導讀者之嫌。不料方文引來官媒的集體撻伐，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網》、《環球時報》等多家媒體聯合聲援周小平，¹這種現象並不常見。傑伊（2016 年 6 月 1 日）指出，周小平代表的是「主動與批評政府觀點對峙」，這項觀察有助於我們理解，官方何以費力扶持這類來自民間的網路寫手，而我們也可以透過研究周小平的文章內容，探討官方容許的對外意識形態為何。雖然外界曾因周小平於 2018 年 3 月時辭去「四川省網路作家協會主席」一職，解讀為周已失寵於官方（中央社，2018 年 3 月 24 日），但無論真相為何，至少從 2014 至 2018 年這段將近四年的時間，共黨政府需要這類來自民間的角色，而我們亦可藉此瞭解這種親官方的網紅作家，如何建構其網路民族主義。

貳、文獻探討：官辦 vs 網路民族主義的建構

在中國，媒體對於民族主義的建構其來有自。根據黃煜、李金銓（2003）的觀點，天安門事件後，官方驚覺其合法性基礎已遭摧毀，在意識形態真空之際，轉而尋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組概念，來填補其論述上的空缺，官媒也將這組概念進行系統性的宣傳，官方話語版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逐漸進入大眾視野，而 1990 年代中期的《中國可以說不》、以及《妖魔化中國》等系列書籍的出版，更反映出官方的說法逐漸在民間發酵；1999 年中國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2001 年中美軍機在南中國海相撞等事件，更是讓民間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達到沸點（黃煜、李金銓，2003）。

這種民族主義的精神話語滲透至民間之後，參與的群眾多運用網際網路來表達民族主義的訴求，因此興起了所謂「網路民族主義」（cyber-nationalism）的討論。2003 年時，中國的齊齊哈爾發生日軍侵華時遺留下來的毒氣感染事

¹ 參見 <http://xysblogs.org/fangzhouzi/archives/10978>

件，造成多名中國本地人員受害，²事後「愛國者同盟」等 7 網站發起「對日索賠百萬線民簽名活動」，並將 4000 多頁的簽名書交由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借助網路之力展現民意，希冀影響中國政府對日的外交政策。當時的媒體鑑於網路上的輿論動能，在報導時便以「網路民族主義」為題進行討論，³有論者便就此認為「網路民族主義」的概念就此應運而生（閔大洪，2009）。

事實上，也有研究者將網路民族主義追溯至 90 年代末期發生的印尼排華事件，而後續發生的奧運聖火傳遞事件、抵制法籍企業家樂福、抗議日本將釣魚台進行國有化、以及 2016 年初的「帝吧出征 facebook」等等，都是網路民族主義的分析焦點（參考王喆，2016；Cairns & Carlson 2016; Hassid, 2012; Hyuna & Kimb, 2015; Jiang, 2012）；許多論者也認為，一種混雜了草根性質、富有新生樣貌的民族主義應運而生（楊國斌，2016；郭小安、楊紹婷，2016；王洪喆、李思閔、吳靖，2016；王喆，2016；周達、苗偉山，2016；劉海龍，2017；Qiu, 2015）。

王洪喆、李思閔、吳靖（2016）將網路民族主義的發展劃分出三個階段，分別是 1998 年至 2003 年、2008 年至 2010 年、以及 2010 年之後至今，這三個階段的行動主體，分別是 70 後（泛指 1970 年代以後出生者）的知識青年、80 後（泛指 1980 年代以後出生者）的軍迷與以男性為主體的「知情民族主義者」、以及 90 後（泛指 1990 年代以後出生者）的網絡亞文化粉絲群體：70 後的大學生網民為第一階段的行動主體，他們受到 1990 年代末的三本書—《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之啟發，深具民族意識，對官方處理國際上的重大事件表現不滿，同時帶有強烈的社會介入性；80 後除了繼承了上一代的批判性格，他們還知曉英文，兼通西方網路，並且具有商業文化的消費者特徵；90 後則是以網路商業文化與全球化跨界流動的方式來表達民族主義。90 後所建構的網路民族主

² 根據媒體報導，2003 年 8 月 3 日，一家開發公司在齊齊哈爾市的「北疆花園」社區施工時，從地下挖出 5 桶金屬罐，而罐內油狀溶劑外溢，造成 44 人毒氣感染，其中一人死亡。參見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5/Jul/926259.htm>

³ 根據王洪喆、李思閔、吳靖（2016）的看法，《國際先驅導報》於 2003 年 9 月由李慕瑾所撰寫的〈網路民族主義掀開中國民族主義新篇章〉一文，是第一次提出「網路民族主義」的概念。

義，是當下流行的樣貌，底下以 2016 年 1 月發生的「帝吧出征 facebook」為例，說明這種民族主義的特色。

該事件起因於藝人周子瑜在韓國綜藝節目揮舞中華民國國旗，此舉遭到黃安檢舉周子瑜即是台獨藝人，經三立新聞報導並引用 PTT 網友聲稱「強國人玻璃心又碎了」之後，旋即引發中國大陸網友不滿，爾後「翻牆」至台灣各大媒體臉書粉絲團，發起集體「進攻」。⁴根據王洪喆、李思閔、吳靖（2016）對此事件的觀察，90 後除了是表達民族主義的主體，他（她）們也是各種網路次文化的迷群，對於全球商業文化符號的嗅覺敏銳，兼具技術能力，能製作各種「表情包」來表達民族主義。郭小安、楊紹婷（2016）與 Qiu（2015）亦有類似的觀察，直指這是一種圖像／表情包式的民族主義。劉海龍（2017）也觀察到，這批年輕的粉絲群體，由於其生活方式全然是由網路所塑造（如學習、社交、新聞獲取、消費等），他們是從追星的過程中體認到民族身份的問題，而對於政治問題，也就會透過他們在追星過程中所養成的方法（如製作表情包）來表達。

閔大洪（2009）認為，網路民族主義的內涵有二：其一，基於互聯網傳播的民族主義言論、情緒和思潮；其二，表達、鼓動民族主義情緒，製造、擴散民族主義輿論，並在某些情況下推動現實行動以達到預期目的網路傳播行為。前述的「帝吧事件」之研究，似乎不脫這兩點的討論，然而仔細探究，這種晚近產生的網路民族主義訴求，其形式漸漸地僅限於網路上的文字與圖像，而缺乏閔大洪所謂的「現實行動」。例如前述 2003 年發生的齊齊哈爾毒氣事件，網民將線上討論的動能轉為線下行動，在蒐集 4000 多頁的聯署書後交至日本使館，但這種現實行動在後續的事件裡，為何會消失的無影無蹤呢？

事實上，官辦民族主義將網路民族主義進行推波助燃的同時，也可能給予抑制。2008 年西藏發生藏人抗議事件，一些中國留學生與海外人士認為西方媒體（特別是美國的 CNN）對此事件的報導失之偏頗，故於該年 3 月時成立「反 CNN 網站」（anti-CNN.com），號召網友蒐集相關證據反駁西方，隨

⁴ 參見 <https://goo.gl/4IKcTF>

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例行記者會也說，這種行動「完全是中國各界群眾對這種不負責任、違反職業道德的缺德報導予以自發的譴責和批判」⁵，官方等於直接承認 anti-CNN.com 的正當性。官媒中央電視台也製作【正告 CNN：網民為什麼憤怒？】專題，報導相關行動，在旁敲鑼打鼓，助長聲勢。

同年 4 月，CNN 新聞評論員 Jack Cafferty 在其政論節目「戰情室」(The Situation Room) 之中，批評中國產品的破爛不堪，中國人民猶如暴徒，此番言論激起「反 CNN 網站」的大力撻伐，並號召網民前去 CNN 北京總部張貼抗議信。由於同一時間點也有網民號召群眾抵制法國貨，⁶民間仇外氣氛濃厚，中央電視台隨後呼籲民眾理性，而「反 CNN 網站」也收斂先前激憤的態度，轉而傳達「理性愛國主義」的訴求，並指出焚燒國旗、抵制法國貨、集結大使館前的抗議行動都是非理性的，應受克制 (Jiang, 2012)。包括前述齊齊哈爾的毒氣事件在內，這些事件讓官方認識到網路民族主義應加以控制，否則稍有不慎，即會失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Liu (2006) 認為網路民族主義可以催生中國人的公共參與空間；然而這種增加公共參與的看法，特別是在現實環境中的集體行動，很可能僅限於一依王洪喆等人 (2016) 所界定—1998 至 2003 年之間，也就是網路民族主義發展的第一個階段，爾後官方就有意識地將這種參與，限縮在網際網路。

進一步而言，若不希望民間引發集體行動，又希望民間能對國際事件存在一種政治正確的看法，那麼官方會希望民間如何討論呢？官方允許民間的民族主義之內涵會是什麼？儘管目前有許多探討網路民族主義的研究，但在方法論上，這些研究分析的案例，多為突發事件（如「釣魚台事件」、「帝吧出征」），它們在事件過後隨即消逝，我們無法系統性地整理出中國網民對於西方國家的見解（或說意識形態）為何。為解決此問題，本文轉而探討那些與官方親近、且每日持續生產文章的個人媒體—周小平在新媒體所撰寫的文

⁵ 參見 <http://hk.crntt.com/doc/1006/0/6/3/10060635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606359>

⁶ 這是由於當年（2008）適逢奧運年，由北京主辦，許多支持西藏及人權團體在奧運聖火繞行巴黎的時候，試圖阻擾火炬的接力，藉以表達訴求；中國網民不滿法國警方執法不力，揚言抵制法國貨。參見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330000/newsid_7335700/7335755.stm；<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alefu-04172008105607.html>

章一試圖探討在官方允許下的民間民族主義之內涵為何。主要問題詳列如下：

- (一) 周小平撰寫的文章涉及哪些國家或地區？主要探討哪些話題？
- (二) 周小平談及各個國家或地區時持有怎樣的態度／立場為何？展現何種民族主義特徵？
- (三) 周小平探討的各類話題、談及的國家或地區，以及所持態度／立場之間，存在何種關聯？
- (四) 隨著時間的推移，周小平的文章顯示出怎樣的變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文的分析對象為周小平在部落格、微博和微信公眾號發表的自己署名的所有文章。而由現有蒐集的資料顯示，周自 2006 年起就已在部落格上撰文，爾後陸續在微博、微信等不同的網路平台上發表文章，目前部落格與微博都已停止更新，微信公眾號－「今日平說」－仍每天持續經營。基於此，我們蒐集文章的時間範圍，係從 2006 年 2 月 21 日搜尋至 2017 年 6 月 26 日之間，所有周小平自己署名的文章；而時間點的選取理由，是由於我們目前在網路上可以蒐尋取得者，最早就是 2006 年 2 月 21 日；而本研究搜尋日期的截止日為 2017 年上半年（2017 年 6 月 30 日），在此期間最後一篇文章發表於 2017 年 6 月 26 日，即以此作為截止日。

由於研究對象是周在 12 年間發表的所有文章，本文的分析物件實際上是總體（population），而非通過抽樣方法獲取的樣本（sample）。兩位傳播科系碩士研究生經訓練熟悉文章篩選條件後，在周的部落格、微博和微信公眾號「今日平說」中瀏覽並挑選出署名「周小平」的全部文章。最終蒐集 506 篇文章納入內容分析，其中部落格的文章計有 124 篇（24.5%）、微博 12 篇（2.4%）、微信公眾號 370 篇（73.1%）。

二、內容分析說明

本研究內容分析類目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周小平文章的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周小平文章探討的國家或地區、探討的話題，第三部分則是周小平文章中顯示出的民族主義特徵。

第一部分文章的基本資料包括發表日期、字數、來源（部落格、微博、或微信公眾號）、閱讀量、評論量（適用於部落格和微博文章）、點讚量和打賞量（適用於微信公眾號文章）。此部分也記錄文章標題的呈現方式，包括標題的字數、是否使用感歎號和使用感歎號的數量。

第二部分周小平文章探討的國家和地區的類目列表主要來自研究人員閱讀周文章過程中的觀察，包括中國大陸、美國、中國香港、台灣、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朝鮮（北韓）和其它。編碼中，一篇文章可以談及一個或多個國家或地區，當所談及的國家或地區不在列表之中，該項目被標記為「其它」。當一篇文章主要談論非中國大陸的國家或地區但同時提及中國大陸，則只標記它所談論的非中國大陸國家或地區。

為了分析周小平文章涵蓋的具體內容，本文對文章探討的主要話題進行了編碼。話題項目的編碼類目主要來自於研究人員和編碼員在信度測試階段對樣本文章的閱覽總結和歸類分析，經過幾輪仔細調整，最終確定的話題類目包括以下幾類：國家政策、社會事件、恐怖主義、政治、軍事、歷史、環境、經濟分析、社會文化現象、自然災害、個人故事、闢謠、針對特定人物和其它。每個類目的編碼操作定義參考表一。編碼中，當一篇文章談及的話題無法歸類到已有類目，該項目被標記為「其它」；當一篇文章談及多個話題，則標記為「混合」。

表一：周小平文章話題編碼定義

主要話題	定義
國家政策	討論政府頒布的新的法律和政策，主要針對中國大陸
社會事件	討論公共事件和案件，例如反腐案件、辱母案等。
恐怖主義	評論國際範圍內恐怖組織的活動和各國的應對
政治	政治議題，例如國際關係、領導人會晤、半島局勢等
軍事	軍事議題，例如航母、軍事演習、武器買賣、局部軍事衝突等
歷史	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文獻
環境	自然議題，例如霧霾、沙塵暴、全球暖化等
經濟	經濟議題，例如股市、房價、貿易等
社會文化現象	文化議題，例如瓷器、影視、音樂、體育等
個人故事	講述周小平的個人經歷和感觸
闢謠	澄清或反駁正在流傳的（周小平認為的）假消息
人物	聚焦某個公眾人物，對其行為和思想的評判
其它	文章探討的話題不包含在以上任何類目中
混合	文章話題內容涵蓋以上多個類目

第三部分為周小平文章中顯示出的民族主義特徵。主要分析文章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的國家或地區所持態度／立場，意在對比周的文章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的不同態度，從而展示周文章的民族主義傾向。通過信度測試階段對樣本文章的初步分析，我們發現周小平對中國大陸的態度顯示出區分對待執政黨和普通民眾的特點。以此為依據，我們對以下三個項目進項編碼：對中國大陸執政黨和政府（共產黨和中國大陸主要政府機構）的態度，對中國大陸民眾（知識分子、媒體、政府和社會機構普通從業人員）的態度，以及對非中國大陸的國家或地區的態度。此三個項目的編碼類目均為讚揚、批判、中立。

三、編碼與信度

本研究由兩名傳播科系的碩士研究生擔任編碼員。在編碼進行之前，研

究人員準備了相近的編碼表和編碼指南，並對兩位元編碼員進項了訓練，確保編碼員對於編碼類目的內涵具有準確的認知和共識。

在信度測試階段，我們從研究對象總體（506 篇文章）中隨機抽取了 97 篇文章（約佔總數的 19%）作為測試樣本。Wimmer 與 Dominick（2003）認為，從總數抽取 10%至 25%的份額進行信度檢測是適當的。根據初步信度測試的結果，我們對信度較低的類目進行的相應的調整和修正。經過再次測試，核心編碼類目的編碼員相互信度（Krippendorff's alpha）在 .82 至 1.00 之間，達到較高的編碼互相信度（引自 Riffe, Lacy, & Fico, 2014: 121）。核心類目的編碼員互相信度參見表二：

表二：編碼類目的編碼員互相信度

編碼類目	編碼員互相信度	
	Agreement %	Krippendorff's Alpha
話題	96.91	0.96
國家和地區		
中國大陸	96.91	0.93
美國	97.94	0.96
中國香港	100	--
台灣	100	1.00
俄羅斯	100	--
英國	100	--
法國	100	--
德國	100	--
日本	100	1
韓國	100	1
朝鮮	100	1
民族主義		
對中國大陸執政黨和政府	93.81	0.82
對中國大陸普通民眾	94.85	0.86
對非中國大陸國家或地區	97.94	0.95

肆、研究發現

首先，从發表平台來看，周小平的 506 篇網路文章绝大部分發表在微信公眾號（73.1%），其次是部落格（24.5%），只有少量发表在微博（12%）。這些文章的發表年份主要集中在 2012 至 2017 年之間，其中，部落格為 2006 年至 2010 年主要的發佈平台，微信公眾號為 2014 年之後主要的發佈平台。發表年份與發表平台數據參見表三。文章字數和閱讀量方面，大多數文章字數處在少於 3000 字或 3000 到 7000 字的區間（88.8%），極少數文章的字數多於 11000 字（2.2%）。從文章閱讀量來看，近一半的文章閱讀量大於 10 萬次（58.1%）。

表三：周小平文章的發表年份与發表平台

發表年份	發表平台			總數
	部落格	微博	微信公眾號	
2006	45	0	0	45
2007	1	0	0	1
2008	1	0	0	1
2009	1	0	0	1
2010	1	0	0	1
2012	41	0	0	41
2013	22	0	0	22
2014	5	6	12	23
2015	3	5	29	37
2016	4	1	175	180
2017	0	0	155	155
總數	124（24.5%）	12（2.4%）	371（73.1%）	507

對比部落格和微信公眾號兩個主要發表平台發現，微信公眾號文章的閱讀量($M=4.46$, $SD=1.09$) 大於部落格文章閱讀量($M=2.29$, $SD=1.17$)，這兩個平台文章的閱讀量之間存在數據顯著性差異 $t(493)=18.79$, $p<.01$ 。同時，兩個平台文章的字數也存在數據顯著性差異 $t(493)=3.21$, $p<.01$ ，微信公眾號文章的字數($M=1.77$, $SD=.65$)大於部落格文章的字數($M=1.52$, $SD=.81$)。另外，微信公眾號文章標題字數($M=5.95$, $SD=1.21$)與部落格文章標題字數也顯著多

於部落格文章標題字數($M=3.50$, $SD=1.21$), $t(493)=19.59$, $p<.01$; 微信公眾號文章標題感歎號數量($M=1.74$, $SD=.81$)也顯著多於部落格文章標題感歎號數量($M=1.07$, $SD=.26$), $t(493)=13.75$, $p<.01$ 。t 檢驗法分析結果參見表四。

表四：t檢驗法對比部落格與微信公眾號的主要描述統計

	部落格		微信公眾號		t-test	p
	M	SD	M	SD		
字數	1.52	.81	1.77	.65	3.21	.002
閱讀量	2.29	1.17	4.46	1.09	18.79	.000
標題字數	3.50	1.21	5.95	1.21	19.59	.000
標題感歎號數量	1.07	.26	1.74	.81	13.75	.000

除閱讀量之外，評論量、點讚量和打賞量也是衡量周小平文章在讀者當中的接受程度的重要標準。但由於平台功能的限制，發表在部落格和微博的文章只能統計評論量，而發表于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只能統計點讚量和打賞人數。內容分析結果顯示，部落格和微博文章中有近一半的評論量少於 50 條（47.8%），大約四分之一的文章的評論量在 51 至 200 條之間，只有少部分文章的評論量大於 500 條（19.9%）。微信公眾號文章中，點讚量處在小於 7000 次的文章占 72.1%，僅有 4.3% 的文章的點讚量大於 11000 次；打賞人數小於 2000 的文章占 96.90%，僅有 2.7% 的文章測打賞人數大於 3500 人。另外，Tau 分析發現，所有文章的閱讀量、微信公眾號文章的點讚量和打賞人數，都與發表年份呈現正相關的關係。Tau 分析的詳細數據參見表九。

研究問題一旨在探討周小平文章中談及的國家或地區和主要話題的範疇，編碼結果顯示周小平文章最常談論的是中國大陸（58%），其次是美國（25.8%），其它國家或地區所佔的比重相比中國大陸和美國而言非常小。例如，談論台灣的文章占有所有文章的 3.2%，緊隨其後的韓國占 1.8%，日本占 1.4%。談論中國香港、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和朝鮮的文章數量均小於 1%。另外，存在小部分文章（5.5%）談及了多個國家，極少量的文章談及了非已有列表里的國家或地區（1.6%）。國家和地區詳細數據參見表五。

文章談及的主要話題方面，政治（29%）、社會文化現象（17.2%）、社會事件（15.6%）是最常見的話題，此外也有較多文章談及經濟（9.1%）、個

人故事（7.9%）、人物（7.1）以及軍事（5.3%）話題。恐怖主義（0.6%）是被談及最少的話題。極少量的文章（0.8%）涵蓋了多個話題類目。總體而言，周小平文章談及的話題比較分散，不存在像國家或地區分類中一個或兩個類目佔據很大比例的情況。話題類目詳細數據參見表六。

表五：周小平文章談及國家或地區

國家或地區	則數 (N)	百分比 (%)
中國大陸	294	58.0
美國	131	25.8
中國香港	3	.6
台灣	16	3.2
俄羅斯	4	.8
英國	1	.2
法國	2	.4
德國	1	.2
日本	7	1.4
韓國	9	1.8
朝鮮	3	.6
其它	8	1.6
混合	28	5.5
總數	507	100.0

表六：周小平文章談及主要話題

主要話題	則數 (N)	百分比 (%)
國家政策	9	1.8
社會事件	79	15.6
恐怖主義	3	.6
軍事	27	5.3
歷史	6	1.2
環境	9	1.8
經濟	46	9.1
社會文化現象	87	17.2
個人故事	40	7.9
闢謠	6	1.2
人物	39	7.7
其它	5	1.0
政治	147	29.0
混合	4	.8
總數	507	100.0

研究問題二探討周小平在其文章中對不同國家或地區所持的態度和立場，編碼結果顯示周小平文章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國家或地區持有明顯的不同態度，其中，在中國大陸方面，周小平文章談及執政黨和政府時與談及普通民眾時也顯示出不同的態度。具體而言，對待中國大陸執政黨和政府，即中國共產黨和主要政府機構，所有的文章都持讚揚（72.8%）或中立（27.2%）的態度，不存在任何一篇文章表現出批判的態度；對待中國大陸的普通民眾，包括知識分子、媒體，以及政府和社會機構普通從業人員，絕大多數文章持中立（80.3%）的態度，持批判態度的文章數量（13.2%）略多於持讚揚態度的文章數量（6.5%）。對待非中國大陸國家或地區，周小平文章則顯示出于其對待中國大陸執政黨和政府截然相反的態度：幾乎所有的文章都吃批判（68.0%）或者中立（31.6%）的態度，只有極少數文章對非中國大陸國家或地區持有讚揚的態度（0.4%）。周小平文章對不同國家或地區所持態度編碼結果參見表七。

研究問題三探討周小平對不同國家或地區所持的態度與其文章中談及的具體國家或地區以及談論的話題之間有怎樣的關聯，旨在進一步展示周小平文章的民族主義的特徵。為了回答這個研究問題，我們首先對談及國家或地區和文章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的態度進行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對待中國大陸執政黨和政府態度方面，除了談及俄羅斯（4篇）、朝鮮（3篇）和英國（1篇）的8篇文章之外，所有的文章對中國大陸執政黨和政府都是讚揚多於中立，無任何批判態度【 $\chi^2 = 49.05, df = 12, p < .001$ 】；在對待中國大陸民眾方面，無論談及任何國家和地區，態度都已中立為主【 $\chi^2 = 45.74, df = 24, p < .05$ 】；在對待非中國大陸國家或地區方面，除了談及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文章中各自有一篇對非中國大陸國家和地區持讚揚態度，周小平對其它國家或地區主要持批判態度【 $\chi^2 = 179.27, df = 24, p < .001$ 】。周小平文章談及的國家和地區與其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的態度之交叉分析詳細數據參見表七。

表七：周小平文章談及國家和地區與其對中國大陸態度的交叉分析

國家或地區	中國大陸 (N=294)	美國 (N=131)	香港 (N=3)	台灣 (N=16)	俄羅斯 (N=4)	英國 (N=1)	法國 (N=2)	德國 (N=1)	日本 (N=7)	韓國 (N=9)	朝鮮 (N=3)	其它 (N=8)	混合 (N=28)	總計 (N=507)	χ^2 值
對中國大陸執政黨 和政府態度	讚揚	63.3%	92.4%	100%	81.3%	75.0%	0%	100%	100%	57.1%	66.7%	62.5%	71.4%	72.8%	49.05***
	中立	36.7%	7.6%	0%	18.8%	25.0%	100%	0%	42.9%	0%	33.3%	37.5%	28.6%	27.2%	
	批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對中國大陸的民選 態度	讚揚	9.5%	1.5%	0%	6.3%	25.0%	0%	0%	0%	0%	33.3%	0%	0%	6.5%	45.74*
	中立	71.4%	93.1%	100%	93.8%	75.0%	100%	100%	100%	100%	66.7%	87.5%	89.3%	80.3%	
	批判	19.0%	5.3%	0%	0%	0%	0%	0%	0%	0%	0%	12.5%	10.7%	13.2%	
對非中國大陸國家 或地區態度	讚揚	0.3%	0.0%	0%	0%	25%	0%	0%	0%	0%	0%	0%	0%	0.4%	179.27***
	中立	49.3%	2.3%	0%	0%	25%	100%	0%	0%	0%	33.3%	37.5%	21.4%	31.6%	
	批判	50.3%	97.7%	100%	100%	50%	0%	100%	100%	100%	66.7%	62.5%	78.6%	68.0%	

* $p < .05$, ** $p < .01$, *** $p < .000$

我們同時對周小平文章談論的話題和文章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國家或地區的態度進行了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對待中國大陸執政黨和政府態度方面，經濟類、個人故事類話題文章以中立態度為主，其它話題均以讚揚態度為主，其中政治類話題文章中持讚揚態度的文章所佔比例最高【 $\chi^2 = 84.64, df = 13, p < .001$ 】；在對待中國大陸民眾方面，讚揚和批判的態度多見于社會文化現象話題的文章中，中立態度多見于政治類話題文章中【 $\chi^2 = 48.42, df = 26, p < .05$ 】；在對待非中國大陸國家或地區方面，批判態度主要集中在政治類話題文章中，讚揚態度多出現與社會文化現在和人物話題文章中，中立態度則分散于其它各類話題之中【 $\chi^2 = 100.99, df = 26, p < .001$ 】。周小平文章談論話題與其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的態度之交叉分析詳細數據參見表八。

表八：周小平文章談論話題與其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態度的交叉分析

話題	國家 政策	社會 事件	恐怖 主義	軍事	歷史	環境	經濟	社會文 化現象	個人 故事	關誦	人物	其它	政治	混合	總計	χ^2 值
	(N=9)	(N=7 9)	(N=3)	(N=27)	(N=6)	(N=9)	(N=46)	(N=87)	(N=40)	(N=6)	(N=39)	(N=5)	(N=147)	(N=4)	(N=507)	
對中國大陸執政 黨和政府態度	讚揚	77.8%	81.0%	100%	70.4%	66.7%	34.8%	82.8%	40.0%	50.0%	69.2%	40.0%	87.1%	50.0%	72.8%	
	中立	22.2%	19.0%	0%	29.6%	33.3%	65.2%	17.2%	60.0%	50.0%	30.8%	60.0%	12.9%	50.0%	27.2%	84.64***
	批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對中國大陸的民 眾態度	讚揚	22.2%	7.6%	0%	0%	0%	0%	10.3%	12.5%	0%	12.8%	20.0%	2.7%	25.0%	6.5%	
	中立	66.7%	70.9%	100%	100%	77.8%	95.7%	69.0%	80.0%	83.3%	71.8%	60.0%	86.4%	75.0%	80.3%	48.42*
	批判	11.1%	21.5%	0%	0%	22.2%	4.3%	20.7%	7.5%	16.7%	15.4%	20.0%	10.9%	0%	13.2%	
對非中國大陸國 家或地區態度	讚揚	0%	0%	0%	0%	0%	0%	1.1%	0%	0%	2.6%	0%	0%	0%	0.4%	
	中立	44.4%	24.1%	0%	25.9%	50.0%	54.3%	32.2%	72.5%	66.7%	41.0%	100%	11.6%	50.0%	31.6%	100.99***
	批判	55.6%	75.9%	100%	74.1%	50.0%	45.7%	66.7%	27.5%	33.3%	56.4%	0%	88.4%	50.0%	68.0%	

* $p < .05$, ** $p < .01$, *** $p < .000$

研究問題四探討周小平文章隨著時間的推移顯示出的變化，我們通過用 Kendall's Tau 分析發表年份與其它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來回答這個問題。分析結果顯示，文章發表年份與文章字數【Tau=.213, $p<.01$ 】、閱讀量【Tau=.59, $p<.01$ 】、打賞人數【Tau=.254, $p<.01$ 】、標題字數【Tau=.66, $p<.01$ 】、標題中感歎號數量【Tau=.46, $p<.01$ 】均呈現正相關的關係。Tau 相關性分析的詳細數據參見表九。

表九：發表年份與主要描述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1	2	3	4	5	6
1.发表年份	--					
2.文章字数	.213**	--				
3.阅读量	.592**	.159**	--			
4.点赞量	.586**	.065	.537**	--		
5.打赏人数	.254**	.154**	.349**	.607**	--	
6.标题字数	.658**	.199**	.417**	.448**	.225**	--
7.标题感叹号	.459**	0.06	.334**	.357**	.218**	.474**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我們同時將周小平文章發表年份與其對中國大陸和非中國大陸國家和地區的態度、談及的國家和談論的話題進行交叉分析，來觀察這些變量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的變化。分析結果顯示，對非中國大陸國家持批判態度的文章隨著時間的推移明顯增長，對中國大陸執政黨和政府持讚揚態度的文章在 2016 年以後減少，對中國大陸民眾持讚揚態度的文章在 2016 年以後也出現減少的趨勢。在談及的國家方面，在 2006 至 2010 年之間，周小平的文章只談論中國大陸。在 2012 至 2014 年之間，主要談論的非中國大陸國家只有美國、日本和朝鮮。2015 年以後周小平才逐漸開始談論西歐國家（英、法、德）、俄羅斯、韓國和中國香港。在話題方面，在 2006 至 2010 年之間，周小平的文章主要集中談論經濟、社會文化現象和個人故事，而 2012 年至 2017 年之間，其文章的話題以政治、社會事件和社會文化現象為主。發表年份與核心變量的交叉分析參見表十。

表十：周小平文章發表年份與核心變量交叉分析

發表年份	2006 (N=45)	2007 (N=1)	2008 (N=1)	2009 (N=1)	2010 (N=1)	2012 (N=41)	2013 (N=22)	2014 (N=23)	2015 (N=37)	2016 (N=180)	2017 (N=155)	總計 (N=507)	χ^2 值
對中國大陸執政 黨和政府態度													
讚揚	1	0	1	0	0	31	15	23	31	158	109	369	
中立	44	1	0	1	1	10	7	0	6	22	46	138	153.66***
批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對中國大陸的民 眾態度													
讚揚	0	0	0	0	0	0	0	7	4	17	5	33	
中立	44	1	0	1	1	23	13	13	31	141	139	407	102.30***
批判	1	0	1	0	0	18	9	3	2	22	11	67	
對非中國大陸國 家或地區態度													
讚揚	0	0	0	0	0	0	1	0	0	1	0	2	
中立	44	1	1	1	1	13	14	3	13	24	45	160	154.19***
批判	1	0	0	0	0	28	7	20	24	155	110	345	

表十：周小平文章發表年份與核心變量交叉分析（續一）

發表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計	χ^2 值
	(N=45)	(N=1)	(N=1)	(N=1)	(N=1)	(N=41)	(N=22)	(N=23)	(N=37)	(N=180)	(N=155)	(N=507)	
國家政策	0	0	0	0	0	0	1	1	1	5	1	9	432.82***
社會事件	0	0	1	0	0	2	1	4	6	52	13	79	
恐怖主義	0	0	0	0	0	0	0	0	2	0	1	3	
軍事	0	0	0	0	0	0	0	0	2	4	21	27	
歷史	0	0	0	0	0	0	1	0	0	1	4	6	
環境	0	0	0	0	0	0	0	0	2	3	4	9	
經濟	17	0	0	0	0	1	0	2	1	10	15	46	
社會文化現象	7	0	0	0	0	2	7	10	13	31	17	87	
個人故事	16	0	0	1	0	2	1	3	2	10	5	40	
闢謠	0	0	0	0	0	0	0	0	0	2	4	6	
人物	3	0	0	0	1	10	3	0	2	13	7	39	
其它	1	1	0	0	0	0	1	0	0	0	2	5	
政治	0	0	0	0	0	24	7	2	6	47	61	147	
混合	1	0	0	0	0	0	0	1	0	2	0	4	

表十：周小平文章發表年份與核心變量交叉分析（續二）

發表年份	2006 (N=45)	2007 (N=1)	2008 (N=1)	2009 (N=1)	2010 (N=1)	2012 (N=41)	2013 (N=22)	2014 (N=23)	2015 (N=37)	2016 (N=180)	2017 (N=155)	總計 (N=507)	χ^2 值
中國大陸	45	1	1	1	1	25	21	18	31	94	56	294	
美國	0	0	0	0	0	11	0	5	4	62	49	131	
香港	0	0	0	0	0	0	0	0	0	0	3	3	
台灣	0	0	0	0	0	0	0	0	0	12	4	16	
俄羅斯	0	0	0	0	0	0	0	0	0	3	1	4	
英國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法國	0	0	0	0	0	0	0	0	2	0	0	2	109.13***
德國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日本	0	0	0	0	0	1	0	0	0	2	4	7	
韓國	0	0	0	0	0	0	0	0	0	2	7	9	
朝鮮	0	0	0	0	0	0	1	0	0	1	1	3	
其它	0	0	0	0	0	1	0	0	0	2	5	8	
混合	0	0	0	0	0	3	0	0	0	1	24	28	

* $p < .05$, ** $p < .01$, *** $p < .000$

伍、結論與討論

在中國日益捲入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如何對其人民解釋國際政治的矛盾，成了官方關心的要務。尤以近年來網際網路的發展，一方面讓官方可以藉此工具傳遞其官方民族主義的話語，另一方面民眾亦可獲得表達意見的機會，甚至建構民間版的網路民族主義，然而在官方的限制之下，網路民族主義愈來愈縮限於文字與圖像的表達，致使論者擔心，聚焦在圖像／表情包的層次，恐將意義流於表面，甚至「這種具有強大視覺衝擊的集體符號展示與視覺衝擊，正從另一個角度折射出參與者在理性溝通、深度交流方面的欠缺」（郭小安、楊紹婷，2016，頁 70）。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整個網路民族主義的動能退縮至此？或者，反過來問，中國官方在民間社會施以何種作用，讓網路民族主義的討論能量逐漸導向官方所欲的方向？這即是本研究所解答的問題。

根據 Hughes（2000）的觀察，自上世紀 90 年代末的印尼排華事件發生後，來自中國民間發動的民族主義有其激進的批判性格，特別是在網路上的言論，除了針對中國政府處理涉外事務的無能，還會批判政府行政的無效率。這讓中國政府意識到，這種網路上的民族主義必須嚴加控制，否則反傷自身，故而在讓人民獲得有限的言論表達空間之外，又要不至於威脅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如何拿捏這中間的尺度，成為共黨政府關心的要務。本文認為，一方面，官方會運用其媒體大力宣傳對外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會運用民間親官方的力量，稀釋來自草根的網路民族主義之社會動能。

本研究關注後者，亦即探討這種親官方的民間力量如何展現官方允許的網路民族主義，並試圖解析其內涵。首先，根據前文分析，周小平僅對於中國大陸（與極少數國家）表現正面的態度，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皆呈現負面的批判。例如，周小平討論最多的國家是中國大陸與美國，這兩者占比將近八成四，從他多半對於中國官方施以讚美、而對其他國家施以批判的立場來看，這也反映了中國在實現偉大的「復興之路」時，周小平認為美國就是最

主要的競爭對手。例如周小平在〈我們依舊喜歡你，像風再走兩萬五千里去看你〉之中寫到：

……當美國人掌握著如此龐大的資源和全球霸權為所欲為的時候。我們要麼恭順地走進那片黑暗，要麼發起一輪新長征，去拼出一個全新的未來。

和多年前一樣，我們相信什麼，就終會得到什麼。因此周小平時常都會問身邊的所有人：「你相信嗎？你相信我們這個民族終會取得勝利嗎？你相信我們能戰勝美國嗎？你相信未來維持世界秩序的是我們中國人嗎？」

此外，在民族主義的交叉分析之中，相比於其他話題，周小平對於中國大陸共產黨／政府的讚揚，多集中於政治類話題；相對而言，對於中國大陸民眾的讚揚（與批判），多集中於社會文化現象，而對於中國大陸民眾表現出中立的態度，多集中於政治類話題。這意味著，在周小平看來，中國大陸民眾可以參與社會文化現象的討論，且無論好壞，周小平都會給予一定的評價。然而針對政治議題而言，周小平認為人民像是一種中性的存在，或說於政治而言是無涉的。進一步而言，周小平對於民族主義的觀點，即是汪宏倫（2014）所謂的「維護既有政體的民族主義」，這是一種對於國家主權的強調高於人民主權的概念。周小平的文章讓我們看到，人民反抗國外勢力（主要是美國）的目的最終是要維護共黨政權，而除却此目的之外，人民在政治議題中就可以缺位。換句話說，周小平試圖在對外意識形態與對內維護政權之間建構連結的關係，而前述網路民族主義所開展出來的人民對外事務的討論與政治參與空間（如批評政府處理對外事務的失當與遞交請願書的集體行動），全然消失在周文之中。

其次，根據新聞報導，共黨政府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簡稱國家網信辦）於 2011 年 5 月成立，主要職責是「落實互聯網資訊傳播方針政策和推動互聯網資訊傳播法制建設，指導、協調、督促有關部門加強互聯網資訊內容管理」（光明日報，2011 年 12 月 22 日）；三年後（2014），由其領導人習近平親自擔任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組長，同時籌建辦公室（簡稱中央網信辦），由國家網信辦承擔職責（觀察者網，2014 年 8 月 28 日）。

這兩個辦公室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這表示「習近平親抓親管網絡...新組建的網信辦大權在握，直接代表中央處理一切與互聯網資訊管理相關的工作，並負責協調黨、政、軍、警、人大等各相關部門，對網絡監管採取統一行動」(〈設 20 局級單位 到處招兵買馬 網信辦大擴張 新總部將落成〉，2015 年 1 月 12 日)。

另一方面，2012 年中國大陸微博用戶數量 3.09 億，2013 年年中時卻降至 2.76 億(簡立欣，2014 年 7 月 25 日)；相對而言，微信的用戶從 2012 年 9 月時的 2 億，到 2013 年 1 月時已突破 3 億(〈微信用戶不到兩年突破 3 億〉，2013 年 1 月 18 日)。換言之，這兩大線上社交平台的用戶數，在 2013 年時已呈現「黃金交叉」，爾後微信用戶數更是勢如破竹，該平台所屬公司的主席馬化騰表示，在 2018 年春節時公佈的月活躍用戶數已超過 10 億(〈馬化騰：微信全球月活躍用戶數首次突破十億〉，2018 年 3 月 5 日)。在中共官方看來，微信顯然是「輿論重地」，極待治理，而在治理機制尚未成熟以前，便需要親官方的民間寫手加以協助，而這也是周小平之所以受到注目的興起背景

從周小平文章發表的字數與數量來看，微信公眾號都已超越部落格與微博：在 2014 年時，微信公眾號的文章數量(12 篇)，首度超越部落格與微博的總和(11 篇)，自此之後差距更不斷擴大。若將周小平(與花千芳)在 2014 年 10 月時受領導人召見，視之為官方為了因應新媒體的發展需要，而吸納民間寫手的起始，那麼我們也可從周小平從部落格、微博、繼而將經營重心轉移至微信的過程中，發現他被吸納後的立場變化。

表十一：部落格與微信平台對於中國政府的態度比較

	部落格	微信
讚揚	47%	81%
中立	53%	19%

從表十一中可看出，2006 年 1 月，周小平開始在部落客發表的文章，其對於政府的態度是持中立看法的比例超過五成，亦即從文章中判斷不出周小

平是否護黨愛國。然而，就在 2014 年 2 月周小平逐漸將經營重心轉往微信之後，他對於政府的讚揚提高至八成，這表示周小平已確立其「維護既存政體的民族主義」之立場。這或許是一種「愛國網紅」的特性，亦即能配合政府的需要來彈性調整自己的立場，即使先前對於政府的看法並非都是讚美與正面。

最後，本文試圖在官方民族主義與網路民族主義之間，建構「愛國網紅」的民族主義之討論，然而綜觀全文，這種討論包含著許多限制。特別是，對於愛國網紅的民族主義之內涵，我們主要採行周小平針對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立場／態度進行分析，如此不免過於簡化。其次，官媒的對外報導或評論，與愛國網紅之間的差異是什麼？這點是透析官方民族主義與愛國網紅的民族主義之間的重要關聯，限於篇幅，本文也未能有所交代。再者，2014 年周小平將其經營的重心往微信發展，其原因究竟是配合政府治理的需要，還是他看到微信上營利的前景？這點也有待後繼研究。

參考書目

- 〈習近平寄語網路作家周小平花千芳：希望創作更多正能量作品〉（2014 年 10 月 16 日）。《澎湃新聞》。上網日期：2018 年 3 月 29 日，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1399
- 〈馬化騰：微信全球月活躍用戶數首次突破十億〉（2018 年 3 月 5 日）。《新華網》。上網日期：2018 年 3 月 29 日，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05/c_1122488991.htm
- 〈微信用戶不到兩年突破 3 億〉（2013 年 1 月 18 日）。《人民郵電報》。上網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取自 <http://www.c114.com.cn/news/52/a741599.html>
- 〈新浪微博發佈活躍用戶數，網友：和微信之間差多少個支付寶？〉（2017 年 2 月 27 日）。《每日頭條》。上網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取自 <https://kknews.cc/tech/p8q3gep.html>
- 〈一度被力捧 周小平丟四川作協主席頭銜〉（2018 年 3 月 24 日）。《中央社》。上網日期：2018 年 3 月 29 日，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803240123-1.aspx>
- 〈設 20 局級單位 到處招兵買馬 網信辦大擴張 新總部將落成〉（2015 年 1 月 12 日）。《星島日報》。上網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取自 <https://goo.gl/iWCzqY>

-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設立〉（2011年12月22日），《光明日報》。上網日期：2017年12月1日，取自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1-12/22/nw.D110000gmrb_20111222_7-04.htm?div=-1
- 〈國家網信辦重組 國務院授權其負責互聯網內容管理執法〉，《觀察者網》。上網日期：2017年12月1日，取自
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08_28_261572.shtml
- 〈韓國向世貿組織投訴中國抵制韓貨〉（2017年3月20日），《BBC 中文網》。上網日期：2017年12月1日，取自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39324756>
- 〈中國賓士廣告引達賴名句 人民網：「與中國人民為敵」〉（2018年2月7日），《上報》。取自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4901
- 王洪喆、李思閔、吳靖（2016）。〈從「迷妹」到「小粉紅」：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下的國族身分生產和動員機制研究〉，《國際新聞界》，36: 33-53。
- 王喆（2016）。〈今晚我們都是帝吧人：作為情感化遊戲的網路民族主義〉，《國際新聞界》，36: 75-90。
- 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北：時報。（原書：Anderson, B.[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NY: Verso）
- 汪宏倫（2014）。〈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文化研究》，19:189-250。
- 李金銓（2002）。〈中國媒介的全球性與民族性：話語、市場、科技以及意識形態〉。取自 <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74-200209135.pdf>
- 周達、苗偉山（2016）。〈競爭性的圖像行動主義：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一種視覺傳播視角〉，《國際新聞界》，36: 129-143。
- 張明杰（2017年5月12日）。〈牢牢把握網上輿論工作主動權——學習習近平關於做好網上輿論工作的重要論述〉，《環球視野》。上網日期：2017年12月1日，取自 http://www.globalview.cn/html/zhongguo/info_17898.html
- 張銘坤譯（2017年11月10日）。〈APEC 習近平：全球化是不可逆轉潮流〉，《中央社》。上網日期：2017年12月1日，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11100231-1.aspx>。
- 郭小安、楊紹婷（2016）。〈網路民族主義運動中的米姆式傳播與共意動員〉，《國際新聞界》，36: 54-74。
- 傑伊（2016年6月1日）。〈把果凍釘在牆上？他們真的這樣管住了互聯網〉，《端傳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1-mainland-fiftycents/>
- 閔大洪（2009）。〈對中國網路民族主義的觀察、分析——以中日、中韓關係為物件〉。取自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103.html>
- 簡立欣（2014年7月25日）。〈微博沒落 騰訊不再推新功能〉，《旺報》。上網日期：2017年12月15日，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725001988-260309>

- 黃煜、李金銓（2003）。〈90 年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媒體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0: 49-79。
- 楊國斌（2016）。〈英雄的民族主義粉絲〉，《國際新聞界》，36:25-32。
- 鄭素俠（2017）。〈中國線民的民族主義及其影響因素：一個媒介使用的視角〉，《國際新聞界》，19(12): 138-153
- 劉海龍（2017）。〈像愛護愛豆一樣愛國：新媒體與「粉絲民族主義」的誕生〉，《現代傳播》，4: 27-36。
- Bislev, A., & Li, X.(2014). Conceptualizing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e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an era of China’s global ri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1(1-2), 21-33
- Cairns, C., & Carlson, A. (2016). Real-world islands in a social media sea: Nationalism and censorship on Weibo during the 2012 Diaoyu/Senkaku crisis. *The China Quarterly*, 225,23-49
- Liu, S.D.(2006).China’s popular nationalism on the internet. Report on the 2005 anti-Japan network struggl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1), 144-155.
- Hyuna, K. D., & Kimb, J-h.(2015).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sustaining the status quo: online political expression, nationalism, and system support in Chin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7), 766-781.
- Hassid, J. (2012).Safety valve or pressure cooker? Blogs in Chinese political lif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212-230
- Hughes, C.R.(2000).Nationalism in Chinese cyberspac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3(2),195-209.
- Jiang(2012), Y.(2012). *Cyber-Nationalism in China: Challenging western media portrayals of Internet censorship in China*. South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Adelaide Press.
- Qiu, L.C.(2015).Go Baobao! Image-Driven nationalism, generation post-1980s, and mainland students in Hong Kong. *Positions*, 23(1), 145-165.
- Riffe, D., Lacy, S., & Fico, F. (2014). *Analyzing media messages: Using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in research(3rd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ullivan, J. (2014). China’s Weibo: Is faster different? *New Media & Society*, 16, 24-37.
- Yang, G. (2009).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Zheng, Y. (2008).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ism of patriotic online celebrity” and
its implication in China: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Zhou Xiaoping’s papers.**

Zhongbo Liu, Juan Chen, & Chengyuan Shao*

ABSTRACT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official nationalism” and “cyber nationalism” in mainland China. The former requires the latter to show the loyalty and patriotism to the party-state, but the latter sometimes exceeds the official control, even producing criticism to for the official. In recent years, social media has emerged. The CCP regards such emerging media (WeChat) as an important sensor for the public opinion. Before it can be fully controlled, in order to guide the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ternet, CCP needs the help of folk writers. The “nationalism of patriotic online celebrity”, which was supported by the official and constructed by online celebrity, is formed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ism of patriotic online celebrity”. The research object is based on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pro-official celebrity, Zhou Xiaoping, and examines his attitude/position towards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y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among the 506 articles analyzed, Zhou Xiaoping has the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of attitude between China and non-China countries or regions. When talking about the former, he is more focused on praise, and the political topic has the highest praise rate (and There is no criticism); for the latter, it is mostly criticism.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Zhou Xiaoping’s evaluation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people (whether praise or criticism) is mostly focused on social and cultural topics, while on political topics, it is neutral, which also shows that in Zhou Xiaoping’s view people who live in China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Zhou Xiaoping’s nationalism is a kind of “nationalism that maintains the existing political power”, which is patriotism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party. In contrast to the early Internet nationalism, this nationalism has no criticism of domestic affairs.

Keywords: cyber nationalism; Mainland China; official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online celebrity

* Zhongbo Liu, Acco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mail: liupublius@gmail.com. Juan Chen,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mail: foxisfox@126.com. Chengyuan Shao, 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School of Media and Journalism, e-mail: shaocy@live.unc.edu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九期
2019 年 6 月

數位時代的國族認同建構研究： 以學術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Nations and Nationalism* 為例

楊鎡民*

本文引用格式

楊鎡民（2019）。〈數位時代的國族認同建構研究：以學術期刊 *National Identities*、*Nations and Nationalism* 為例〉。《傳播、文化與政治》，9:63-86。

投稿日期：2018 年 1 月 11 日；通過日期：2019 年 5 月 24 日。

* 作者楊鎡民為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創新經營學院博士後研究員，e-mail: s98105050@ncnu.edu.tw。

《摘要》

本研究透過分析《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ies*)跟《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兩本國族主義專刊近二十年出版的研究論文內容,以瞭解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的趨勢、特徵及理論發展。本研究目的有三:在兩本專刊中,有多少研究關注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關係與研究發展?聚焦於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研究文獻,在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面向呈現何種趨勢?以及試圖從這些二手文獻中歸納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的特徵。研究發現,相關研究多數集中於經驗研究與質化研究,缺少對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理論關係之探討。而文獻多聚焦於數位媒體與離散國族主義的研究,並從中發展出一些新概念,如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虛擬社群/國家(*virtual communities/nations*)、網路的文化親密性(*cultural intimacy online*)、文化的空間化(*cultural spatialised*),以及數位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提供後續研究進一步討論。

關鍵詞：國族與國族主義、國族認同、數位時代、數位媒體

壹、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2016 年 1 月 15 日，臺灣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前夕，南韓藝人經紀公司 JYP 娛樂在慮及可能造成中國市場的損失下，要求旗下台籍藝人周子瑜為「在節目中揮舞中華民國國旗與介紹自己來自台灣」的行為像中國粉絲公開道歉。透過 YouTube，周子瑜承認錯誤，並表明立場「支持一個中國原則」(JYP Entertainment, 2016 年 1 月 15 日)。值得關注的是，該影片在當晚 8 時刊登，播出短短 24 小時便累積三百餘萬觀看次數、十餘萬則留言。透過社群網站，民眾發起串聯，用選票宣示「台灣跟中國是不一樣的」，進而在當時形成一股「回鄉投票」的熱潮(辛啟松，2016 年 1 月 16 日；張欽閔，2016 年 1 月 17 日)。該事件更被主流媒體形容為壓垮一向被認為親中政黨國民黨的「最後一根稻草」，使本土政黨民進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張文馨，2016 年 2 月 3 日)。

透過網路與社群媒體的擴散，從事件發生、造成熱議、群眾動員，到後續影響，在短短兩日內讓台灣社會的國族認同情緒達到高點。事件發生過程，若沒有 YouTube 等及時播放社群媒體，甚至沒有憑藉數位技術誕生的網際網路，事件發生的過程又會以何種擴散速度、動員模式、影響範圍等一系列國族認同建構的過程與樣貌出現？換作是印刷媒體（報紙、雜誌、書籍）或類比媒體（電視、廣播）是否同樣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促成大規模性的動員與社會影響力？

有關媒體與國族認同建構的相關研究，19 世紀末葉已有研究者開始討論，例如法國社會學家塔爾德（Gabriel Tarde, 1898／何道寬譯，2005）研究報紙特性如何促成國族主義思想的盛行。而廣為人知的是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於 1983 年出版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將凝聚國族認同的想像歸咎於印刷媒體的發展與擴散，並提供後續學者研究國族主義起源的新視野與理論基礎（Anderson, 2006／吳叡人譯，2010）。

然而《想像的共同體》一書問世逾三十年，傳播科技與環境瞬息萬變，早已從印刷媒體、類比媒體過度到「數位媒體」，進而出現「數位匯流」的現象。數位科技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因運而生的新興數位媒體，包括電腦、數位相機與各種行動裝置，透過位元傳遞訊息，流通到世界各地。這類新興數位媒體和印刷媒體、類比媒體在內容載具與使用形式產生極大差異。依此脈絡，數位媒體與過去媒體在形塑國族認同的過程，在學術研究上應有進一步的比較與討論。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整理過往媒體與國族主義的研究成果，並重新檢視媒介特性與國族主義的關係。再者，透過分析兩本國族主義研究專刊——《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ies*）跟《國族與國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觀察數位媒體與國族認同相關研究的理論發展與研究趨勢。在文章結構安排，在（一）前言以後，首先討論（二）媒體傳播與國族研究的關係與文獻回顧；（三）說明研究方法與期刊文獻蒐集過程；（四）資料分析結果；（五）討論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趨勢；（六）最後則是總結前面的分析結果，提出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之一些建議。

貳、國族研究與傳播媒體

一、國族認同起源的社會建構視角

社會人類學家蓋爾納（Ernest Gellner, 1983／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認為國族主義是一項政治原則，因為它主張政治與國族的組成單位必須等同一致，而國家政體是構成國族主義存在的重要因素。蓋爾納將國族概念區分為「文化」與「主觀認定」兩種定義，前者是指當兩個人分享同一個文化時，這兩個人才屬於同一國族；後者則是只有在兩個人「承認」彼此屬於同一國族時，這兩個人才屬於同一國族（頁 8）。

國族的主觀認定涉及了信念、忠誠、團體歸屬（Gellner, 1983／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這彰顯出國族主義的呈現即在於個人的國族認同抉擇的

操作化過程。因此如蓋爾納、安德森在研究國族主義的定義時，皆聚焦於「國族認同形成的過程」，而非圍繞在國族主義的本質追根究柢（Gellner, 1983／李金梅、黃俊龍譯，頁9；Anderson, 2006／吳叡人譯，2010）。本研究即關注哪些元素（特別是媒體）促成國族認同的形成，而「社會建構」概念不僅提供了分析國族認同形成過程具有洞見的視野，有別於探究文化上的種族特徵與血源，透過社會建構形成國族認同的論據在當前社會更具說服力。

例如，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83／顧杭、龐冠群譯，2004）強調國族主義的出現是「傳統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國族意識的形塑仰賴於特定被建構出來的「傳統」以實踐。因此過去被看作傳統的儀式與習慣，實則為近代被發明的產物，用以凸顯國族的單一與純粹性。霍布斯邦研究 1870 年至 1914 年歐洲官方國族主義建構的過程，官方藉由公共儀式、紀念碑、雕像、建築、國旗、格言及歌曲等發明以創造傳統，並搭配教育機構的灌輸來強化國族意識。霍布斯邦說明法國在第三共和時期，為了捍衛政權免受社會主義、右翼的攻擊，「傳統的發明」就在維護共和國與共和主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將巴士底獄日訂為國慶日（距離 1789 年 7 月 14 日法國大革命到當時 1880 年訂立國慶日，已經過了 90 年），大規模興建投合共和國形象，以及富有愛國主義象徵的地方民間人物的紀念碑等，以強化新政權的穩固性，凝聚法國國族主義。

Nora (1984-1992／戴麗娟譯，2012) 則透過「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emoire) 的概念說明國族認同建構的過程。Nora 強調記憶所繫之處是一種「記憶」與「歷史」的互動，它通時擁有物質、象徵與功能三種特性。例如一間檔案館，只有在人們的想像力賦予它象徵光環時，它才會變成記憶所繫之處。又如純具功能性的教科書、遺囑等，也只有在它們同時也是某種儀式的對象時，才能被視為記憶所繫之處。因此，並非任何物質性的歷史資料、遺跡、事物都能成為記憶所繫之處；它必須具有某種象徵性，使人們把集體記憶寄託在它身上，而這樣的象徵性會隨著「人們對於過去的操作」產生變化。

從社會建構視角討論國族認同的形成，彰顯了人類在操作集體記憶與認同的主動性，而文化、種族與血緣則作為建構認同的工具。然而在形塑認同

的過程，又是什麼中介了記憶、人群與認同？Gellner（1983／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頁 174）曾提及：「媒體本身抽象、統一管理、標準化，從一點擴散各方的溝通模式，所具有的強大威力與關鍵地位構成了國族主義的核心理念。」透過傳播媒體統一而大規模的傳播，是形塑群體國族認同的重要關鍵。

二、傳播媒體與認同建構關係

Thompson（1995）說明傳播是一種社會活動，涉及符號的生產、傳輸與接收；所有符號交換的過程，皆涉及某些形式的技術媒介，例如石刻、草紙、書本、報紙、廣播、錄音機、電視、電影等，這些媒介包含三個特徵—「固著性」、「再生產性」與「時空分延」（space-time distancing）。首先，技術媒介賦予符號固著功能，令意義的傳達具有耐久性。第二，技術媒介使特定符號能夠生產出多個副本，使符號的再生產更具規模性與即時性。第三，技術媒介使意義的傳達打破時空限制，尤其是電信技術的問世，導致空間與時間的折夥，意義在空間的延伸不必再依靠時間的延伸（例如書信往返需耗費一段交通時間），Thompson 將此現象視為「去空間化的同時性」，意指在不同的地區，卻能夠同時經驗特定事件的發生。

媒介的固著性、再生產性、同時性在建構國族認同的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早在 19 世紀末期 Tarde 對報紙形塑國族認同的特性就有獨到的洞見。Tarde 指出報紙的「方言性」與「同步性」的特徵，造就國族的出現：「民族之間的地理邊界往往和主要的語言邊界混雜……報紙真正有效的影響，止步在報紙使用的語言的邊界線上（頁 237）。」、「各地分散的群眾，由於新聞的作用，意識到彼此的同步性和相互影響，相隔很遠卻覺得很親近；於是，報紙就造就了一個龐大、抽象和獨立的群體，並且將其命名為輿論」（Tarde，1898／何道寬譯，2005，頁 246）。雖然 Tarde 注重討論輿論形成的過程，然而他對報紙媒介功能的分析也適用於國族認同的形成。

針對印刷媒體的特性如何建構國族認同，Anderson 提出理論性的見解。Anderson 說明近代傳播科技的革新，配合資本主義的擴張，使小說、報紙等

印刷媒體得以大量發行，為重現國族這種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技術手段。以小說而論，它被設計於「同質、空洞的時間」內展現同時性的特徵。首先，雖然故事的角色們可能未曾碰面，但都被預設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脈絡」中，具有堅實穩定存在的社會實體。第二，作者將讀者設定為故事的全知者。假設故事中有 A、B、C、D 四個角色，各自展開生活，只有讀者知道所有人在「同一時間」做了什麼事，並使讀者心中喚起想像的世界。這兩種性質促進了國族的建構，因為國族也被設想在歷史之中，穩定發展的堅實的共同體（Anderson，2006／吳叡人譯，2010，頁 62-63）。

以《社會之癌》（*Noli Me Tangere*）為例，該書為菲律賓國族英雄荷賽·黎剎（José Rizal）於 1887 年撰寫，內容敘述西班牙殖民菲律賓期間的殘暴與社會貧窮。Anderson 說明該書內容鋪陳激發了菲律賓人的共鳴：「數以百計未被指名、互不相識的人，在馬尼拉的不同地區，在某特定年代的某特定月分，正在討論一場晚宴……在『我們會用現在還認得出來的方式來描述』『在安絡格街的一棟房子』這段句子裡暗示的『認得出房子的人』，就是我們——菲律賓人——讀者」（Anderson，2006／吳叡人譯，2010，頁 64）。該書的巧妙設計喚起菲律賓人想像的共同體，且在以西班牙文撰寫的內容穿插塔加洛語（菲律賓當地語言），將讀者鎖定在菲律賓人，也只有菲律賓人才看得懂內容的弦外之音。因此，認為許多富有國族主義色彩的小說，便是利用小說的性質，描繪特定的社會情境、人物、語言、事件（與現實讀者所處的社會產生構連），得以召喚想像的共同體。

報紙也具有「同時性」的想像元素。Anderson 指出，首先在篩選報導事件與排列版面的行為，本身就顯示事件彼此之間的關聯是被想像出來的。報紙版面最上方的日期，提供了一種最根本的連結，即時間的同質性。不過最重要的是，報紙的「非耐久財」特性，創造出一個群眾儀式，即對於報紙的同時消費（想像）：「人們知道特定的早報和晚報絕大多數將會在這一刻和另一刻之間，只在這一天而非另一天被消費掉」（Anderson，2006／吳叡人譯，2010，頁 70-71）。當讀者看見一模一樣的報紙在超商、車站、早餐店被消費時，更是持續地確信那個想像的世界就根植於日常生活當中，並創造出一個匿名的共同體。再加上報紙由方言印製的特徵，使得這個共同體具有清楚的

「疆界」。

至於類比媒體，Scannell（1996）強調廣播與電視的「日常性」（dailiness）與「公共性」（publicness），在日常生活結構，廣播節目透過時間序列的展開，將民眾匯集於一個新的公眾生活圈——圍繞著公眾人物與事件，具有條理、秩序、熟悉而可認知的公眾生活世界。藉此，Cormack（2000）認為廣播的「日常性」促成人們對自身世界的想像，與報紙具有同樣的功能，且透過國族語言與廣播的結合凝聚特定的國族主義。

不過廣播與電視跟印刷媒體在塑造想像的結構仍有差異，前者提供民眾即時接觸公共事務的機會；而全日持續播放的節目內容則融入民眾的生活作息。因此廣播與電視有別於一次性的印刷刊物，兩者觸及了不同的聽眾群（Cormack, 2000, p. 392; Scannell, 1996）。再者，Phillips（2012）認為電視比印刷刊物更適合作為觀察日常國族主義建構的工具，其中一個原因是電視的傳播不像報紙會受到某些地區識字率的限制，例如在阿拉伯世界識字率偏低的情況下，電視傳播比報紙更有效果。Phillips 的意見也點出了以圖像、聲音為主的廣播與電視媒體，與印刷刊物在媒介特性的差異。

另一方面，電子媒體的出現被認為抵制而非促進國族認同的發展。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鄭明萱，2006）在 1960 年代即預示電子媒體時代來臨，將使得社會型態從文字媒體時期的個人／國族主義轉變為「地球村」，電視、電影、廣播的跨地傳播促成同質化的社會，即「電子媒體的出現，使整個世界從『外爆』轉向『內爆』，電科技全面延伸了我們的中央神經系統，全球也縮成了小村落，並深度地整合及去中心化」（施伯燁，2007，頁 196）。

不過另一說，則認為電子媒體在凝聚離散國族的向心力上更具影響力。Anderson（2005）雖然承認電報的發明、郵政系統的擴大、網路網絡的鋪設，使世界的連結更為緊密，因而出現早期的全球化過程。但同時他也發現諸如古巴、菲律賓的海外知識菁英，透過電子媒體持續追蹤母國訊息，並影響了母國的反殖民地鬥爭與發展。

如上述，許多研究皆殊途同歸的強調媒介的「同時性」作用在建構想像的世界的重要性，不過印刷媒體與類比媒體在傳播形式，以及由傳播形式所造成建構國族認同特徵亦有差異，明顯不同的是，廣播與電視透過「日常

性」、「公眾性」與即時的資訊播放建構想像的共同體，而電子媒體的出現也帶出了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爭論。

再來觀察近三十年興起的數位媒體，就傳播形式上也與前兩者傳播技術產生極大不同。網路是由各種技術組成，包括聊天室、電子信箱、部落格、網站、論壇等。網路的特性異於其他媒體，如網站，可以隨時更新、容易架設、便宜，並且可能是最多數的人聯繫於網路中的一個平台模式。聊天室，在虛擬卻緊密的空間，使用者透過獨一無二的用戶名與帳號參與其中。透過聊天室的互動溝通，具有同時性與口頭對話的自然性。網路新聞平台，則涵蓋話題廣泛，任何人都能夠瀏覽新聞而沒有門檻。電子信箱，提供集體發送功能，人人都可以透過郵件聯繫彼此。部落格，則是介於新聞、社評、日記之間的綜合平台，也提供部落客與讀者的互動（Eriksen, 2007）。所有這些溝通平台，除了如印刷媒體、類比媒體能夠被動的提供國族想像的空間，還能夠被追求國族主義特定目標的組織、利益團體及個人主動地使用以建構國族認同。

因此本研究進一步詢問：興新數位媒體的出現為國族主義的研究帶來何種變化與趨勢？數位媒體與過往媒體形式在建構國族主義的特徵有何異同？

參、研究方法與文獻蒐集

本研究透過梳理《國族認同》與《國族與國族主義》兩本以英語出版的國族主義研究專刊，以瞭解數位媒體（如電腦、網際網路、手機、衛星電視、CD等）與國族主義的研究趨勢與特徵。兩本專刊來自英國，分別於1999年、1995年出版至今，是國族主義研究領域的重要刊物。本研究目的有三：

- （一）在兩本專刊中，有多少研究關注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關係與研究發展？
- （二）聚焦於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研究文獻，在研究方法、研究

對象、研究面向呈現何種趨勢？

(三) 試圖從這些二手文獻中歸納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的特徵。

本研究從兩本專刊之中選擇標準的研究論文分析（論文結構包含主題、摘要、研究方法、研究結果及參考書目），排除非正規的研究論文，例如編輯室報告、書評、悼念文、學術對談。在蒐集時間範圍，考量數位媒體，特別是網路的發明雖然早至 1960 年代，然而它被作為商業目的使用則是 1980 年代晚期，接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要到 1990 年代之後（Internet, n.d.），因此本研究將蒐集文獻範圍侷限與 2000 年至 2017 年出版的文章。

以一篇研究論文為單位，在篩選有關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文獻的步驟：（一）根據研究論文的主題、摘要、研究方法判斷；（二）其次，設定一組關鍵字（media, satellite, digital, internet, online, web, phone, mobile）搜尋文章內容，避免遺漏相關文獻。（三）透過前兩個步驟，將多數非相關研究文獻剔除後，本研究對可能相關的研究進行深入閱讀辨識。若該篇論文主要討論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相關理論與現象，或者資料來源以數位媒體為主，則本研究辨識為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文獻。再者，為了更深入的瞭解該領域的研究趨勢，被納為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文獻的論文，本研究則更進一步的辨識該論文的研究類別（經驗研究、理論研究、兩者皆有）、研究方法（質化研究、量化研究、混和型研究）。

排除掉非正規的學術研究論文後，總共有 924 篇論文（《國族認同》為 372 篇；《國族與國族主義》為 552 篇），透過篩選後符合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的文獻有 53 篇。

除了透過上述研究方法取得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趨勢的輪廓，本研究針對 53 篇論文進行文獻梳理，試圖更完整地回答研究目的，以及探索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研究發展與特徵。

肆、分析結果

本研究透過關鍵詞組與質化閱讀 2000 年至 2017 年兩本專刊出版的文獻後，篩選出 53 篇論文，這些論文在研究主題或研究資料聚焦於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其中有 23 篇（43.40 %）出自《國族認同》、30 篇（56.60 %）出自《國族與國族主義》。比較兩本專刊在這期間的出版總量（《國族認同》為 372 篇，占總出版量的 40.26 %；《國族與國族主義》為 552 篇，占總出版量的 59.74%），出版相關研究論文量與出版總量具有一致性，並沒有特別集中於其中一本專刊，因此兩本專刊皆具有分析與比較的价值。

在研究類別，23 篇《國族認同》專刊論文中，有 21 篇（91.30%）屬經驗研究，1 篇（4.35%）屬理論研究，1 篇（4.35%）透過經驗研究兼論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發展。在 30 篇《國族與國族主義》專刊論文中，有 27 篇（90.00%）屬經驗研究、1 篇（3.33%）屬理論研究、2 篇（6.67%）則兩者皆有。總體來說，兩本專刊 53 篇論文中，有 48 篇（90.57%）屬經驗研究、3 篇（3.77%）屬理論研究、3 篇（5.66%）屬兩者皆有。該結果顯示有關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研究文獻，主要集中於經驗研究，對於理論探討與發展則占相當少數。

接著在研究方法，《國族認同》專刊中有 19 篇（82.60%）屬質化研究、2 篇（8.70%）屬量化研究、2 篇（8.70%）屬混和型研究；而《國族與國族主義》專刊則 28 篇（93.33%）屬質化研究，一篇（3.33%）屬量化研究，一篇（3.33%）屬質化研究。總體而言，兩本專刊中有 47 篇（88.68%）屬質化研究、3 篇（5.66%）屬量化研究、3 篇（5.66%）屬混和型研究。這結果指出大多數相關文獻的研究方法採質化研究法，而採量化研究與混和型研究的文獻則占明顯少數。以上結果，請見表一。

表一：研究類別與研究方法分析結果

刊別		國族認同	國族與 國族主義	總數
研究類別	經驗研究	21 (91.30%)	27 (90.00%)	48 (90.57%)
	理論研究	1 (4.35%)	1 (3.33%)	2 (3.77%)
	兩者皆有	1 (4.35%)	2 (6.67%)	3 (5.66%)
	總數	23 (100%)	30 (100%)	53 (100%)
研究方法	質化研究	19 (82.60%)	28 (93.33%)	47 (88.68%)
	量化研究	2 (8.70%)	1 (3.33%)	3 (5.66%)
	混和型研究	2 (8.70%)	1 (3.33%)	3 (5.66%)
	總數	23(100%)	30 (100%)	53 (100%)

註：百分比計算到小數點第二位四捨五入。

透過分析兩本專刊在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文獻的研究類別與研究方法，發現該領域的研究發展集中於經驗研究與質化研究，然而數位媒體作為新興媒介技術與國族主義的理論關係，則少有文獻進行討論。

接著在下一節，本研究針對 53 篇論文進行深度閱讀，試圖更進一步討論該領域的研究趨勢、研究面向，尤其透過分析 6 篇涉及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理論發展的論文，瞭解該理論發展的進程與特徵。

伍、研究趨勢與理論發展

在對 53 篇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文獻進行深度閱讀後，本研究從研究方向、資料來源，以及理論探索與發展來討論該領域整體的研究趨勢與特徵。

一、研究方向與資料來源

在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文獻中的研究子題，以「離散國族主義」研究最多，包括了印度、阿拉伯、希臘、墨西哥、泰米爾、厄立特裡亞移民，以及被迫離散在外的少數民族庫德族與巴勒斯坦人（Dorman, 2005; Eriksen, 2007; Fuglerud, 2001; Field, 2014; Koukoutsaki-Monnier, 2012; Kurien, 2017; Pèrez, 2014; Saunders, 2008; Skop & Adams, 2009; Şenay, 2013）。數位媒體尤其是網際網路的出現，對於離散民族凝聚認同感、相互幫助，以及推動國族主義運動具有關鍵的角色。

然而，在地政府與人民在面對移民所衍伸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問題，尤其是資源的分配與文化的差異容易加劇當地居民與移民的衝突。因此伴隨著離散民族研究，也有相當多的文獻針對當地政府與居民如何應對移民問題進行觀察與討論（Alessio, 2015; Caron, 2013; Kaftan, 2013; Piwoni, 2015; Olsen, 2017）。

次多的研究子題為歐盟成員國之間的議題與矛盾（Capelos & Exadaktylos, 2016; Hecke, 2017; Kaiser, 2017; Lialliouti & Bithymitris, 2016;

Michailidou, 2016; Molnár, 2016; Schünemann, 2017)。第三個子題則是討論國族主義與全球化的關係 (Catterall, 2011; Kaldor, 2004; Madisson & Ventsel, 2015; Renwick, 2001)。

接著，分析 53 篇論文的資料來源，結果呈現多樣特徵，即數位媒體裝置包括電腦、手機、衛星電視、CD 等皆是取得研究資料的工具 (例如 Field, 2014; Lödén, 2014; Phillips, 2012; Pèrez, 2014; Renwick, 2001; Roszko, 2015)。除此之外，多數研究主要使用網路取得資料，網站形式包括新聞網站、網路調查、政府與非官方機構的官方網站、網路資料庫，以及社群網站 (臉書、推特、部落格、LinkedIn; 例如 Alessio, 2015; Hecke, 2017; Ichijo, 2012; Jones, 2008; Kaiser, 2017; Madission & Ventsel, 2015; Skop & Adams, 2009)。

二、理論發展與探索

由數位科技所創造的一系列新興媒體，尤其是網路的出現，使得資訊流通更加便捷，文字、聲音與影像，皆能透過網路流通於世界各地，在各種數位媒體裝置中串流，包括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數位相機及 MP4 等，形成數位匯流的奇觀。數位媒體除了對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文化造成衝擊，其有別於過往的媒介特性，勢必對國族認同的建構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本研究整理兩本專刊中針對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理論建構的著作，並歸納出數位媒體的幾種特徵：(一) 去地域化 (deterritorialisation)；(二) 虛擬社群／國家 (virtual communities/nations)；(三) 網路的文化親密性 (cultural intimacy online)；(四) 文化的空間化 (cultural spatialised)。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種數位媒體特徵皆得自於對網路、離散民族與認同關係之經驗研究。除此之外，本研究還討論數位資本主義 (digital capitalism) 凝聚國族認同的作用，以及網路國族主義的複雜性。

首先，許多文獻共同點出離散民族透過網路凝聚我群的認同感，而不會受到地域性的限制，將此現象稱為認同建構的「去地域化」現象 (Eriksen, 2007; Koukoutsaki-Monnie, 2012; Kania-Lundholm & Lindgren, 2015)。不過去地域化具有兩種意義，就實踐層面而言，第一種離散民族透過網路追求建國的路

程；第二是離散民族透過網路維持傳統文化與認同，建構跨國的大民族主義，而非通往建國之路的國族認同，這也彰顯出民族認同的複雜性。

以第一種而言，Eriksen（2007）以散居歐洲、美國等地，持續追求獨立建國的庫德族為例。因為文化、語言、藝術的差異，以及庫德族長期受到迫害的歷史情緒，使他們逐漸醞釀獨立建國的國族意識。主動或被迫離鄉的庫德族人，在國外架設「庫德族媒體」（KurdishMedia）網站，分享傳統語言、藝術與文化，並將庫德族推展至國際，以建立「庫德斯坦共和國」（United Kurdistan）為目標。Eriksen 指出，由於許多庫德族菁英離散各國，使得網路成鞏固認同與傳遞資訊的完美媒介。更重要的是，國族主義論述的建構也透過個人網站、部落格、新聞及聊天室等各種平台的協作具體化，各類互動平臺同時創造使用者的熟悉感與親密感，近似於真實生活的互動（Eriksen, 2007）。

而 Koukoutsaki-Monnier（2012）則透過研究美國的希臘移民組織網站，說明另一種非以建國為主的跨國民族認同。Koukoutsaki-Monnier 將希臘移民組織網站分為兩類，即「族群屬地性的」（ethnoregional）與「在地化的」（localised）網站，前者對祖國原鄉具有強烈清楚的認同感，而後者則久居他鄉是故鄉，出現在地化的認同感。族群屬地性強的網站，透過對過去移民歷史的自傳式敘事；符號化地操作母國、原鄉及國族的圖像；並刻意區別「他者」（美國人）的存在，來強化認同的明確性。與彼相反，在地化的希臘移民網站，則主要使用英語傳達訊息，網站內容很少提供移民歷史資料，主要關注的是組織未來的任務，包括文化、教育及慈善事務等。另一方面，網站刊登移民組織在地（美國城市）的相關文章與內容，雖然這類網站仍會慶祝一年一度的希臘建國紀念日。

因此，Koukoutsaki-Monnie（2012）認為在地化的希臘移民網站是超越既定時空，去地域化的希臘主義（Hellenism），與希臘移民對美國國家的認同不相扞格，如 Skop 與 Adams（2009）研究印度移民網站內容中印度文化與美國／全球文化同時出現的「認同雜揉」（hybridised identities）現象。網路的出現，不僅強化國族主義的凝聚，也彰顯（促進）國族主義的複雜性。

除此，Eriksen（2007）觀察南非白人透過網站建構「虛擬國家」，以補

償在現實中失去的國家。隨著 1990 年代南非原住民重新獲得政權，南非白人在感嘆已逝國土之餘，透過網路聯繫情感，在網路空間建構出一個替代的虛擬國家。除了國族認同之外，網路也創造、強化跨國虛擬社群，例如 Saunders (2008) 分析 2006 年《日德蘭郵報》穆罕默德漫畫事件，分散歐洲各地穆斯林菁英依靠網路而生的虛擬性 (internet-enabled virtuality)，建構伊斯蘭共同體、動員群眾抗議、強化穆斯林世界與西方世界的兩造敵對情勢。

第三，網路的文化親密性。文化親密性是解釋國族主義建構過程的一個觀點，即群體形成的紐帶建基於群體共同的特質、缺點，以及在共同的社會性與認同框架下的日常協商實踐，尤其是在體認文化認同之中不足為外人道的缺點時，反而提供了內部確立共同社會性的機緣 (李安如，2009；Herzfeld, 1997; Kania-Lundholm & Lindgren, 2015)。

Kania-Lundholm 與 Lindgren (2015) 研究波蘭在蘇聯解體後面對民主化、現代化與歐洲化的過程中，內部對於新舊愛國主義的紛歧。網路論壇作為「文化親密性」的空間，提供波蘭民眾辯論愛國主義內涵 (情緒性的、排他性、緬懷過去的舊國族主義 vs. 理性的、負責任的、訴諸公民身分的新國族主義) 的公共場域。在爭論的過程中，除了使不同陣營的民眾透過網路的文化親密性強化各自的愛國認同，也讓全體民眾加入思考現代民主國家中作為公民的定義與責任。除此，網路的文化親密性打破地理限制，將國內人民與為數居多在歐盟其他地區的移民綁在一塊，共同思考波蘭愛國主義的未來。

Kania-Lundholm 與 Lindgren (2015) 歸納網路的文化親密性特徵，包括社群媒體與網路空間提供單一國族內針對紛歧的溝通協商空間；強化社群的連結與親密感，以及加速了「作為一個國家」的意象的再生產與中介的過程。

第四，文化的空間化，由 Skop 與 Adams (2009) 提出，他們研究遷移至美國的印度移民與移民二代，發現印度移民透過使用原鄉國族導向的網站抵抗在地同化，維持印度傳統價值與信仰以區別美國主流文化。這些印度移民利用新傳播技術，將傳統印度文化「空間化」於網路世界，選擇性地上傳具有懷鄉象徵的神話、傳說、民族與歷史。Skop 與 Adams 點出文化透過網路傳播，網路空間不僅成為文化交流、保存與發揚的場域，更使得文化具體

化於網路空間，進而形成文化的空間化，在傳播媒介的本質上附加了國族的象徵。

再者，許多針對網路與離散民族的研究也共同指出民族／國族認同的複雜性與混雜性。除了前文 Koukoutsaki-Monnier（2012）指出希臘移民網站出現「族群屬地性的」與「在地化的認同」，以及 Skop 與 Adams（2009）提及的移民文化與在地文化的「認同雜揉」現象，Eriksen（2007）更細緻的分析四種網路國族主義：（一）前獨立的（pre-independence）的庫德族透過網站鼓吹獨立建國；（二）多元主義的摩洛哥裔荷蘭移民藉由網站協助移民在地化；（三）南非白人在網站上建構虛擬國家以作為在現實失去國家的補償；（四）由智利政府推動的國族性網站召喚海外智利移民的原鄉認同。

最後，有別於 Anderson（2006／吳叡人譯，2010）提出歐洲印刷資本主義的擴張配合宗教改革與方言傳播促成歐洲國族主義的興起，Huijsmans & Lan（2015）提出「數位資本主義」。Huijsmans 與 Lan 關注數位資本主義、行動電話與使用者的互動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促成國族主義的出現。以寮國和越南邊界之間的高地少數民族為例，兩地在手機尚未普及以前，由於教育資源的匱乏，兩地青少年教育程度低，國家語言只限於課堂學習，日常生活仍以當地方言溝通為主，因此兩地青少年的認同感也以地區為主，尚未有國家認同的想像。然而，當電信企業擴張至該地少數民族時，則逐漸在青少年使用者之間醞釀國族認同感。

由於手機價格低廉，因此普及於兩地青少年群體。流通於兩地的手機皆出自越南國有品牌 Viettel，使用介面為越南語。國族想像的發生，首先在於簡訊的價格低廉，受到青少年青睞而作為手機溝通的主要方式，因此能夠被讀、寫的國語在學校教育之外開始被大量使用；接著在使用統一的國家語言的過程中，青少年持續經歷了想像的共同體。第二，透過 Viettel 的廣告看板林立於偏遠山區，看板內容的越南語及圖像也成為建構國族認同的元素。第三，Viettel 促銷行動電話的贈品，例如以官方統一時間為依據的日曆，以及定期在國定紀念日所發送的簡訊祝賀詞，都成為高地少數民族凝聚想像共同體的元素——即在收到祝賀詞的同時，設想其他（越南）人也正在觀看螢幕。然而，寮國高地的少數民族青年則因為看不懂 Viettel 手機介面的越南文，頻

頻跨界向越南人請教，或者乾脆用猜的，因此在這個過程中，進一步確立了兩者的關係（寮國人／越南人；Huijsmans & Lan, 2015）。

Huijsmans 與 Lan 從數位資本主義的流動觀察國族主義建構過程，給予本研究重要啟示，尤其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電信、3C 與其他相關產業在全球各地迅速擴張，是否進一步影響國族主義的興起與蓬勃發展？值得進一步討論。

陸、後續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透過分析《國族認同》跟《國族與國族主義》兩本學術專刊，以觀察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研究趨勢與特徵。首先，本研究透過量化內容分析，發現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相關文獻多集中於經驗研究與質化研究。然而數位媒體作為新興媒介技術，與過往印刷媒體、類比媒體在傳輸形式、速度、範圍、內容皆產生極大的差異，在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理論關係上卻少有文獻進行討論。合理推測其中一個原因，在於數位匯流下資料的流動性與規模過於快速與繁雜，使研究者難以梳理其中的規律，或許在研究方法上結合量化分析與大數據分析，以解決資料龐雜而難以看出端倪的困境；且在過往的媒體與國族主義理論，如想像的共同體、傳統的發明、日常國族主義等等，也似乎同時適用於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的關係，使研究者理所當然的直接觀察數位媒體的內容如何建構國族認同，而沒有深究媒介義涵。

除此之外，更多研究則將媒介視為技術工具，轉而重視特定脈絡與環境條件下出現的國族主義。Anthony D. Smith（1996a, 1996b）在國族建構論之外，強調「種族象徵取徑」（Ethno-symbolic approaches），認為種族紐帶與集體記憶是不可或缺的參照，即共同體的構成，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有共同的起源，這在解釋具有古老意象的猶太國族認同則更具說服力。另一方面，Anderson 雖然聚焦於印刷科技的作用如何塑造想像的共同體，但他也提醒在實踐的脈絡不能忽略社會環境與生產形式的相互作用，促使想像的共同體的出現「是一種生產體系和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一種傳播科技（印刷

品)，和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個因素之間半偶然的，但卻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Anderson, 2006／吳叡人譯，2010，頁 86)。

以臺灣國族主義的研究為例，蕭阿勤(2012)曾將相關研究取向劃分為「想像的共同體」、「政治競爭」，以及他個人所強調的「文化民族主義」等三種分析取向。有別於政治競爭，文化民族主義認為國族國家的本質是獨特的歷史、文化與地理條件，而非僅只是政治操作所出現「法理的」國族國家與公民權利。文化民族主義研究更重視文化知識菁英(歷史學家、藝術家、作家等)如何致力於保存、挖掘、甚至創造國族文化的特別之處。

然而不論研究者以何種視角研究國族主義，由傳播媒體所中介的國族符號皆是分析認同意識的必經之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研究進一步透過質化的深度閱讀文獻，發現多數研究聚焦於數位媒體對離散國族主義的作用，尤其是網路的出現對移民聯繫彼此、保存自身文化，以及對離散民族追求建國的過程扮演了關鍵角色。除此，部分研究則提出具有洞見的理論觀點，提供我們進一步探究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關係的線索。這些洞見包括去地域化、虛擬社群／國家、網路的文化親密性、文化的空間，以及數位資本主義對凝聚國族認同的功能。比較過去的國族主義理論，對於離散民族而言數位媒體提供一種由外而內、由虛擬空間到現實世界推動國族運動的重要工具，特別是那些受到迫害流散於各地的民族透過數位媒體凝聚國族認同感。合理推測網際網路之所以能提供離散民族凝聚國族認同，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使用成本相對低廉，一般民眾也可以透過網路傳輸飽含國族意涵的圖文與影像

尤其是從虛擬到現實，從「線上到線下」的國族動員模式，提供我們理解數位媒體如何影響國族形塑的新理論視角，這在近年台港社會運動中參雜認同因素可見一斑。而網路國族動員的內涵也愈加複雜，特別在國家機器進入網際網路以後，例如《端傳媒》先後在 2016 年、2017 年刊登兩則長篇報導〈把果凍釘在牆上？他們真的這樣管住了互聯網〉(傑伊，2016 年 8 月 1 日)、〈抵制樂天，網絡時代下民族主義的進化〉(楊山，2017 年 3 月 2 日)，報導 2013 年以後中國政府更積極的介入社群網站微博、微信，「復興路上工作室」、「共青團中央微博」、「俠客島」、「學習小組」為代表的官方網路視頻、

微博、微信等帳號開始展開大規模宣傳活動。以 2017 年南韓部署薩德系統引發中國社會反韓風潮為例，《新華社》、《共青團中央》、《環球時報》透過網路新聞與社群媒體呼籲民眾抵制樂天集團在中國境內的一切商業產品與活動，報導稱該現象為「官辦激進民族主義」，意即國家直接透過網路社群媒體動員群眾形成激進的國族運動，筆者將在未來研究做進一步的觀察與討論。

前述例子也彰顯數位媒體與特定環境背景（國家體制、社會環境與歷史背景）的連結如何形塑國族主義樣貌。總而言之，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領域是一塊值得研究的學術藍海，在被認為全球化時代的當代，沒有如麥克魯漢的預言國族主義被削弱、地球村的到來，反而國族主義依舊昌盛，更甚者如近幾年的保守國族主義在英、美與歐洲部分國家，以及鄰近臺灣的中國之國族主義，皆有轉趨強化的情形，而數位媒體尤其網路在這當中扮演關鍵角色，這都彰顯數位媒體與國族主義研究的重要性。

參考書目

- 李安如（2009）。〈地鐵作為「文化親密」的空間：以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為例〉，《考古人類學刊》，70: 79-108。
- 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國族與民族主義》。臺北市：聯經。（原書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何道寬譯（2005）。〈公眾與群眾〉，《傳播與社會影響》，頁 213-228。（原書 Tarde, Gabriel. [1901/1969]. *The Public and the Crowd*. *Gabriel Tarde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T. N. Clark, Trans.), 277-294.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市：時報。（原書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Norton.）
- 辛啟松（2016 年 1 月 16 日）。《選票聲援周子瑜 成大首投族搭專車返鄉》，《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16/776232>

- 施伯燁(2007)。
張文馨(2016 年 2 月 3 日)。
《蘋果日報》。取自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politics/realtime/20160203/789572/>
張鈺閔(2016 年 1 月 17 日)。
《蘋果日報》。上網日期：2017 年 7 月 6 日，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17/777104/>
傑伊(2016 年 8 月 1 日)。
《端傳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1-mainland-fiftycents/>
楊山(2017 年 3 月 2 日)。
《端傳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302-opinion-yangshang-korealotte/>
鄭明萱譯(2006)。
出自 McLuhan, M.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蕭阿勤(2012)。
戴麗娟譯(2012)。
《第一冊》，頁 15-36。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原書 Pierre Nora.
(1984-1992).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In Pierre Nora (Eds.), *Les Lieux De Memoire*, vol 1 (pp.17-42). Paris: Gallimard.)
顧杭、龐冠群譯(2004)。
《傳統
的發明》，頁 338-395。南京市：譯林。(原書 Hobsbawm, Eric. (1983).
Mass-Producing Traditions: Europe, 1870-1914. In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pp.263-30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YP Entertainment(製作公司)(2016 年 1 月 15 日)。
YouTube。上網日期：2017 年 7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7URqSp5Ew>
Alessio, D. (2015). The dragon is not always red: the extreme right and
ultra-nationalism in Wales. *National Identities*, 17(3), 289-309.
Anderson, B. (2005). *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Capelos, T. & Exadaktylos, T. (2016). Feeling the pulse of the Greek debt crisis:
Affect on the web of blame.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5.1113241>
Caron, J-F. (2013).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France's national identity: The

- meanings of being French. *National Identities*, 15(3), 223-237.
- Catterall, P. (2011). Democracy,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 'globalising' world. *National Identities*, 13(4), 329-347.
- Cormack, M. (2000). Minority languages, nationalism and broadcasting: The British and Irish exampl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6(3), 383-398.
- Dorman, S. R. (2005). Narratives of nationalism in Eritrea: Research and revision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1(2), 203-222.
- Eriksen, T. H. (2007).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et*, 13(1), 1-17.
- Field, R. (2014). For kick and country: the 2010 VIVA World Cup and sport as a site for expressions of alternate 'national' identities. *National Identities*, 16(4), 377-393.
- Fuglerud, Ø. (2001). Time and space in the Sri Lanka-Tamil diaspor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7(2), 195-213.
- Hecke, M. Van. (2017). Imag(in)ing the eurocri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cartoons.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6.1199541>
- Herzfeld, M. (1997).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uijsmans, R.B.C & Trần, Thị Hà Lan. (2015). Enacting nationalism through youthful mobilities? Youth, mobile phones and digital capitalism in a Lao-Vietnamese borderland.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1(2), 209-229.
- Ichijo, A. (2012). Entrenchment of unionist nationalism: Devolu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cotland. *National Identities*, 14(1), 23-37.
- Internet. (n.d.). In *Wikipedia*. Retrieved October 24, 2018, from <https://blog.apastyle.org/apastyle/2009/10/how-to-cite-wikipedia-in-apa-style.html>
- Jones, R. (2008). Searching for the greatest Bengali: The BBC and shifting identity categories in South Asia. *National Identities*, 10(2), 149-165.
- Kaftan, J. (2013). National identity during periods of controversy: Celebrating Cinco de Mayo in Phoenix, Arizon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1), 167-186.
- Kaldor, M. (2004). Nationalism and Globalisati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0(1/2), 161-177.
- Kaiser, W. (2017). One narrative or several? Politics, cultural elites, and citizens in constructing a 'New Narrative for Europe'.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6.1265491>
- Kania-Lundholm, M. & Lindgren, S. (2017). Beyond the nation-state Polish

-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ntimacy online. *National Identities*, 19(3), 293-309.
- Koukoutsaki-Monnier, A. (2012). Deterritorialising the nation? Interne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Greek-American diaspor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8(4), 663-683.
- Kurien, P. (2017). Majority versus minority religious status and diasporic nationalism: Indian American advocacy organisation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1), 109-128.
- Lialiouti, Z. & Bithymitris, G. (2016). A nation under attack: perceptions of enmity and victimh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ek crisis.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5.1113240>
- Lödén, H. (2014). Peace, love, depoliticisation and the domestic alie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memorial messages collected after the terror attacks in Norway 22 July 2011. *National Identities*, 16(2), 157-176.
- Madisson, M-L., Ventsel, A. (2015). '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self-descriptions of the Estonian extreme right groupuscules.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4.995159>
- Michailidou, A. (2016). 'The Germans are back': Euroscepticism and anti-Germanism in crisis-stricken Greece.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5.1113242>
- Molnár, V. (2016). Civil society, radicalism and the rediscovery of mythic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1), 165-185.
- Olsen, T. V. (2017). Liberal intolerance in European education debat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4), 815-836.
- Pérez, M. V. (2014). Between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e Palestinian diaspor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4), 801-802.
- Phillips, C. (2012). Team Arab: al-Jazeera and the flagging of everyday Arabism during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8(3), 504-526.
- Piwoni, E. (2015). Claiming the nation for the people: The dynam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German public discourse about immigrant integrati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1(1), 83-101.
- Renwick, N. (2001). Japan.com. *National Identities*, 3(2), 2001.
- Roszko, E. (2015). Maritime territorialisation as performance of sovereign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1(2), 230-249.
- Saunders, R. A. (2008). The ummah as nation: a reappraisal in the wake of the

- ‘Cartoons Affai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4(2), 303-321.
- Scannell, P. (1996). *Radio, television and modern life: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Oxford: Blackwell.
- Schünemann, W. J. (2017). Almost the same stories: narrative patterns in EU treaty referendums, *National Ident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4608944.2016.1255188>
- Şenay, B. (2013). Seeing for the state: Kemalist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in Austral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2), 376-394.
- Skop, E. & Adams, P. C. (2009). Creating and inhabiting virtual places: Indian immigrants in cyberspace. *National Identities*, 11(2), 127-147.
- Smith, A. D. (1996a). Anthony D. Smith’s Opening Statement: Nation and Their Past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 358-365.
- Smith, A. D. (1996b). Memory and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Ernest Gellner’s Theory of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 372-388.
-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Research Trends of Nationalism in Digital Era:
In the Cases of Academic Journals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Jia-Min Yang*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two nationalism academic journals,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etween 2000 and 2017, this study attempts to tease out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trends in field of nationalism and new media in the digital era. This study intends to understand: (1) How many research focus on digital nationalism in the two journals? (2) How do they do the research? (3)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nationalism and its studies? In the results, firstly, most of the articles ar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at means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trying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media and nationalism. Secondly, those articles mainly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digital media and diasporic nationalism, and develop several novel concepts include ‘deterritorialisation’, ‘virtual communities/ nations’, ‘cultural intimacy online’, ‘cultural spatialised’ and ‘digital capitalism’.

Keywords: digital era, digital media, National identit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 Jia-Min Yang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the College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Email: michaeljmyang@gmail.com

鄰居殺人：
波蘭二戰期間耶德瓦布內小鎮的屠猶秘史
——讀楊·T·格羅斯的《鄰人》及相關影片筆記

艾曉明*

本文引用格式

艾曉明（2019）。〈鄰居殺人：波蘭二戰期間耶德瓦布內小鎮的屠猶秘史——讀楊·T·格羅斯的《鄰人》及相關影片筆記〉，《傳播、文化與政治》，9:87-121。

投稿日期：2018 年 12 月 3 日；通過日期：2019 年 3 月 30 日。

* 艾曉明，廣州中山大學退休教授，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e-mail: tianguowawa@gmail.com。

壹、紀念碑上的空白

在波蘭裔美國導演斯萊沃米爾·葛蘭伯格（Slawomir Grunberg）2005 年的紀錄片《耶鎮秘史》（“*The Legacy of Jedwabne*”——直譯應該是《耶德瓦布內的遺產》）的開頭，一塊巨大的石碑正在被拆除。這是在波蘭東部的一個小鎮——耶德瓦布內（以下為表述方便，簡稱「耶鎮」）。波蘭電視台當日報導消息說：「這塊石碑標誌著此處為大屠殺遺址，1941 年 7 月 10 日，德國人在此將 1600 猶太人活活燒死。現在人們認識到，波蘭人也參與了犯罪，但犧牲者數目不詳。這座紀念碑已被移走，以便以新的方式在此遺址上紀念亡者。新的紀念碑將從四月開始建造。重建專案已經向猶太人社群諮詢，舊的石碑將保存在波蘭比亞韋斯托克的軍事博物館。」

新的石碑樹立起來，這是在 2001 年，耶鎮屠猶慘案的六十周年之際。相比起先被認為是謊言和誤導的紀念碑文，新的銘文以波蘭語、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三種文字銘刻：「紀念耶德瓦布內和周邊的遇難猶太人：男人、女人和他們的孩子們——這塊土地的居民；1941 年 7 月 10 日他們在此地被謀殺和活活燒死。」

新的銘文上標誌了受害人是猶太人，卻略過了遇害的具體人數；在這裡留下了空白。更令猶太人族群體憤怒的是，碑文上沒有說明最核心的問題：誰是兇手？他們認為，儘管波蘭在二戰中深受納粹蹂躪，但他們同樣需要面對自己歷史的陰暗面。耶鎮的猶太人死於他們的鄰人波蘭人，而不是德國人；二戰時德國佔領波蘭期間，在一些小鎮和社區，波蘭人成為殺害猶太人的主凶。

耶鎮拆除原有的紀念碑，並改寫碑文和重新豎碑，與一本小書有關。2000 年，波蘭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波蘭裔美國歷史學家楊·湯瑪斯·格羅斯（Jan Tomasz Gross）的波蘭語著作《鄰人》。次年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英文版（*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¹: 這本書在 2017 年第一次有了中文簡體字版(Gross, 2011 / 張祝馨譯, 2017)。

《鄰人》中譯本只有 232 頁，算不上一本巨著。除去圖片資料和文獻索引，正文僅 142 頁。但它卻是一部里程碑性質的研究，它揭開了一樁歷史懸案，即被波蘭主流歷史論述遮罩了數十年的大屠殺的一種形式：鄰居殺人。具體來說，二戰爆發德國人入侵後，在波蘭東部耶德瓦布內小鎮，一天之內有 1600 名猶太人被驅入穀倉。是他們的波蘭鄰居將穀倉點燃。世代相熟的同胞把這些猶太家庭——從老人到嬰兒、從拉比到工匠全部趕到穀倉。曾經的同學、同鄉、同在一個集市、一個社區生活的波蘭人殘殺了另一族群的波蘭人。當日，一個在此地生活了兩百多年的族群被抹掉了，僅有七個人逃脫厄運。

這部著作在研究波蘭－猶太人關係和大屠殺的歷史上產生了突破性的影響，也引起巨大的爭議。它也迫使波蘭民族記憶研究所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啟動了對耶鎮大屠殺的再度調查。二戰後曾有過調查，但匆匆結束。同時，舉世皆知的是，在耶鎮大屠殺六十周年紀念日之際，波蘭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親自前往穀倉遺址，向猶太人道歉並請求原諒。

而在距那次祭奠和道歉的十七年之後，在 2018 年 1 月 26 日波蘭議會眾議院通過法案：

禁止使用「波蘭集中營」等詞彙來形容二戰期間納粹德國佔領波蘭並在此設立的集中營，以防止人們以為波蘭人也作為加害者參與了大屠殺。以色列《國土報》報導稱，即使是外國人在波蘭使用「波蘭集中營」這樣的詞彙，也有可能面臨最高三年的監禁。

這項法案還需經過波蘭參議院和總統的批准，但美聯社報導稱，這對波蘭的右翼政府來說卻是關鍵一步，因為波蘭政府的官方立場是波蘭人是二戰中的英雄，而不是與納粹合作犯下了令人髮指的罪行（薛雍樂，2018 年 1 月 28 日）。

¹ 電子書見

<http://gen.lib.rus.ec/book/index.php?md5=AD4A202A6FFA18F3950EDB0C8D1CD535>

顯而易見，在波蘭通過這條新法案的背景下，有關耶鎮屠猶悲劇以及與大屠殺相關的民族身份、真相與記憶的爭議還會持續下去，甚至更激烈。而耶鎮紀念碑上這兩個空白——誰殺死了猶太人、殺死了多少猶太人——依然等待著填補。

貳、挑戰歷史敘述：異議史學家格羅斯

格羅斯把《鄰人》這本書作為他的一次挑戰，挑戰通行的二戰歷史敘述。在瞭解他的論述之前，我在網上查找了有關他的經歷。波蘭的亞當·密茲凱維奇研究所是以在全球推廣波蘭文化為主旨的機構，其專題網頁上有關於格羅斯的詳細介紹。²

格羅斯 1947 年 8 月 1 日出生在華沙，父親齊格蒙特·格羅斯（Zygmunt Gross）是律師，出生在克拉科夫的猶太人家庭。在史達林時代的政治審判中，他也是支持波蘭人民黨的活動家。他曾為著名的反對黨成員 Władysław Bartoszewski（九十年代出任過波蘭的外交部長）的和 Stanisław Mierzwa（律師、活動家、政治犯）等重要人物進行過勇敢辯護，因此聞名波蘭。後來他成為波蘭科學院法律專業的副教授，他還是先鋒音樂的作曲家。

格羅斯的母親 Hanna née Szumańska 出生於波蘭上層社會的紳士家庭，在二戰中她參加了抵抗運動，是波蘭家鄉軍中央總部資訊和宣傳局的聯絡人。她的前夫 Stanisław Wertheim 也是猶太人，是該局的報紙編輯。因為被人告發，他在監獄中被殺害。

格羅斯在紀錄片裡曾經談到母親和父親在華沙猶太隔離區的患難相遇。這間接表明他的研究並非是針對波蘭人的偏見。戰爭期間，他的母親雖然是波蘭人，但她以非凡的勇氣出入猶太人隔離區，拯救了許多猶太人免於滅頂之災，其中也包括她未來的丈夫——格羅斯的父親。戰爭結束後，她主要從事法國古典文學的翻譯工作。

² 參見 <https://culture.pl/en/artist/jan-tomasz-gross>

格羅斯在青年時代就參加了華沙的學生異議者群體，中學時代他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個校內的活動組織，它隸屬於一個更大的異議團體，他們對當時波蘭的政治制度提出了質疑。1965 年他進入華沙大學，先學物理一年，後轉到社會學系。在大學期間，格羅斯參加了很多由異議教授在校外組織的討論群組和研討會，從這裡產生出了一批未來的學生抗議者和民主反對派活動家。格羅斯加入的小組叫「突擊隊員」，小組成員反對由單一的官方青年組織塑造管理學生的學術生活。1968 年 3 月 8 日，華沙大學學生集會抗議，格羅斯是發起人之一。這次集會的原因是支持 Adam Michnik 和 Henryk Szlajfer，他們因政治原因被學校除名。格羅斯繼而成為學生抗議運動的一位領導者。

1968 年 3 月的抗議事件之後，他被監禁五個月。他的朋友後來在回憶中說，格羅斯在調查和審訊期間的表現無可挑剔；而不是如《鄰人》後來在波蘭遭受攻擊時人們所指責的：格羅斯揭發舉報了自己的戰友。

1969 年格羅斯和他的父母移居美國，以逃避波蘭對猶太人的迫害。

格羅斯 1975 年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此後一直在大學任教。他曾是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社會科學教授，1992 年至 2003 年在紐約大學任政治學和歐洲研究教授。2003 年後一直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任教。³

格羅斯的研究範圍是現代歐洲，集中在比較政治、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政體、蘇聯和東歐政治以及大屠殺（Holocaust）。他對二戰前後波蘭的政治變化和大屠殺的歷史有著長期的研究積累。

格羅斯的第一本著作是《德國佔領下的波蘭社會》（*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該書出版於 1979 年。其後的主要著作有《來自境外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road*, 1988），書中分析了在 1939 和 1941 年間，蘇聯如何將其政體強加給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

《鄰人》之後，在 2006 年，格羅斯出版了《恐懼：奧斯維辛之後波蘭的反猶主義》（*Fear: 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其中探討了波蘭戰後歲月的反猶事件，特別是 1946 年發生在凱爾采的殺戮猶太人倖存者

³ 現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網頁上，還有關於他的學術研究簡介。詳見：
<https://history.princeton.edu/people/jan-tomasz-gross>

群體的慘案。在那場屠殺中，有 42 位猶太人遇害，五十多人受傷。之前在《鄰人》一書就有一節提及此案。當時有多家工廠罷工，要求釋放那些已被宣判的屠猶兇犯。⁴

格羅斯的前妻 Irena Grudzinska Gross 也是一位波蘭歷史學家，格羅斯與她合作完成了《金色豐收》（*Golden Harvest: Events at the Periphery of the Holocaust*）一書。他在前言中談到，寫這本書的靈感來自一張有關集中營的照片。2009 年 1 月 8 日，在波蘭最大的日報上刊出一張照片，其中呈現的是二戰後在特裡布林卡死亡集中營的遺址上，當地農民成群結夥在萬人坑裡淘寶。曾經有八十萬猶太人在這個集中營被送進焚化爐，卻有這些老百姓在遇難者骨灰裡篩選納粹搜刮後遺漏下的珠寶或金牙。這部著作再度剖析了戰後的各種反猶犯罪，從屠殺、搶劫、獵捕、敲詐、剝奪財產到在骨灰裡淘金。作者繼續探討了二戰大屠殺結束之後的反猶迫害，包括普通人的道德淪喪以及他們的犯罪原因。

在《鄰人》的前言中，格羅斯對 20 世紀的歐洲歷史做了一個簡明扼要的勾勒，他說，20 世紀歐洲歷史經兩個男人的手塑造成形，那就是希特勒和史達林。他們帶來了極權主義——「就算極權主義不是他們發明的，也是由他們全面實施的。」他指出，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將仇恨制度化。「極權主義的政治方法和政治目標一樣，會使社會徹底癱瘓，而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對憎恨的制度化。服從於史達林或希特勒統治的人們總是受到慫恿而敵視對方，彼此間的敵意就如獸性的本能一般。」

這種拉仇恨的結果導致社會各階層、各種族、各個年齡段人群的對立；並且，秘密員警挑動人們彼此揭發，加之政府的社會動員，要求公眾遵循國家的制度規範。如此，公眾在不同程度上成為壓迫者的同謀。

而就二戰中波蘭的處境來看，共產極權和法西斯極權都蹂躪了這片土地。首先希特勒和史達林簽約結盟，波蘭被這兩個極權國家佔領和瓜分，其後蘇德開戰，納粹德國更讓波蘭慘遭浩劫。「近 20% 的波蘭人口死於戰爭及其相關因素。這個國家失去了其少數族群。」戰前，猶太人是波蘭最大的少

⁴ 有關此案還可以查閱 2016 年一部 86 分鐘長度的紀錄片【伯格丹的旅程】（*Bogdan's Journey*），片中反思了這一事件。參見 <https://go2films.com/films/bogdans-journey/>

數民族群體，大約有三百五十萬人。到 1945 年波蘭解放，大約近五百萬波蘭人喪生，這其中有三百萬猶太人和 1.9 萬非猶太民族的波蘭人。波蘭無疑是納粹入侵的受害國，波蘭人也進行了英勇的反抗；但在格羅斯書裡，波蘭展現了其民族形象的另一面，如他所說：「我將本書視為一次對於主流『二戰』史的挑戰」。

挑戰在哪裡？第一，格羅斯指出，傳統的二戰歷史假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戰時歷史，一種屬於猶太人，另一種屬於屈從於納粹統治的某個歐洲國家的所有其他國民。但他以耶鎮屠殺為例提出，這個觀點是完全靠不住的，因為這個鎮上的猶太人被波蘭人殺害，說明這兩個族群的歷史絕非彼此脫離，而是密不可分。

格羅斯認為，在傳統的分析中，有種刻板印象是，猶太人和波蘭人的關係受外部力量調節，具體來說是先後佔領波蘭的蘇聯人和納粹。確實，這兩種力量是發號司令者，但並不能因此否認在佔領者強加的限制之下，也還有波蘭人和猶太人關係中那種起自我主導作用的動態力量。這種自我主導的動機是需要揭示的。

一般分析還認為，猶太人和共產主義存在著互惠關係。這又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二戰後波蘭廣大的社會階層（以及其他東歐社會，就此而言）出現的反猶主義，再一個是猶太人在東歐建立和鞏固了史達林主義這方面所起的作用。格羅斯認為，在這方面存在著最大的誤解和刻板印象；事實不僅並非如此，而且還恰恰相反：正是那些殺害猶太人的兇手，曾經被蘇聯安全部門收買為臥底，並且在史達林時代得以脫罪，還成為新政權的基礎骨幹。

參、歷史拼圖：《鄰人》的史料脈絡

格羅斯的觀點引起軒然大波，以至於官方機構重啟對耶鎮屠猶案的調查，包括挖掘耶鎮猶太墳場，以便進行屍檢，可見該書的影響力。那麼格羅斯採用了哪些史料來推翻德國人在耶鎮屠猶這一定論，重現了波蘭本地人屠猶的真相？

格羅斯在《鄰人》的第三節〈資料來源〉對此做了說明，從中可以歸納出這樣幾條脈絡：

第一，查找德國文獻，沒有耶鎮屠猶記錄。格羅斯說，最好的史料莫過於德國文獻（假如是德國人殺了猶太人），自德國軍隊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進入原蘇聯佔領的波蘭這部分地區（包括耶鎮）後，納粹安全部門每日都有報告發佈；但是，在相關檔案中找不到耶鎮的名字。又有親歷者提及，戰時在德國的新聞紀錄片裡看到過耶德瓦布內鎮的標誌，而這個片子裡說的卻是，波蘭人如何在這樣一些村鎮屠殺猶太人。德國人希望以此為自己實施的種族滅絕計畫找藉口，即波蘭本地人也和他們同樣地仇恨猶太人。不過，格羅斯也沒有找到這個紀錄片。德方史料中缺乏軍隊在耶鎮戰況的記載，這可以作為一個反證：納粹沒有在耶鎮實施大屠殺。

第二，最早的一份證詞來自耶鎮屠殺倖存者施姆爾·瓦瑟什塔因（Szmul Waserztajn），格羅斯在《鄰人》的前言的結尾寫道：謹以此書紀念瓦瑟什塔因（這位倖存者在該書波蘭版出版的當年去世）。1945 年 4 月 5 日，瓦瑟什塔因在比亞韋斯托克地區的猶太人歷史委員會作出證詞，詳盡陳述了 1941 年 7 月 10 日發生的耶鎮居民屠猶案，格羅斯在該書第二節〈事件梗概〉中引證了他的陳述。二戰後，在華沙的猶太歷史研究院迅即收集倖存者證詞，瓦瑟什塔因這份證詞歸於「個人證詞」，是這個卷宗裡收錄的七千多份檔案之一。

第三，1949 年 5 月至 1953 年 11 月沃姆紮庭審記錄（此項稍後還將詳述），耶鎮屠殺立案緣於波蘭猶太歷史研究院向司法部寄送的材料，舉報耶鎮居民參與謀殺猶太人。由此司法部門展開，對耶鎮被告居民進行了開庭審理。

第四，1980 年，一部有關耶鎮歷史和猶太族群遇難的紀念冊在以色列出版，項目由紐約和耶路撒冷的耶鎮同鄉會發起。⁵在這本書中有數位慘案目擊者和倖存者的描述，還有部分遇難者的老照片。格羅斯有關戰前耶鎮生活的描述主要來自這本書中；他的書中附有的 27 張圖片，有的也是來自這本紀念冊。

⁵ 這本書有電子版，後來有了專題網頁，由耶鎮猶太人的親友與後代作為志願者進行網頁維護。

第五，1998 年，波蘭女導演阿格涅斯卡·阿諾德（Agnieszka Anold）就此案開始採訪耶鎮居民；格羅斯採用了其中一些採訪稿。

第六，格羅斯自己的採訪。他訪問了戰前從耶鎮移民到美國現居紐約的拉比雅各·貝克（Rabbi Jacob Baker）——他也是耶鎮紀念冊一書的主要作者和編者、貝克的兄弟（他藏在耶鎮周邊直到戰爭結束）、當日在耶鎮的猶太人倖存者；他也重返波蘭訪問了現在依然生活在耶鎮的老人們。

除了以上格羅斯自己說明的資料脈絡外，我們從書中還可以看到，格羅斯閱讀了大量的旁證資料來討論當時波蘭鄉村社會在蘇德兩方先後佔領期間對戰爭的反應，其中包括未公開發表的一些記錄，如前地區檔案館館長的未命名打字稿等。在〈通敵〉一節裡，他引用了一個四卷本戰時回憶文集裡的徵文。但選取的段落則是被波蘭國家審查局刪節的部分。他通過編輯的關係，讀到了未刪節版的參賽文章。對史料的這種敏感和尋根刨底，顯示了一個史學家的專業素養。

在以上列舉的線索中，格羅斯說道，他採用的主要文獻不是來自受害人，而是來自施害人，即庭審材料。原因很簡單，絕大多數人都已喪生，只有七位倖存者活下來，目擊證人留下的文字也十分有限。戰後受害人對施害人有舉報和庭審，這是他書裡引用的主要資料。

就庭審而言，當時的過程也很倉促，好在有前後的調查以及被告的申訴等文字留存。全案有 22 名嫌疑人被指控，開庭集中在 1949 年 5 月 16 日同一天，第二天即宣判。其中 8 人無罪釋放，餘下 13 人中，僅 1 人判死刑，其餘罪犯的刑期在 8 到 15 年。還有一個被告是當時的副鎮長，1953 年才受審，也被判無罪。相對於一千多人在一天內被屠殺的規模，只有這十來個人承擔了刑責！

那麼，庭審資料真的可靠嗎？史達林時代的員警機關因刑訊逼供而聲名狼藉，而且被告也有人當庭翻供，說他們是被迫承認殺人。對這個疑問，格羅斯也做了說明，他的主要觀點是：

這個案子在當時來說，並不屬於政治案件，員警也沒有進行刨根問底的調查。如前所述，庭審相當草率。這表明安全部門並不把它看作要案，只是因為有人起訴控告，它進入了司法程序，所以不能不過堂。由於調查時間僅

在兩周內，法庭在對案件的定性、傷害程度以及案發時間方面都發生了錯誤。例如，嫌疑人被認為僅僅是「參與了在耶鎮對 1200 猶太族裔人群的抓捕」，而這些猶太人「被德國人」在穀倉燒死，如此行為助長了德國利益。也就是說，這些罪犯的角色僅僅是協助者而不是主凶。而且，寫錯的作案時間也在幾個月後才糾正。按照格羅斯的看法，既然此案只是被當作普通案件處理，作為當事人的陳述，當然就有了直接的重要性。

格羅斯認為，就嫌疑人證詞來說，他們也只會縮小和弱化自己的作用，而不可能誇大。如果警方出於立功自利的目的或者政治目的辦案，他們會不遺餘力拿到自己想要的證據，嫌疑人也可能被迫作偽證。但就這個案子來看，嫌疑人除了抵賴和推卸責任，根本不可能否認慘案本身。鎮裡所有人都知道屠殺的真相，哪些人參與其中，這在當地不是秘密。因此，研究者可以通過對嫌疑人口供的比照，找出慘案發生的時間線，並且分析嫌疑人彼此如何描述自己和他人在案中扮演的角色。

格羅斯只是提到而沒有展開，即為什麼這個案件沒有被重視。他提到的是，二戰結束後，蘇聯掀起狂熱的反猶運動。因此針對猶太人被波蘭人屠殺的案件，在當時不可能得到深入追究。

我們也可以說，耶鎮屠猶案因此陷入了一個悖論。它沒有被當作政治案件處理，但發生在納粹屠猶的大背景下，它不可能不是一個政治案件。而戰後新入場的共產極權統治者出於本身的政治需要，竟迎合了當地犯罪者的共謀，最後就把德國人演繹成了耶鎮屠猶的兇犯。

肆、偏見、暴力以及屠殺的群體性質

在一個鎮上，幾代人生活在一起。猶太人的拉比和天主教的神父可以並肩散步，孩子們一起上學，去舞會；鄰裡之間也有人情往來。雖然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和語言不同（部分猶太人講意第緒語），大家也都彼此熟悉。為什麼，在德國人接管前蘇聯佔領區的僅兩周之內，就發生了這樣兇殘的鄰裡屠戮？人們之間究竟是怎麼了？

格羅斯用了三小節的論述說明有關這場屠殺的起因、與外部佔領者的關係以及準備過程。

從起因來看，耶鎮猶太人在波蘭被蘇德先後佔領期間，處於多重困境。首先，當地人至今對猶太人有這樣的刻板印象——他們親蘇，與佔領者合作。第二，蘇聯佔領期間鎮壓當地人，播下仇恨的種子——蘇共政權把蘇式政體強加給當地人，鎮壓反對派，強迫教徒還俗，剝奪居民財產，讓本地居民在「蘇維埃化」的過程中，付出沉重的代價。因此，當德軍進入波蘭時，他們成了解放者，受到當地居民的熱烈歡迎。第三，作為對蘇聯佔領者的報復，周邊村鎮開始新一輪檢舉——檢舉親蘇者，包括檢舉被認為是親蘇的猶太人。而德國人本來就是帶著種族清洗計畫跨境而來的，本地人的屠猶暴力和侵略者正相投合。

格羅斯通過分析表明，耶鎮猶太人親蘇通敵——這是偏見而不是事實。在這方面，他採用了四種資料，一種是我前面提到的比亞韋斯托克檔案專家的未公開文稿，裡面提供了耶鎮在蘇聯治下任職官員的名字；蘇聯當局派出了他們自己內部的官員，其中並沒有猶太人。第二種資料出自紀錄片導演阿諾德的兩個採訪；其中非猶太居民談到猶太人親蘇，只是推論和印象，並沒有具體的事實和證據。第三種資料是蘇德開戰後由蘇聯內波蘭戰俘重組的安德斯軍團士兵傳記，其中揭秘了發生在耶鎮地區的一段疑案。這段時期在耶鎮，有一個地下反蘇組織被摧毀。而這位親歷者的描述說明，反蘇組織被鎮壓和猶太人沒關係。他們內部出了叛徒，其中沒有一個是猶太人。因此，這兩個暴力事件不能扯到一起。

但格羅斯提出一個新的也同樣是挑戰性的觀點，來源是他的第四種資料：該地區蘇聯部隊最高指揮官寫給下級領導的備忘錄，其中蘇軍指揮官提出，控制耶鎮反蘇叛軍的一種方法是；先實施大赦，讓反蘇組織成員自首；然後從中招募線人，為蘇軍提供情報。這裡就要談到格羅斯說他所採用的主要資料——耶鎮屠猶案庭審材料了，他在被告人要求釋放的請願書裡找到了佐證：不是猶太人、而是屠殺他們的波蘭人，先前是自首後投向蘇聯佔領方的線人。

在陳述耶鎮屠殺案之前，格羅斯引用了耶鎮周邊拉茲沃夫屠殺案的長篇證詞，它來自一位猶太人倖存者芬克什坦因，其中呈現了這場屠殺的另外兩個特點：本地人針對猶太人的暴力得到德國佔領者的准許，又加上以宗教為名的政治鼓動——找害死耶穌基督的人復仇；殺戮因此披上了神聖的外衣，而有了天然合法性。不僅如此，而且，消滅了猶太人，他們的財產便成為天然的戰利品和遺產任人瓜分；這就更刺激了底層民眾的貪欲。

在侵略者更迭、政治衝突激烈，再加上宗教、私欲或還有個人過節等多重動機的觸發下，社會的公序良俗全面崩盤。猶太人孤立無援，陷入滅頂之災。在逃命途中，他們遭到驅趕、詛咒和威脅，也買不到食物。更有甚者，當地人把守道路，抓捕逃跑者，將他們趕盡殺絕。芬克什塔因在證言中說：「就這樣，拉茲沃夫的猶太社群，在存在了五百年之後，被從地球上徹底抹除。和猶太人同時被毀滅的還有村裡所有與猶太人相關的東西：猶太學校、猶太教堂和猶太人的墓地。」（中譯本，第 56 頁，參見這一節的註釋 6，中譯本第 192 頁）

如此，在耶鎮大屠殺發生的幾天之前，周邊地區有 7 月 5 日翁索什屠殺慘案、7 月 7 日拉茲沃夫慘案，遇害猶太人數難以確切統計，但也達到了數百人的規模（按照芬的證言，僅在他的家鄉拉茲沃夫就是八百人之眾）。這些屠殺都屬於群體滅絕，無論老少，不留活口。再則，施暴者都是波蘭人（蘇德戰爭 6 月 22 日爆發，18 天時間裡，德軍還在東部戰線推進，還沒有來得及做地方權力交接）。而且，暴力的手段則極其殘忍，包括羞辱、亂棍打死、活埋。

繼而是 7 月 10 日耶鎮大屠殺，描述這個事件，格羅斯首先從最有爭議的方面開始梳理——耶鎮屠殺與德國人的關係。

格羅斯把這個問題稱之為一個「學術問題」，這裡有太多細節需要證實：他們來過沒有？什麼編號？哪天來的？來過多少？多年來官方已有定論是德國人屠猶，怎麼可能證明不是德國人？

格羅斯從證詞裡發現，嫌疑人和證人說到蓋世太保來過耶鎮，細節並不清楚，到達時間是在當日還是之前或之後也不統一。而證人的證詞在再次開庭後也有變化。如一個憲兵站廚娘的證言先是說，沒看到德國人打猶太人，

人都是波蘭人殺的。但幾個月後她說的完全不同：「有 60 名蓋世太保來到耶鎮」。這個證言是後來的庭審做出德國人屠猶這一結論的具體證據，但是該案唯一的死刑犯卡羅爾·巴登卻對之做出否定。他明確表達說：殘殺猶太人的不是蓋世太保，而是在鎮長卡羅拉克領導下的當地民眾。

格羅斯採信了巴登的證言，他也列出其他證言，通過比較對照，可以得到印證。能夠肯定的是，新組成的鎮政府與德國人在屠殺猶太人這件事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德國人的直接參與極其有限。

那麼，廚娘的證詞為什麼會變化？我們可以想見，在當地那麼多人參與的群體暴力事件，她如果指認自己的左鄰右舍，勢必會受到來自被告家庭和親友的巨大壓力。的確，其他被告以及家庭都寫有上訴信和請願書，其中都強調屠猶有德國人旨意，以此為自己開脫。

而巴登為什麼要在法庭上訴中強調廚娘做了偽證呢？後來給波蘭總統寫信請求赦免，其中，他依然堅持沒有看到德國人到場。我們也可以由中國俗話所謂「法不責眾」的邏輯來理解，他要強調，自己只不過是眾多兇犯之一，當然不應該承受死刑。如果他也賴到德國人頭上，那麼他的行為只能是通敵暴行，罪無可赦。

格羅斯從他所引用的證人證言裡統計，參與了耶鎮屠殺有名有姓的當地人有 92 個。耶鎮當時的居民總共不過 2500 人，猶太人占三分之二，減去被滅絕的猶太人群體，減去波蘭人口中的女性，再減去老人和孩子，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年男性都參與了屠殺！這裡還不包括當事人無法指認的那些鄉民，他們從鄰近地區趕來參與其中。因此格羅斯說，這是雙重意義的大屠殺：不僅是受害人數量巨大，而且兇手也不計其數。

伍、群體暴力的原始性與誘因邏輯

在〈謀殺〉這一節裡，格羅斯通過多個證人的證詞，還原了 1941 年 7 月 10 日耶鎮血腥一日。清晨，鄰鎮的人們趕著馬車源源駛入耶鎮，所有的波蘭成年男性已經被召集起來；猶太人被驅趕到小鎮的市集廣場上，據說是

去做清潔。屠殺行動開始，在鎮上的不同角落人們用石頭砸，用棍子打，把猶太人溺死在水塘，姦殺女性，一位猶太老師的美麗女兒頭被砍下來當球踢，母親和嬰兒一同被殺……成群結夥的人們開始用各種方式行兇。他們把一群猶太人趕到墓地讓他們挖坑，接著就將他們逐一打死，用最原始的工具：鐵鍬、刀、棍棒……

這股殺人狂潮仿佛有著自身的動力，從一個村鎮向另一個村鎮滾動，而且具有強烈的煽動性和可複製性。最後將所有人集中到穀倉裡全部燒死，這也正是幾天前拉茲沃夫屠殺的最後結局。從格羅斯展示的證言來看，沒有德國人到達現場，也沒有武裝逼迫。在這個施暴過程中，暴徒們完全是自覺自願，而且情緒高漲，花樣翻新。從打碎列寧雕像，讓拉比帶頭遊街示眾自我羞辱，到割去受害人舌頭；最後點燃穀倉，直接將一千多人燒死……其野蠻程度已經超過了當時入侵的德國人。

這是我們不熟悉的大屠殺的模式，它也讓我們回頭去思考格羅斯在本書前言中提出的，每一場大屠殺有其自身的情境動力（*situational dynamics*）。納粹固然有對猶太人的清洗計畫，但讓本地人介入並非在納粹的計畫中。它只是這個大背景下的一個插曲，也沒有證據表明德國人威脅了鎮政府，要求他們必須在當日滅絕猶太人。相反，有證言表明，德國憲兵站裡還藏了幾個猶太人，使得他們躲過當日劫難。那麼，當地人那麼積極地投身於這場暴力狂歡，「這種爆炸性的潛能從何而來」？

這也就是格羅斯接下來思考的問題，在〈不合時宜〉這一節，他思考了耶鎮屠殺的原始特徵：它好像是一個時代錯誤、一個不合時宜的事件，偏離了我們所瞭解大屠殺的一般圖景。他說，納粹對幾百萬猶太人的大屠殺，在當代的學術文獻中，這被描述為植根於現代性的現象。因為大屠殺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極富效率的官僚系統，一個是相對先進的殺人技術。但耶鎮屠殺看起來和這兩點都沒關係。它仿佛是十七世紀波蘭小說裡農民戰爭中的人物從書頁裡走出來，帶有流民暴力、土匪行動的性質。這些人並無嚴密的組織，使用的殺人工具也極其原始，他們沒有槍沒有炮，用的就是石塊、木棍、鐵棒、火……就地取材，即興殺人。

格羅斯認為，這裡面的影響因素有一方面是宗教宣傳中的反猶迷信。例如，天主教徒相信，猶太人會用天主教孩子的血製作逾越節的薄餅。戰後在克拉科夫和凱爾采這兩個地方發生的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其中都有這個說法作為鼓動因素。但是他認為，更原始的動力是對物質的欲望。暴徒行兇是為了徹底佔有猶太鄰人的財產，同時又意外地得到了這個機會（德國入侵）——而不是或者不僅僅是因為傳統的反猶觀念。讀者從這裡可以看到，這種植根於貪欲的動力不同於戰爭激發的對立狀態，它屬於更普遍的人性之惡，也是更危險的黑暗能量。

可是，也正是這些借納粹之力大開殺戒的劊子手們，能夠被極權統治者所利用，成為在納粹和共產波蘭時期兩頭通吃的人物。這是格羅斯的又一發現。在〈私人傳記〉和〈史達林主義的社會支援〉這兩節分別涉及到這個問題。

首先他發現，這二十來個被告都是一群普通人。然而，這裡有四個人其實是佔領時期蘇聯機構的工作人員。當然，如果是為謀生計，倒也不奇怪。但是在那個死刑犯巴登的自白裡，他提到他還是那個地區屬下耶鎮的蘇維埃代表。那麼，問題來了，德軍入境，他們為什麼不躲著德國人，反而要衝出去殺猶太人呢？

格羅斯認為，他們這種政治身份的迅速轉換，不是個性問題，而是適應著二十世紀極權政體那種「誘因的邏輯」（the logic of incentives）。這些人本來就沒有什麼信仰，只是通過效忠佔領者來圖取利益：蘇聯佔領時做黨代表，德國人來了殺猶太人。當新政權建立起來，他們害怕自己因有過去幹髒活的不良記錄被敲詐，就會去做討好現政權執政者的事情。極權政體也正好可以用利益引誘他們，並且通過這些有軟肋的人來進行社會控制。

在殺人犯齊格蒙特的請願書裡，他寫出了自己被蘇聯的內務委員會招納為線人的過程。他先是按照組織上授意偽裝做反蘇分子，而德國人入境後；出於恐懼，他又讓其弟加入了德國憲兵隊。戰後他又加入了波蘭工人黨。他強調自己應該得到公正對待，而他弟弟最後也得到了假釋。

從這裡，讀者已經可以理解，為什麼這些參與屠殺的被告大多都逃脫了懲處。就這些人在戰後的表現，格羅斯提出了更尖銳的推論：波蘭史達林主

義的社會基礎不是猶太人，而是這個國家本土的流氓無產者。他們本來就是暴力的工具，他們也很容易服務於新政權的暴力。由於這些人得到重用，他們所在的社區也沒有能力抵抗蘇維埃化。

陸、處理史料的新方法與民族身份反思

倘若耶鎮屠殺的真相正如格羅斯在書中所述，它意味著什麼？這一研究更深遠的意義在哪裡？

在〈處理史料的新方法〉這一節裡，格羅斯寫到：「1941 年夏對耶鎮猶太人的大屠殺開啟了二戰期間波蘭——猶太關係的歷史書寫」。它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一個焦點話題。如今，以 JEDWABNE 為關鍵字，可以檢索到大量的討論文獻。而當初在格羅斯揭示了耶鎮慘案的全過程後，作者也對以往處理史料的方法、對被提純和英雄化的波蘭二戰歷史，提出了挑戰性的問題。

從方法論來說，儘管他的研究主要採用的是被告的審訊文獻，但他強調了重讀猶太人證詞的重要性。這是他審視被告證詞的前提。他認為，必須首先接納猶太人倖存者對殺人犯的指控，信以為真，直到找到確鑿的反證；而不是先不取信，再去找反證。這是格羅斯提出的處理這一時期史料的新方法。他的意思是，如果對倖存者的證詞像通常的做法那樣首先質疑，再去取證（而活著的兇手會用各種方法脫罪）；那麼，受害人的聲音就淹沒了。尤其是在大屠殺這樣慘烈的事件中，「災難越深重，倖存者越少。我們必須有能力傾聽從深淵傳來的那些孤獨的聲音」。

他說，提出這個觀點是基於他的研究經驗。他自己也用了四年的時間來搞清楚「把剩下的猶太人都燒死在穀倉」，這原來並不是比喻而是事實。一方面，在波蘭二戰史研究的歷史敘述中，就沒有關於波蘭人參與或介入滅絕波蘭猶太人的記錄。另一方面，在華沙的猶太歷史研究所存在著超過七千份得到詳實記錄的證詞。兩相對照，可見研究是多麼薄弱。但格羅斯指的還不僅是這一點，他要強調的是，從耶鎮屠殺親歷者瓦瑟斯坦因和拉茲沃夫屠殺

親歷者芬克斯坦因的證詞來看，發生的暴行太殘忍，超過了人們的理解力。對此格羅斯提出，研究者迫切地需要改變他們處理史料的方法。

改變什麼呢？他說，所有已知的大屠殺的故事，可能是有偏差的，不能將之看作具有代表性的經典實例。必須記住，所有這些故事都是活下來的人講述的，他們是幸運者，而那些在二戰中慘遭滅絕的百分之九十的波蘭戰前猶太人群，他們的故事已經無人能夠講述。因此對於目前僅有的證言，哪怕是隻言片語，哪怕遠非完整，也要確確實實加倍認真地進行分析；從而認識到，那些發生在黑暗中心的悲劇，遠遠超過了現有的文字記錄。

如果說，上面的觀點涉及到倖存者個人經驗與猶太人受害群體的關係；那麼在〈集體責任〉一節，格羅斯還指出了個人施害者的責任和民族責任的關聯。他認為，就前者來說，對於那些並非出於命令、責任或者逼迫而自願參與到屠殺裡來的人，他們與執行命令的軍人不同；他們也不能將責任推卸給集體：「我們必須清楚地記住，為每一起殺戮負責的只能是一個或者一群具體的殺人犯，他們要承擔罪責。」但是，格羅斯進一步指出：「儘管如此，我們還必須去調查，究竟是什麼使得一個民族（如在「德意志人」中）有能力實施這些行為。或者說，可以暫且不考慮這些殘暴的行為或者乾脆將之遺忘嗎？可以從一個民族的遺產中隨心所欲地選擇自己喜歡的，將之宣稱為唯一的遺產而排斥其他一切嗎？」

這裡，格羅斯不僅是對耶鎮居民屠殺猶太人來叩問當代波蘭人的良知，他也是在對轉型後的民主波蘭提問。在他看來，那種單一的、固化和英雄化的民族身份建構是有問題的。若要想像民族這個共同體，不可能只是以其英雄偉業為代表，而剔除同屬這個民族的暴徒惡行。應該認識到，民族身份疆界具有開放性，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需要賦權自己，去挑戰那種僵化的、被美化的民族身份想像。如此，在歷史書寫中，當下的波蘭人也必須面對波蘭一猶太戰時關係的問題。如果在社會的集體傳記裡保有一個彌天大謊，那麼在它之後書寫的一切也必然喪失其真實性。人們也無法安然生活，因為他們時時要擔心這種謊言被揭穿。

在結束全書的後記裡，格羅斯寄望於波蘭的新一代：「他們成長於擁有言論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波蘭，已準備好來直面波蘭－猶太戰時關係的真實歷史了。」

柒、《鄰人》引起的爭議、司法調查與作者回應

《鄰人》在波蘭引起巨大反響，超過格羅斯自己的預計。反對者舉行抗議，高呼要把格羅斯丟到河裡去。2001 年波蘭總統到耶鎮參加遇難者新墓碑揭幕典禮時，小鎮的多數居民冷眼旁觀，連鎮議會成員也僅有兩人出席。直至 2014 年，在萊沃米爾·葛蘭伯格的紀錄片【耶鎮遺產】（*The Legacy of Jedwabne*，下一節我會具體介紹）中，耶德瓦布內鎮裡的天主教神父依然堅持說：這一切都是趟渾水，模糊真相，搞得波蘭人好像成了殺人犯。就在猶太人倖存者與後代親友去往耶鎮墓地的路上，他們看到小鎮的樹上貼著白紙，上面寫著：「我們絕不道歉！」「德國人殺了耶鎮猶太人，他們應該道歉！」……

有關波蘭人和猶太人的關係，批評者認為格羅斯以偏概全。他們說，那些遇害的猶太人也是波蘭人，從 13 世紀到 18 世紀，當猶太人在歐洲其他國家遭受迫害和屠殺而逃出時，波蘭一直都是猶太人的庇護地。二戰期間，在被德國納粹佔領的各個國家，有 26% 的獲救猶太人是波蘭人救的。1943 年 1 月開始，猶太人的戰鬥組織和波蘭家鄉軍代表商討了在華沙起義發生時的於猶太隔離區牆內外的聯合行動，波蘭家鄉軍的官員設法給他們送去了大量武器彈藥。波蘭也是所有國家中唯一對猶太人設有地下財政救援機構的國家。以色列以「國際義人」獎章授予世界各國幫助猶太人的英雄，在被嘉獎的 24356 人中，有 6439 位是波蘭人。

有關耶鎮屠殺的史學爭論一直在繼續，對格羅斯的批評包括而不限於以下幾點：他過於依賴倖存者的敘述而沒有和其他資料來源對照確認。他把小鎮居民的態度當作全體波蘭人民的態度，這是對英勇抵抗納粹的波蘭人民的玷污。他有關死亡人數的數字既不可靠，也不準確。有關耶鎮兇犯也有三種

觀點：第一是堅持德國人殺了猶太人；第二是認為波蘭人殺的，應當反省；第三是認為波蘭人在德國人逼迫下殺的猶太人。

在《鄰人》英文版出版後的 2002 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斯拉夫評論》(Slavic Review) 組織了《鄰人》專題研討會，在會上，格羅斯對有關批評做出了回應。他強調，首先，他沒有只用一邊倒的證據，因為該書出版後，並沒有新的史料出來，所有現存史料已被納入。而如記者安娜·比康特 (Anna Bikont) 繼而發佈的調查報告、阿諾德 (Agnieszka Arnold) 的 2001 年的同名紀錄片⁶則更擴展和強化了《鄰人》的發現。⁷

在《回應》(A response) 一文中，格羅斯引述了由波蘭國家記憶研究所 (the Polish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在 2001 年 12 月 19 日的新聞發佈會上公佈的調查說，確實，耶鎮屠殺還「沒有最終結論」；但是該所負責人同樣申明：「沒有證據表明有任何德國單位在 7 月 10 日到過耶德瓦布內。」

就死亡人數而言，有波蘭歷史學家認為僅在 340 人左右。特別是在 2015 年選舉右翼政黨上台之後，他們更強烈呼籲在耶鎮重啟挖掘遺骸，證明這不是波蘭人幹的，而是德國人的罪行。據說在耶鎮遺址上次開掘時曾發現數枚德國的子彈。我們現在在 Youtube 上也能看到一個訪談，一位前耶鎮老太太說她親眼見到，全是納粹幹的。

所謂重啟掘墓，的確已經有過一次開掘。2001 年格羅斯的《鄰人》出版後，為核實犯罪，由波蘭民族記憶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Polish: 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 IPN) 調查機構在穀倉附近埋屍遺址上進行了挖掘，而這次挖掘和媒體報導中的猶太人死亡人數變更有相關性。

格羅斯在《回應》中重點對此做了說明。他聲明說，他完全不想剝奪他人生命，哪怕是在紙上；他也不願意誇大耶鎮屠殺中遇難猶太人的數字。他寧願這個數字沒有那麼多，但 1600 人這個數字卻並不是他發明出來的。首

⁶ Neighbours part 1, Youtube 上有英文字幕版

⁷ Gross, J.T.(2002).A response. *Slavic Review*, 61(3), pp. 483-489 “”，可以通過 <https://jstor.org> 檢索獲得

先，這個數字或者說規模出現在很多史料描述中，有瓦瑟斯坦因的證詞可以對照。而且，作為納粹的罪行，最早是波蘭當局將這個數字刻入耶鎮屠殺遺址碑銘。而在二戰後的審判過程中，也有波蘭人作證說有一千五百人遇害；同樣的數字還出現在秘密員警的總結報告裡。格羅斯書中曾引用耶鎮猶太人同鄉會紀念冊裡的證言，我也在網上查閱了他提到的證言文章，其中具體說到，耶鎮屠殺的遇難者有兩千左右，其中耶鎮猶太居民遇難者 1460 人，其他大約有 600 人。這批人是因為耶鎮 12 公里外的維茲納發生大屠殺後逃到耶鎮投親靠友的（Rogers & Hundt, 1980）。

格羅斯認為，這些數字眾所周知，並且是既成事實。再根據 1931 年的人口普查，那時大約就有 1600 猶太人生活在耶鎮。他繼而分析說，波蘭方面將遇難猶太人的總數縮小為數百人，源於 2001 年 6 月開始的第一次遺址挖掘，這是 IPN 調查中唯一欠缺的方面。

他說，根據專家意見，像耶鎮這樣大規模的遇難遺址，至少要用好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來挖掘。但問題在於，耶鎮的挖掘僅用了五天。波蘭當局決定縮短這個過程，其說辭是要照顧猶太人的宗教情感。而根據猶太教相關律法（Halacha），禁止打擾人的遺體；除非這麼做可以防止更大的侮辱損害，或者是為了挽救人的生命。格羅斯說，他當時就發表了文章提出抗議。因為在挖掘現場，確有來自華沙、以色列和倫敦的著名拉比先後到場，他們在現場監督，確認處理這些遺骸是遵循了猶太教的相關規定，還是有哪怕任何一點違背。事實是，只有一個公墓的最外一層被打開，那些遺骸並沒有因開墳檢驗而受到破壞。法醫當場直接認定了好幾十具遺骸，死者中有女性、兒童，也有老年人。

2003 年 Anna M.Cienciala 在《波蘭評論》48 卷第 1 期發表文章《耶德瓦布內大屠殺：更新與回顧》（Cienciala, 2003），她引述了進一步的調查結果：2002 年 7 月 9 日，波蘭民族記憶研究所的檢察官 Radoslaw Iwanow 發佈了司法調查的最後結論。他強調大屠殺有著事先計畫這一特點，這表明德國人參與了組織屠殺。他指出，儘管德國方面的積極參與沒有被記錄下來，但人們都知道德國人如此就是蓄意不留任何蹤跡。因此，他認為，在刑法的總體框架下，這個罪行要歸咎於德國人。但是，參與屠殺的依然有耶鎮的波蘭居民，

至少有四十個男性實施了犯罪行為。有一小撥德國人很可能在驅逐猶太人到市集廣場上起了協助作用。但是證人證言在這方面差異很大，以至於不清楚他們是否參與了最後的行動，即送這些受害人到達處決現場，或者他們是否出現在了穀倉那裡。儘管如此，總之不能把德國人排除掉。Iwanow 評估在穀倉最後被燒死的猶太人大概是三百左右，包括婦女和兒童。但是他也說到，在把這部分猶太人從市集帶到穀倉去之前，也有猶太人被其他人殺害。⁸

IPN 的耶鎮屠殺調查後來有專書出版，編者之一、波蘭歷史學家 Pawel Machcewicz 在導言中指出，這一歷史性的調查留下了如下問題有待回答：

（一）道德問題：當代波蘭人應該如何理解和評價這些波蘭人的態度——他們壓迫猶太人，或者敵視、冷漠，拒絕幫助他們？尤其重要的還有波蘭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態度，他們對此慘案不發一聲，卻忙於慶祝 2001 年 5 月所有波蘭主教都參與的一場感化彌撒活動。（二）政治方面：波蘭國家的代表需要為六十年前在德國佔領下發生的事情而承擔責任嗎？（三）心理／社會方面：一群「普通人」如何可能成為殺人犯，而且殘酷殺害與之幾十年來相處的鄰居？（四）歷史問題：真相到底是什麼？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格羅斯的事實重建是可靠的嗎？就耶鎮屠殺以及發生拉姆紮和比亞韋斯托克地區其他 22 個村鎮的屠殺，波蘭人的歷史觀應該有哪些改變？（見 Anna M Cienciala 書中第 51 頁）

他提出的問題也是與格羅斯的積極對話，正如格羅斯所說：在直面大屠殺的歷史時，也許我們有望找到的唯一安慰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無休無止地提出問題，對此我們也將繼續尋找答案。

捌、影像對話之一：紀錄片裡的耶鎮大屠殺

如前所述，格羅斯的《鄰人》這一著作，最初來自紀錄片的啟發。我在網上查到有關耶鎮大屠殺的紀錄片有三部，其中，波蘭女導演阿格涅斯卡·

⁸ 詳見：<http://info-poland.icm.edu.pl/classroom/J/index.html>

阿諾德（Agnieszka Arnold）為電視台製作的同名紀錄片【鄰人】（*Sąsiedzi*）是最早的一部。她也因此被稱為「改變了歷史進程的女人」，她是比格羅斯更早揭秘耶鎮屠殺真相的電影人。

阿諾德是波蘭女導演、劇本作家和記者。她與楊·格羅斯是同齡人，也是校友；他們都畢業於華沙大學，她的專業是波蘭研究。她執導了近三十部紀錄片，其作品有多部聚焦於二戰時的大屠殺，還有對波蘭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人物。她 1997 年開始採訪耶鎮慘案中的當事人、見證者和倖存者，後來她還去了哥斯大黎加、美國等地採訪證人、幫助猶太人逃生的人。但她覺得【鄰人】是沒機會面世的。因此她放給朋友們和有興趣的人看，楊·格羅斯因此開始關注耶鎮慘案，又用了近四年時間完成他的著作。阿諾德在接受採訪時說，我把自我的考慮放在一邊，因為我知道，他的著作出版後，我的片子就可以和觀眾見面了。

果然如此，2001 年 4 月 3 日、4 日，波蘭國家電視台連續兩天播放了阿諾德的這部紀錄片的上下集。時任波蘭總統的顧問、波蘭總理的顧問團隊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說，真相令人震驚，必須瞭解這些事實。

這部片子網上能夠找到，不過目前只有上集有英文字幕。⁹出現在格羅斯《鄰人》中的人物在螢幕上說話，讓觀眾的思緒在過去和現在的耶鎮流動，受到震撼也引起思索。

阿諾德在採訪時也是小心翼翼的，有的人在紀錄片中只留下聲音而沒有露臉。阿諾德記錄了這樣的證言，一位倖存者的後代說：

當我們跟父親回來的時候，我們並不是要找罪人，我只是想看看他們的臉。他們告訴我父親，一個人在他臨終前說：「別問了，忘掉。」誰能忘記他母親在火焰中被焚毀時的哭聲？他們在那一天還敲著鼓去蓋住孩子們的哭喊聲，這些孩子是在教堂前的廣場上被殺害的。能忘掉這些嗎？

⁹ 參見 <https://vimeo.com/255173962>

另一位見證者說：

我父親身邊有很多趕車人，在黑夜中，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把猶太人塞進車裡，把他們扔進溝裡，一個接一個，他們都是窒息死的。第二天地面一直都在動，老百姓會過去看熱鬧。很多人都是活埋的，當兇手離開後，地面一直都在起伏。那些在車上的會抬起頭，但是不能說話了。他們會抓住猶太人的小孩子，用他們的頭去撞牆。每個人都很髒，衣服上沾滿血跡。第二天媽媽往車上倒水，拿刷子把車上的血跡刷乾淨。我記得的就是這樣。

那位隱身於黑暗中的男性說：「整個鎮子都浸透了猶太人的血。如果不是父親，那麼就是兒子、叔叔或者兄弟幹的。有那麼大的仇恨，好像我們成了另一個民族。」

片子裡有後來受審獲假釋的耶日·勞丹斯基，也有第一位挺身而出為慘案作證的猶太人瓦瑟斯坦因。片中出現了穀倉的舊址，也有屠殺後的墳場。一群穿白衣的猶太人的孩子高高興興地去出席活動，這個畫面來自瓦瑟斯坦因的家庭錄影，但他們全部消失在那一天。片中女人在問：孩子有什麼罪過？砍了頭當球踢，只有最壞的劊子手才這麼做。如果是德國人或者俄國人這麼幹，我可以理解，波蘭人怎麼能這麼幹？

大約有二百萬的電視觀眾在電視機前看到現場，聽到這樣的證言：

他們把這些人拖到這裡殺害了，我告訴你的就是這個情景。拿一把屠夫用的刀，兇手劃開他們肚皮。拿棒子打頭，就這麼殺人。墳墓就在這裡，現在是垃圾場。一個星期還是一個月後，狗開始刨底，扒出來一根骨頭，就是人的肩胛骨。任何一個人，只要看到了大屠殺，過一百年也忘不了。完全無法想像人對人做出這種事。我想不出來，我也不願意想。

2005 年，第二部有關耶鎮的紀錄片【耶德瓦布內的遺產】（以下簡稱【耶鎮遺產】），¹⁰由導演萊沃米爾·葛蘭伯格完成。他 1951 年生於波蘭盧布林，畢業於羅茲的波蘭電影學院，1981 年移民美國。葛蘭伯格是導演、製片人和攝影師，曾獲得許多重要獎項。

這個片子的主要敘事線索是耶鎮猶太人的後代（有些人是戰前從耶鎮移民到美國等國家的）和倖存者老人到耶鎮參加 2001 年的新墓碑揭幕儀式的過程，隨著他們行程的展開，穿插了人們對戰前生活的回顧和慘案發生的情形，也記錄了猶太人來到波蘭後政府官員和本地人的反應。歷史和現實在影像中交匯，耶鎮大辯論中的各個代表性人物一一出現在螢幕上。格羅斯談到他寫《鄰人》的初衷，雅各·貝克拉比唱起家鄉的歌，鎮長 Krzysztof Godlewski 訴說他接受真相、推動轉變的心理歷程，生氣勃勃的記者安娜·比康特駕車在鄉間路上穿行，頂著偏見和誤解，堅持探索真相¹¹。

葛蘭伯格去了阿根廷、以色列等國尋找耶鎮倖存者，採訪了曾經在耶鎮生活過的猶太老人，他也請女記者比康特談她對拯救了猶太人的波蘭女性安托西亞的理解。通過這些不同的人物，過去的事件和今天的現實構成對話。慘案的後果依然存在，倖存者在故鄉無處立足：曾經的老宅被殺人者佔據，他們在猶太人的血泊裡建起自己的家居。一個猶太家庭的二十位元成員全部被燒死……這些創傷記憶在倖存者心裡從沒有消失。時任鎮長 Krzysztof Godlewski 決定要搬走代表謊言的老碑，但他被另一部分鎮民視為叛徒。然而遠道而來的猶太人代表團看到，在新的紀念碑上沒有寫出誰是兇手；他們在年輕人 Ty Rogers 的協調下，前往波蘭外交部門表達抗議。

令人深感沉重的是，當地居民對遠道而來的猶太人依然是冷漠、警覺和拒斥的。有這樣一幕，葛蘭伯格跟拍了一位移民墨西哥的猶太老太太尋找舊居，左鄰右舍都不肯告訴她老房子就在眼前。當她最後終於找到並想拍照留念時，裡面的住戶勃然大怒，把老人趕了出去。

¹⁰ 【耶鎮遺產】片長 75 分鐘，其國際交流版有英文字幕是 56 分鐘，字幕可以全文下載。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zOdb9ythfE>

¹¹ 安娜·比康特後來完成了另一本重要著作《罪行與沉默》，2018 年 10 月底剛剛出了中文簡體版。

安托西亞·維日考夫斯基的遭遇更能說明耶鎮本地人對屠殺罪行的諱莫如深。六十年過去，她還是非常恐懼，身處本地人的謊言和敵意中，她不能對記者坦然講出她曾將七位猶太人藏了兩年半的經歷。戰後，她救助猶太人的行為被人知道，她和她父親竟慘遭毒打，被罵為「猶太人的奴僕」。

影片在許多猶太人的家庭老照片疊印中結束，片尾字幕寫到：耶鎮大屠殺故事依然是波蘭基督徒和猶太人內心和精神的痛苦創傷。人們唯一的希望是：真實的歷史在我們所有人的生命中揭示自身，儘管這也許要等到幾代人之後。

九年之後，在 2014 年，耶鎮大屠殺發生七十三年周年之際，以色列導演海姆·赫特（Haim Hecht）拍攝了紀錄片【兩個穀倉】（*Two Barns*）。¹²

海姆·赫特是以色列記者，他和剪輯 Taly Golderberg 是劇本作者，【兩個穀倉】片長 61 分鐘。與前面介紹的兩部作品一脈相承的是，在這部紀錄片中，藝術家、倖存者和歷史學家們，面對激烈的爭議和反對，堅持不懈地尋找和講述真相。除了倖存者外，這部影片訪問了更多的專家、學者，其中包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詩人辛波斯卡、《鄰人》作者楊·格羅斯、加拿大的波蘭裔歷史學家楊·格拉博斯基（Jan Grabowski）、波蘭大屠殺研究中心負責人哈威·德瑞福斯博士（Havi Dreyfuss），還有受到《鄰人》啟發而拍攝的故事片【後果】（*Aftermath*）的導演達瑞茲·雅布倫斯基（Dariusz Jablonski）等；此外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大屠殺倖存者/以色列駐波蘭大使謝瓦·韋斯（Shevah Weiss）。

影片在穀倉大火的畫面中開始，格羅斯在新書發佈會上，而抗議者的詛咒聲不斷。話外音提示出一個秘密：戰後那些審訊耶鎮被告的卷宗在收入檔案時帶有一行備註：「所有這些資料三十年後燒毀」。

可能是有人忘了銷毀，六十年後，檔案落到了楊·格羅斯手裡。

片中循著耶鎮屠殺事件前後的時間線展開，通過海姆的介紹、研究者的評論和大屠殺見證者與倖存者的講述，影片以更多的細節證明了耶鎮慘案的真實性。片中採用了很多來自大屠殺紀念館（YAD-VASHE archive）檔案、

¹² 影片可見：<https://vimeo.com/104504131>

老照片和影像資料，包括證人錄音。這些都證據確鑿地揭示出：不僅是耶德瓦布內，而且，在其他村鎮也發生了同樣的慘案。血流成河，不是一句修辭；在慘案發生現場，人們不得不用沙子去掩蓋漫過地面的人血，以便通行。

影片裡還穿插了兩位樂手在耶德瓦布內各個場所演奏的畫面，小提琴和手風琴合奏的旋律在路邊飄蕩，在街頭鄰人的門前盤旋，在通向穀倉的路上迴響。時而優美時而悲愴的樂曲伴隨著故事展開，引導觀眾在黑暗的歷史隧道中思索，那是在慘案的現場：殺人犯的同夥用音樂演奏來掩蓋瀕死者的悲號。

加拿大的歷史學家楊·格拉博斯基教授也是波蘭華沙大屠殺研究中心的創始人之一，他是大屠殺倖存者之子，畢業於華沙大學。2011 年他在波蘭出版了重要著作《追捕猶太人：德國佔領時期在波蘭的背叛與謀殺》（*Hunt for the Jews: Betrayal and Murder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這也是在波蘭引起巨大爭議的書。他在書中揭示了納粹大屠殺的一種「人質機制」，那就是在波蘭人中製造恐懼，實行人質連坐。在每個社區納粹指定人選，這些人每隔幾周輪換一次。他們負責向波蘭警方或德國人通報躲藏在該鎮的猶太人，如果知情不報，人質就將受到嚴厲的懲罰。所以每個人都積極擺脫猶太人。和楊·格羅斯的《鄰人》一樣，他的這一著作被很多人認為是對波蘭形象的玷污。

在紀錄片中，格拉博斯基強調，耶鎮屠殺裡有經濟方面的因素。他認為，如果仇恨是一個人恨另一個人，那麼在耶鎮的謀殺裡，更多的是冷血謀殺，並非有多少憤怒在裡面。其中，貪欲是一個重要動力，殺死猶太人可以得到物質好處，這對窮人就夠了。而格羅斯則指出，種族滅絕中熟人暴力是一個普遍的模式。基於種族、宗教和後天培養的敵意，仇恨很容易被挑動起來，轉化為非常個人化的殘忍性。他們的評說涉及到大屠殺中人們的心理狀態，在那個歷史時期，道德失範，人們對殺猶太人不再有犯罪感；而針對猶太人的暴力一直延續到戰後。

以色列大使韋斯的故事，代表了波蘭人在戰爭中的另一真相，這是片名【兩個穀倉】的含義。戰爭開始才 4 歲的韋斯，有三年時間和家人在波蘭鄰居的閣樓、馬廄、私人祈禱室裡找到藏身之處。在耶鎮屠殺真相引爆公眾輿

論的激烈氣氛中，他就任以色列駐波蘭大使。他與波蘭總統並肩來到耶鎮，參加紀念猶太人遇難日的儀式，他也講述了自己得到救贖的故事。有位幫助過他們全家的波蘭鄰居，她不僅要防著德國人和其他鄰人，還要防自己的兒子；因為她兒子是員警，他的衣服上沾染著殺害猶太人的血跡。救助猶太人的鄰人除了冒著生命危險，還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韋斯親臨當年藏身的現場，講述了救助者的義舉。一位波蘭女人讓她 12 歲的小兒子做幫手，每天將八個人的糞便帶到河裡倒掉。多年之後，他見到了拯救了他的波蘭老人的孫子，給他過世的祖父母頒發了國際義人獎。他說：「那是黑暗中的閃光，它成為人類道德的燈塔，不能也不應該忽視這一點。」

影片最後向每個人都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你處在當時的情況下，你會怎麼樣？幾乎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的答案。格羅斯認為，這樣一種生死考驗，是不應該讓人們經歷的。如果迫使他們身臨其境，殘忍的事情必會發生。

總的來說，這幾部紀錄片把與格羅斯《鄰人》的學術對話轉化為了栩栩如生的影像敘事，讓我們從耶鎮的實景、老人的回憶裡建立起對歷史事件的知識；也讓我們進入到研究耶鎮慘案的知識份子的內心，看他們如何頂住壓力，揭秘大屠殺的真相和人性的變異。

玖、影像對話之二——死者魂靈的回歸（《沉默的共謀者》）

格羅斯的《鄰人》激起的公眾討論，在電影藝術家中也啟發了故事片的創作，這裡最有代表性的故事片是瓦迪斯瓦夫·帕西科斯基（Władysław Pasikowski）作為導演和編劇的故事片 *Aftermath*（2012），中文直譯片名應該是【後果】或【餘波】，該片入選 2014 年臺灣電影節的意譯片名為【沉默的共謀者】。

瓦迪斯瓦夫·帕西科斯基生於 1959 年 6 月 14 日，他畢業於羅茲大學文化研究專業和羅茲電影學院導演系。1991 年他完成第一部電影【逃兵】（*Kroll*），在波蘭電影節獲最佳首部電影及特別評審獎。帕西科斯基擅長講故事，他還

寫過科幻小說，得到獲獎提名。他擅長拍攝動作片和電視驚悚片，他導演的電影作品翻譯到中文圈的有【華沙諜戰】(*Jack Strong*, 2014)。此外，他也是安傑依·瓦依達著名影片【卡廷】的聯合編劇。

【沉默的共謀者】經過了幾年的醞釀，2005 年影片在申請波蘭電影研究所資助時遭到拒絕，因而在媒體上引發爭議。它最初的片名是 *Kaddish* (*Kadisz*)，意即猶太教中每日作禮拜時或為死者祈禱時唱的讚美詩。帕西科斯基說過：這個劇本最直接的靈感就是楊·格羅斯的著作《鄰人》。在媒體評論中，有人認為這部電影是因為政治原因而沒有獲得資助，片中包含了太重要的波蘭歷史資訊。儘管如此，人們都認為，必須有一部關於耶德瓦布內的波蘭電影。帕西科斯基說，耶鎮屠殺是「一個重要的主題，絕不可能不拍一部關於它的電影。就算我現在不拍，很快就會有人來拍，說不定就是美國人來拍了。」(Pakier, 2013, p. 160)。

帕西科斯基後來在波蘭著名的獨立製片人亞布龍斯基 (Dariusz Jabłoński) 那裡得到了資助。亞布龍斯基也是羅茲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他是波蘭電影獎的創始人和組織者，也是獨立電影基金會的創始人。他在 1990 年創辦了蘋果電影公司，這個公司支持和推廣了很多獨立導演的作品，也與歐洲電影界保持著活躍的交流與合作。

在前述紀錄片【兩個穀倉】裡，亞布龍斯基接受採訪說，當他拿到帕西科斯基的劇本時，他不敢相信故事有真實依據：「我認為這個劇本在某些方面是走得太遠了，然後我去找歷史學家。我說，請你們直言不諱：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劇本是不是可靠的？接著我大吃一驚，他們說：這個劇本的各個方面，你都能在某處、某個地方找到真實依據。我還得說，我從這些歷史學家那裡得到的例證比這個劇本更駭人聽聞。」他認為：必須清楚地講出這一切，不加任何掩飾。因為這種邪惡應該被認識到而且得到準確表述。

帕西科斯基如願以償，他在通俗電影類別裡駕馭了這個主題，而且獨闢蹊徑地展開故事：死者從未離去，今人面臨種種後果。過去終有和現在碰面的時刻，通過一個接一個偶然的遭遇，村莊裡人們沉默被打破，出現了探索秘密的兄弟倆。

影片開始於哥哥弗蘭尼克的返鄉之旅。他離開波蘭家鄉二十年了，連父母去世都沒有回來告別。那還是在共產主義的波蘭，他不想回家被追究，也不願意牽連家人。如今他的弟妹突然帶著兒女到芝加哥來投奔他。於是他啟程還鄉，想弄清弟弟約瑟夫是怎麼回事。

在接近村莊的一片樹林，弗蘭尼克像中了蠱一樣跑到樹林裡找東西，結果撞到樹枝上。再回到路邊時，旅行箱丟了。接著，怪事連續發生。進了家門有人砸窗戶；在咖啡館裡，弟弟被暴打。小員警告他說他弟弟約瑟夫破壞公路，村民恨不得把他搞死。兄弟倆到銀行為種地貸款，經理不給辦手續，說他們沒法證明土地是他們的。兩人說過去不是一直在這裡貸款嗎？經理說：時代變了。弗蘭尼克再跑到市裡把事情搞清楚，結果又有人找上來揍他。

從土地的權屬問題，有背景知識的觀眾已經會聯想到耶鎮屠殺的後果。接下來，弗蘭尼克終於得知，這一切和過去村裡猶太人有關係。在自家的麥地裡，弟弟約澤克搬進來 328 塊高大石碑，上面全部寫著希伯來文。約澤克告訴他，洪水過後，村民開始清理過去通往皮革廠的老路；在清理路面時發現了這些墓碑。戰爭時期，德國人毀了猶太教堂和猶太人的老墓地，把墓碑當石頭來加固路基，後來有了新路，這些石碑和老路都被遺忘了。還有村民拿這些碑來做門檻、井板，甚至用來蓋廁所……

當約澤克聽說人們還要用瀝青來平整老路時，他認為不合適。他開始把路面上暴露的墓碑收集起來，接著又從村民那裡買下來……就這樣他花了大量自己的錢，把妻子也得罪了。在他家的麥田中心，一個猶太人的墓園逐漸成形。

也可以說，沖刷路面的是記憶的洪水；它要洗刷遺忘；把被摧毀的生命故事帶回。但是，故事在這裡設置了幾個層面的衝突和翻轉。首先兄弟倆有了衝突，哥哥覺得事不關己，而弟弟則堅持他安置墓碑的人道考慮。當弟弟逐步說服哥哥時，他們遭遇了村民的集體敵視和暗中報復。最後，逐步暴露出來的真相擊倒了兄弟兩人：第一個翻轉是，他們現在的土地原來都是村裡猶太人的。不僅是他們，所有那些希伯來文墓碑上有名有姓的人都曾經是這片土地的所有者，左鄰右舍佔有了這些土地。第二個翻轉是，兄弟倆開始向

老年村民尋找答案，最後在自己河邊的老宅，挖出了遇害猶太人的遺骨：這裡的 28 戶三百多人全是被本村人殺害的。第三個翻轉是，兄弟倆終於追到了當年點燃穀倉的兇手，並把他打倒；而老傢夥爬起來咆哮著告訴他們，正是這兩兄弟的父親在穀倉另一邊放火；而且他還抓住一個他追求未得逞的姑娘，狠狠地在地上砸，砸她的頭，擰斷了她的脖子。

在象徵的意義上，兩兄弟仿佛變成死去的猶太人的重影；房子外牆被塗汙，他們被詛咒為「猶太人」；家裡的狗被大鐮刀割了腦袋；麥地裡無端起了熊熊大火。猶太人遭遇的鄰人暴力幾乎要在他們身上重演一遍。而得知父親竟是元兇之一，他們陷入了道德困境。面對自己在老宅經挖掘出來的受害人遺骨，怎麼辦？面對村民和媒體，怎麼辦？良知和親情對立，怎麼辦？而繼續保守秘密至死，又是多麼沉重的負擔！約瑟夫建議哥哥一走了之，哥哥不肯，爭執中兩人扭打起來，刀斧相向。

這是承受真相後的良心壓力，在影片中，它無法通過社會正義得到解決而走向了扭曲的自殘。無奈中弗蘭尼克踏上歸程，又被村裡的護士攔下車。他們一起來到一個舊的穀倉，推開門，出現血腥一幕：約瑟夫被綁在了穀倉的門上，如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模樣。

周圍還是那一群沉默、陰鬱的村民，其中拒絕講述真相的老人摘下了帽子，這也許象徵著冷血的解凍吧。還有片中那位允許約瑟夫將墓碑移出教堂的老神父，也代表了人性的開明和良知的湧動。片尾，一群遠道而來的猶太人的後代們在拉比的帶領下念誦 *Kadish*，這是在約瑟夫重新豎立起墓碑的田野裡。弗蘭尼克過來，點燃一盞蠟燭，沉默地放在其中一塊墓碑上。猶太人的魂靈和他們的後代，和另一個時代的鄰人的後代，在這片和平的氣氛裡重逢了。

有影評注意到，片子裡其實沒有出現任何戰爭場面，沒有穿軍服的人，也沒有猶太人的資料影像。它是從慘案的影響／後果來回溯過去的。理論上，人們可以假設罪行從未發生，全村的目擊者都可以守口如瓶。但是，正如片中人的一句話：時代變了。在無知中承繼了先人的物質和精神遺產的人，註定在此刻遭遇無知的報復，這是責任感和良心面臨的挑戰。

【沉默的共謀者】在波蘭吸引了大量的觀眾，帕西科斯基認為這就是影片的積極影響。在接受《以色列時報》採訪時，他說：「超過 30 萬人前往電影院看電影，超過 10 萬人購買了 DVD。這部電影一般都很受歡迎，它激發了對這個議題的集中思考和反省。」（Hoffman, 2013, October, 13）

右翼的民族主義者指斥它是反波蘭宣傳，惡俗操弄歷史以謀取商業利益；也有的地方影院拒絕放映。扮演弟弟約瑟夫的演員甚至收到死亡威脅，他的形象在波蘭週刊上被框在猶太星中以示嘲諷。還有批評認為，這部片子是自我指涉的，它並非關乎過去。它的藝術比擬有問題，即把今天正視歷史的人遭受的敵意與猶太人在大屠殺中的苦難混為一談了；而且片尾的烈士形象也延續了波蘭作為受害者的神話（Pfeifer, 2014, June）。

但我認為，不能架空片子的敘事內容來引申其意義。畢竟，導演選擇講述鄰人的後代的故事，這是進入歷史陰影和社會心理創傷的獨特角度。一方面他以故事片的創作自由再現了紀錄片所不可能重構的人物和場景，另一方面他也呈現了彌合創傷的可能。這是格羅斯《鄰人》的繼續，也是解決問題的開端——正如製片人所說：「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修復他們的墳墓，他們的葬身之地散見於波蘭各地的廢墟。我們修復墳墓，在那裡祈禱，請求他們原諒。」對於超過四十萬的波蘭觀眾來說，影片帶來的情感衝擊，正是重建當代社會歷史記憶的起點。

拾、代結語：進入燃燒的穀倉

格羅斯《鄰人》出版迄今已經超過十八年，2017 年才有了中譯本，我讀到去年出版的中譯本，開始注意到他的論題。中文圈裡對《鄰人》的書評並不少，不過，很少見到對這本書相關影響的延伸閱讀以及擴展研究。

我用了差不多兩個來月的時間來完成這一系列讀書（看片）筆記，相對於格羅斯的五年研究，相對於《鄰人》出版以來在波蘭國內外持續至今十八年的公眾討論，只能算是匆匆流覽了幾個重要的頁面。《鄰人》中涉及的各個方面，包括資料，十幾年來受到大屠殺研究領域各方面歷史學家的檢驗，

我還遠沒有讀完所有的批評回應。因為，我這裡寫出的感言只能算是這一系列筆記的結尾，而不能作為結論。然而，作為歷史悲劇的記錄者，我希望學習格羅斯的研究方法；作為關注轉型正義的讀者，我也覺得這本書依然很重要。

格羅斯第一次提煉了「鄰人」這個概念，使之成為一個分析範疇。它對我們理解中國當代社會的政治災難，實有普遍意義。從土改到文革，從北京大興屠殺到遍佈全國的大型武鬥……或者，僅僅只是讀一讀《炎黃春秋》上湖南道縣大屠殺倖存者周群自述¹³，還有新浪博客上王德邦有關廣西桂林武鬥回憶以及 2017 年桂林洞穴探險隊進入東山坑勘察七十多位被殺害村民的圖文《天坑—93 條人命》¹⁴就能理解，類似這種以階級鬥爭為名的鄰人滅門、滅族的血腥暴力，在中國當代政治運動中發生得實在太多，不勝枚舉。

格羅斯之後有歷史學家 Jeffrey S. Kopstein、Jason Wittenberg 擴展了「鄰人」的概念，他們用「親密暴力」(intimate violence)的概念來分析種族暴力和大屠殺，使之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科學解釋。作者將暴力的根源定位於維護大一統的國家民族統治地位的努力，而不是反猶太主義仇恨或對共產主義的報復。我們可以看到，親密暴力的概念，原來主要用於定義家庭暴力中的熟人和伴侶關係之間發生的暴力；擴展開來，可以有更大理論張力。也許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在其熟悉程度上再細分出相同又有差異性的範疇，例如鄰裡、校園、職場以及族群關係中的暴力。

在這些熟人關係之間發生的暴力，讓我們思考另一個在研究大屠殺過程中凸顯出來的問題：那就是普通人為什麼會作惡。在廣西、在湖南，把鄰裡鄉親全家滅族推下天坑的人，並非天生作惡的殺人犯。一個令人驚愕的逆轉就是倖存者周群後來再嫁的大隊書記，他自己就參與過當時的暴行。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對此不會陌生，個人、家庭和社區，也能夠在不同的政治環境和話語裡修復關係，平復創痛。正如波蘭詩人辛波斯卡的詩句——紀錄片【兩個穀倉】以此作為結束語：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¹³ 陳秉安整理，參見 <http://psce.pw/J9GGH>

¹⁴ 參見

<http://blogapp.sina.cn/html/share.d.html?vt=4&cid=169938&articleId=3c39efc70102ykb2>

戰爭 戰爭 戰爭

但是在戰爭之間有中場休息

立正——壞人

稍息——好人

立正——創造破壞

稍息——努力工作建房子

趕快搬進去

辛波斯卡 《這裡》

在辛波斯卡的詩裡，人的生命在善與惡的兩極之間流動；改變一個姿勢非常容易。但是設想一下，如果是你自己被捲入那破壞的烈焰，你平日的鄰居、朋友、社群夥伴，在某個時刻（例如西安反日遊行）突然對你暴力相向；那豈不是比外族入侵、戰爭爆發更有毀滅性，因而也更令人恐怖？這就是「普通人」包括格羅斯的《鄰人》在大屠殺研究中的理論意義。Małgorzata Pakier 博士在《歐洲大屠殺記憶建構：1989 年後的德國和波蘭電影》一書中闡明瞭這一點，她寫道：

在 1989 之後，普通人這個觀念作為有關大屠殺的話語範疇，獲得了極大的重要性。它的增長標誌著在德國和波蘭的歷史討論中有了根本變化。在德國，這一類別與美國歷史學家克裡斯多夫·白朗寧《普通人》(1992)（中譯本為《平民如何變成屠夫》，張孝鐸譯，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一書引發的對大屠殺的犯罪和責任問題的研究方法的轉變有關，同時也與另一展覽有關，這個展覽是「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 年-1944 年」（殲滅的戰爭：1941 年至 1944 年德意志國防軍的罪行），由漢堡社會研究所於 1995 年組織。在波蘭，「普通人」在大屠殺期間的負面作用這個問題首先隨著波蘭歷史學家揚·格羅斯出版《鄰人》（2000 年）而引起公眾辯論。

我在前面介紹的與《鄰人》相關的紀錄片和故事片裡，看到的都是普通人的形象。當然，普通人並不會在任何情況下變成殺人兇手；但是，人性的

脆弱和敗壞在政治環境惡劣的情況下尤為常見。在這方面，已有研究表明，煽動仇恨、製造分化並激化其對立，還有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拉大等級距離，以多數和主流人群的需要壓制和阻隔少數人群——越是在這樣的社區，越容易發生大屠殺。除此之外，對罪惡的沉默和不關心他人命運，也足以使這種惡得以暢行。這是另一個問題，也是安娜·比康特在：《罪行與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內猶太人大屠殺》一書中重點探討的，這本書也正是上個月出版了中文簡體版（季大方譯，2018）。

前述影片【沉默的共謀者】的一位影評人 Moritz Pfeifer 這樣評價了格羅斯《鄰人》的深遠影響，他說：每過幾十年，就會有一本書，它顯示出的我們思考歷史的方式發生了改變。受過霍華德·辛恩（Howard Zinn）的《人民的美國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教育的學童可能在成長過程中對美國統治者的功績比他們的父母更帶有批評傾向。同樣，波蘭兒童最有可能對他們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受害者的角色有另一種看法，如果他們是由 Jan T. Gross 的《鄰人》這本書作為指導的話。¹⁵

在波蘭，情況正是這樣。《鄰人》出版十年之後，一位行為藝術家做了《燃燒的穀倉》這個作品。2010 年 7 月 11 日，藝術家拉斐爾·貝特勒猶斯基（Rafal Betlejeski）在波蘭中部的紮瓦達（Zawada）村焚燒了一座事先建好並裝置在田野裡的穀倉。面對一千多圍觀者，他說：

十年前，在 2000 年，楊·格羅斯出版了他的著作《鄰人》，這對我來說是當頭棒喝。他讓我認識到我完全不瞭解波蘭猶太人的歷史，不瞭解他們有多少人在波蘭生活過、他們對波蘭文化的貢獻；**我也不瞭解大屠殺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不能理解大屠殺；為什麼我們不談論這些。**

拉斐爾·貝特勒猶斯基把這種無知稱為「典型的波蘭人的愚昧」，他邀請願意像他一樣與這種無知的自我告別的人將名字告訴他，由他寫在一張張白紙

¹⁵ 參見 <https://eefb.org/perspectives/wladyslaw-pasikowskis-aftermath-poklosie-2012/>

上。他帶著這些名單，進入穀倉，將這個沒有讀過《鄰人》的自我、十年前對歷史一無所知的自我徹底燒毀，從而宣示：「我，作為波蘭人、天主教徒，我有能力換位思考，即我能夠改變歷史給我的位置—那個位置是在穀倉的外面，手裡拿著火炬—將自己置身於穀倉內部。」

在澆了汽油的穀倉內，藝術家點燃穀草和白紙；整座穀倉迅即烈焰熊熊。在廣袤的田野裡，燃燒的穀倉成為一個耀眼的火炬。這是與謊言和愚昧誓不兩立的火炬，是年輕一代重新定義歷史和權利的火炬。

掩卷沉思，在掩埋了大量歷史事件的此地和依然面對謊言和壓制的此刻，作為研究者和記錄人，不能放棄努力。這是為了將來重建我們的歷史記憶，也為了那些依然沒有得到公正的亡靈。

參考書目

- 季大方譯（2018）。《罪行与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張祝馨譯（2017）。《鄰人》。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原書：Gross, J.T.[2011].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薛雍樂（2018年1月28日）。〈波蘭議會立法擬禁止指責波蘭人參與納粹屠猶，被批否認歷史〉，《澎湃》。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2173
- Cienciala, A.M.(2013). The Jedwabne massacre: Update and review. *The Polish Review*, 48(1), 49-72.
- Hoffman, J. (2013, October 13). The film Poles don't want you to watch debuts in the US. *The Times of Israel*. From
<http://www.timesofisrael.com/the-film-poles-dont-want-you-to-watch-debuts-in-the-us>
- Pakier, M.(2013).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holocaust memory: German and Polish cinema after 1989*. Peter Lang. From
<http://libgen.io/book/index.php?md5=D95CFA7B89A049DF88E161EED2DF476D>
- Pfeifer, M.(2014, June). Poles and the Holocaust. *East European Film Bulletin*,

42. From
<https://eefb.org/perspectives/wladyslaw-pasikowskis-aftermath-poklosie-2012>
Rogers, M.T., & Hundt, A.(1980). *Yedwabne: History and Memorial Book(Poland)*. From
<https://www.jewishgen.org/yizkor/jedwabne/Yedwabne.html>

思想、主義、信仰的後勤支援：
評介德布雷的媒介學與《普通媒介學教程》

唐士哲*

書 名：《普通媒介學教程》（簡體版）
作 者：雷吉斯·德布雷（陳衛星、王楊譯）
出版日期：2014 年 9 月
出 版 社：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

本文引用格式

唐士哲（2019）。〈思想、主義、信仰的後勤支援：評介德布雷的媒介學與
《普通媒介學教程》〉，《傳播、文化與政治》，9:123-134。

投稿日期：2018 年 10 月 14 日；通過日期：2019 年 5 月 8 日。

* 作者唐士哲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e-mail: telsct@ccu.edu.tw。

1916 年，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兩個學生將老師生前教授的課程講義集結成《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出版。書中高舉語言不僅是服務人意識的工具，而是人類社會互動的集體性產物、蘊含社會價值體系運作的符碼。索緒爾身後的立論影響所及不只語言學，還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但「語言學」激起當代思想漣漪的機緣卻非立論者本人，而是傳承者 Charles Bally 及 Albert Sechehaye！若非兩位弟子將教程講義編纂成書的形式發行，教程便只是塵封於某不知名圖書館的檔案夾裡零散的講稿。

不難想見一本書同樣取名為「教程」的書引發的聯想。在人文思想「向語言轉」的列車行過 20 世紀的大半後，出現了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普通媒介學教程》（*Cours de Médilogies Générale, 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4）。以思想的社會史格局，德布雷在書中大談這種立論與傳承的關係，並試圖以「媒介」概括這種關係。德布雷以「媒介學」（mediology）在人文社會學科裡另起爐灶，將媒介視作文化得以傳承（遞）（transmission）的生態系（亦參考 Debray, 1997）、一個社會後勤學的主題。即便甘冒無中生有之評，德布雷仍力陳媒介應作為一門跨領域、但獨立的探問。

壹、德布雷其人其事

集革命份子、記者、國策顧問、社會科學家、政治哲學家、藝評家與作家等多重身份於一身，德布雷是斜槓志業的先行者。1960 年代初期，德布雷就讀高等師範學校時，是路易·阿圖賽（Louis Althusser）的學生。之後他來到古巴，與卡斯楚交好，並任教於哈瓦那大學。他關於武裝革命的組織策略小冊為切·格瓦拉（Che Guevara）所採用，兩人因此開始密切接觸。1967 年時，德布雷出版《革命中的革命？拉丁美洲的武裝鬥爭與政治鬥爭》（*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Armed struggle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Latin America, 1967*），主張拉美左派的解放運動應與史達林教條主義劃清界線，並強調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揚棄政黨、階級與都市路線，由鄉村發起自主獨立

的工、農游擊戰。同年，他赴玻利維亞，加入格瓦拉的游擊隊，但在格瓦拉遭處決前不久，他被當地政府軍逮捕，遭判刑 30 年。德布雷被囚禁時曾引發跨國救援潮。除了驚動當時的教宗，西方世界公知如鄂蘭、沙特、I. F. 史東、杭士基、巴特、阿宏等人連署為他奔走請命。身繫囹圄近四年後，德布雷才被釋放。

德布雷隨後出走智利，出版了一本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總統的訪談錄，在阿葉德政權遭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的軍事政變推翻後，返回法國。1980 年代初，德布雷被密特朗總統延攬擔任外交與文化事務顧問，但幾年後因理念不合請辭。他批評密特朗表裡不一，任內的政策早已偏離標舉的社會主義路線與共和的理想。與密特朗分道揚鑣後，德布雷的公職生涯並沒有因此結束，他也曾在齊哈克政府主政時期進入法國的「國民議會」。

前半生見證拉美社會主義解放運動的衰敗，後半生的德布雷潛心研究，五十多年間的思想圍繞在馬克思主義與革命、宗教與國族主義，以及思想的媒介學等主題（Vandenberghe, 2007）。他獨創的「媒介學」無疑是標舉他近期闖蕩學術社群最鮮明的印記。德布雷的媒介創見最早出現在《當代法國的知識分子》（*le Pouvoir Intellectuel en France*, 1979/1981）中，他探討法國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思想領域出現的結構性轉變時，開始使用「媒介學」這個字眼。《普通媒介學教程》於 1991 年問世後，他號召同好，提倡媒介學應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他於 1994 年完成博士論文，論文內容集結為《媒介宣言》出版（*Media Manifestos*, 1996）。他創辦期刊《媒介學筆記》（*Cahiers de Mediologie*），集結了當時法國鑽研媒介技術主題的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如 Michel Serres、Bernhard Stiegler、Bruno Latour、Pierre Lévy 等人。每一期的《媒介學筆記》主題環繞在一個特殊的媒介物件上，發行了十八期的《媒介學筆記》陸續探討了道路、框格、紙張、腳踏車、紀念碑、音樂等主題。

在一系列以媒介為名的著作中，《普通媒介學教程》應該可以算是觸及面最廣的代表作。雖然書名為「教程」，德布雷另闢蹊徑，不談意義如何再現，而是突顯使得符號象徵得以傳遞的脈絡。索緒爾的符號學主張「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構成詮釋表意行動的二元模型，但德布雷

批評符號學忽略了構成表意關係成立的關鍵第三方——即表意行動發生的物質環境。而「媒介」一詞，便成為串起符號象徵與物質環境的關鍵中介場域。

貳、作為探索「傳承」的媒介學

媒介學關切的既非有形有體的「傳播媒介」，也不是窄義的、以人傳遞訊息為主的「傳播」或「溝通」行為，而是任何在意義生產的黑盒子裡，介於輸入與輸出之間的環境（milieu; Debray, 1997, p. 7）。對於歷史過程以及技術物件的看重，使得德布雷區分了「傳播」（communication）與「傳承」（transmission，或譯「傳遞」）的差異。¹德布雷認為傳統的傳播研究著重於可見的媒介傳播如何處理訊息在短時間內於空間的移動，但這僅是「長期過程中的瞬間和廣泛集合體中的片斷。」（Debray, 2000／劉文玲譯，2014，頁5）。訊息除了透過媒介在空間中傳遞，也在時間的流逝中傳承下來，沈澱為意義、文化，可是這層意涵卻始終為目光短淺的傳播研究忽略。因此，他疾呼研究意義傳承的重要性。

傳承涵蓋甚廣，可以展現在所有表現集體記憶的事物，是屬於歷史範疇的。以技術性能為出發點，傳承同時探索連結的空間與時間意涵：這裡與那裡的連結形成網絡，構成了「社會」；而過去的與現在的連結則是延續成為「文化」。因此，傳承的問題，也是文化的問題。傳播只是傳承的一個面向、一個短暫的命題。但傳播與傳承互為表裡，傳承得以持續不中斷，先決點仍是倚靠特定的傳播技術或行為，就像福音教義散布的前提是耶穌與弟子的談話，以及他的傳道過程中、面對異端邪說的指責時的回應。但耶穌基督的話語是一時的，話語成了福音則是因為訊息的傳承得到了制度性的庇護（institutional housing; Debray, 1997, pp.10-11）。

當關於媒介的探問由傳播移轉至傳承（但同時也包含傳播），由製造或接收訊息的個體轉移至個體間連結關係的時間與空間脈絡，德布雷得以擴展

¹ 參考德布雷的另一本中譯著作《媒介學引論》（*Introduction à la médiologie*，劉文玲譯）。該書中，譯者劉文玲將 transmission 統譯為「傳承」，藉此詞的歷史指涉與「傳播」（communication）有所區隔。

媒介學的探討範圍。引發他好奇的不是訊息的內容本身，而是訊息得以被傳遞，乃至產生集體的凝聚力，其背後的一系列物質性過程。德布雷關切的核心問題是：**思想在什麼條件下產生物質的力量？**

德布雷將生態學方法的規則，用於觀察思想的傳遞過程。他認為觀念不應被當作事物看待，觀念猶如生物機體，無法獨自存在，總是與一個群體的生存環境相連。因此，媒介學想要研究象徵現象與物質技術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6，頁 61）。兩千多年以前那撒勒人如何成為今日被頂禮膜拜的耶穌基督？巴哈的音樂如何歷久彌新？這其中牽涉到種種傳承的手段。當想法成為主義或信仰，其耀眼的光暈讓人忽視這些歷史過程，但即便如此，所謂超越物質或肉身的精神，只有透過文化物件才能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其傳世的蹤跡。

因此德布雷主張：精神世界裡沒有身後的世界，有的只是制度的總和（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6，頁 61）。思想（宗教的、政治的）要在空間裡傳播，以及代代傳承，靠的不是內涵本身，而是一整套技術配件、傳遞路徑，以及人為制度建立搭配產生的結果。親炙言教身教的使徒屈指可數，但觀念的爆發性擴散，往往倚賴並沒有承載觀念的其他實體：裹尸布、篆刻經文的石板、墓誌銘、紀念碑、教堂裡一扇彩繪玻璃窗，乃至廣場上人手一冊的小紅本子，這些象徵物件，是肉身滅亡後，意識復活或存續的物質性痕跡。換句話說，一個思想活動無法同紀錄、傳遞和儲存的技術條件分開。觀念不是獨立存在的事物，而是透過物件產生的關係，總是和環境相連（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6，頁 266）。

構成觀念具備號召力的物質條件，同時結合了兩個相輔相成的因素：其一是「組織化的材料」(organized matter)，其二是「物質化的組織」(materialized organization)。

「組織化的材料」是將精神物質化的工具，調和了語意的模式（使用的符號型態是文本、影像或聲音）；傳輸、播放或導引的型態（線性、輻射、鍊結或網絡化）；物質基礎（石頭，木材，莎草、紙張或電波）、交通手段（人或訊息是透過道路、車輛，或特定基礎設施，範圍較大的體系或產業等）（Debray, 1997, p.12）。透過不同的組合方式，組織化的材料是觀念或思想的

載體，它們發揮的影響力，甚至遠大於內容。

「物質化的組織」則是上述這些因素的串連與部屬。例如教會作為宗教的組織，連結了教堂、印刷聖經出版、神學研究組織、慈善團體等常態性活動。「啟蒙」作為歐洲近代思想體系，建立了新的理性秩序，但啟蒙算不上是政治思想的集合，而是產生於舊的社會慣例與新的措施碰撞後產生的新界面上（Debray, 2000／劉文玲譯，2014，頁 174）。而馬克思的思想能夠啟發二十世紀的共產革命，就無法不去注意到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工人教育的三個基石：免費的學校教育、大量生產的書籍，以及便宜的報紙。透過組織的網絡化與部屬，宗教、思想、主義等「精神性活動」才能夠在不同的世代之間傳承，以及在空間上達到擴散的效應（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6，頁 298-330）。

上述這兩個因素的調和，構成了德布雷所稱的「媒介域」(mediasphere)。相應於每一個觀念的普及與傳承，是環繞這個觀念所形成的「媒介域」。它是一個信息和人的傳遞與傳輸環境，包括與其相應的知識加工方法和擴散方法。每個媒介域都是已有作法和新工具相互妥協的結果，並嵌入不同時代的技術網絡。每個媒介域同時也對應一個時、空組合的現實（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6，頁 261）。

一如技術決定論者慣有的、以紀元劃分歷史中社會型構的作法，德布雷區分了三個不同時期的媒介域，分別是邏各斯域（logosphere）、書寫域（graphosphere）與影像域（videosphere），分別以書寫、印刷、與電化的視聽媒介為核心。與技術論的形式主義者如尹尼斯、麥克魯漢、基德勒等人不同的是，德布雷更在意由特定的思想建制如宗教、主義檢視媒介技術所中介的社會過程。他的媒介域形同拉圖（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絡」（actor network），是承載與傳遞訊息或人的中間地帶、環境或背景，媒介技術僅止於提供特定社會文化型態成為霸權的關鍵物質條件，而非單一成因。一如谷騰堡的活版印刷術並無法單獨塑造西歐自十五世紀以後的變化，但隨著印刷術而來的出版量激增、書籍的普及，以及大眾的識讀能力提昇，則使得活版印刷加入已然量產的木漿紙張、純熟的書籍線裝技術，以及隨後的蒸氣驅動滾筒印刷，成為特定組織或文化型態得以崛起、觀念得以擅場的主要誘因。

參、由「媒介域」體察宗教的世俗性與世俗的宗教性

在德布雷的媒介域分析中，信仰儼然提供一個檢視思想如何在媒介域中運作的絕佳範例。德布雷分別由耶穌基督與卡爾·馬克思，突顯思想傳承的物質力量，如何協助思想在媒介域的歷時場景轉換間竄升、延續或式微。基督精神的靈光（aura）既遠且近，千年以來啟發藝術世界透過筆觸、線條、雕工將其獨一性更往「人性」的身影拉近（Benjamin, 1936／許綺玲譯，1999）。馬克思曾經視宗教為人民精神生活的鴉片，宗教的苦難既是人們現實生活中苦難的表現，也是對這種苦難的抗議。然而馬克思思想一如基督教教義，透過歷史傳承，都成了後世追隨者的「信仰」。

以耶穌基督信仰為例，數千年的傳承見證了信仰的制度化由邏各斯域邁向書寫域的演進。基督信仰必須擺在猶太世界的歷史長流中，方能窺其堂奧。

德布雷以猶太教為例，說明信仰世界中一神論宗教的形成，對應的是人在特定地域環境之下的生活經驗。猶太教義裡的神超越了人體的形象，成了「超驗」的上帝，其實與沙漠中游牧民族的生活體驗習習相關：亞伯拉罕的子子孫孫們，世代過著資源匱乏、不斷遷徙的游牧生活，當生存面臨危機，互助共生的父系體制、財產共有於焉而生。對於在極度乾旱的地理空間裡討生活的猶太人而言，頻繁的遷徙與逃難使得信仰生活具備高度的機動性，信仰生活中沈重的祭壇建築或偶像雕塑對於帳篷的游牧者來說只是累贅（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6，頁 280-288）。惡劣的生存條件下，銘刻的十誡與一只抬得走的約櫃，成了耶和華交付信仰子民們世代信守的契約。戒律用字儉省，但蘊含寓意無窮的神秘文本之鑰，等待先知、聖者與博學之士開啟。「一神教就是以最小的神學體積獲取最大的移動速度。」（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6，頁 283）日後透過先知口述立法、講道、編纂經文、法典等口語與書寫文本手段，猶太教信仰得以在荒漠裡傳承下來。耶和華信仰在時間的歷程中，透過不同形式的媒介化，終究逐漸固化、厚重。

耶和華信仰超越封閉的沙漠，成為普世的基督宗教，則起始於一個肉身媒介：後猶太教宗派的創始者、號稱是救世主降臨的那撒勒人耶穌。在沒有

更動舊約內容的基礎上，耶穌透過講道、肉身殉道，以及復活的神蹟，感召了基督信仰的第一批使徒，他們同樣因使用口語、散布當時被認為的異端邪說而受到極刑的試煉，但一如耶穌基督，使徒殉道成了福音最具渲染力的宣傳媒介。基督思想得以廣為傳佈，得力於佈道——生活化的故事、寓言，以及使徒們往來的書信。沒有詰屈聱牙的神學辯證，福音運用淺顯易懂的口語故事，迅速感召了社會上最底層的貧民、手工業者、女性與移民，向弱勢階級打開了通往天堂的道路。而公元四世紀時出現了裝訂的手抄聖經，則普及了上帝的話語，且使得新約終究擺脫零散的手卷，取得了像舊約一般銘刻的象徵性權威（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6，頁 143-156）。

基督教傳承的歷史，成為德布雷不同著作中檢視的範例，正如在《教程》中強調的，這個宗教的成功，在於它展現了傳播的共同體功能。人類偉大的信仰產品，通常都是拓展集體組織的手段和工具。如果基督教的擴張足跡，有著令人讚嘆的宣教歷程，這個以教會為信仰核心的宗教，也陸續繁衍出幫助訊息擴散活動的機構、組織，以及等級化的權力制度，包括梵蒂岡、各級教會、修院、大學、醫院、救濟組織、慈善會等，層層交疊的組織化安排成了上帝與俗世之間維繫信仰的「溝通界面」，透過這個層級分明的勢力，基督思想可以擴散、流傳。猶如教宗穿梭於不同的國度之間，成為國際政治壇坫週旋不可或缺的勢力，「基督教正是通過在表面上完全的非政治化才能追求一個完全的政治化，即對全世界的傳教征服」（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6，頁 152）。

猶如天主教會成為一個等級化的權力制度，是對應到其發展出來的媒介域裡特殊的工具、傳播渠道、象徵與制度化機構，同樣啟發精神的物質環境安排，也見諸於 19 世紀共產主義的興起。德布雷指出：「一個「主義」不只是論題和信念的一個實體。而是一個生活環境、一個安全的掩蔽所、一個互助和社會保護的家庭」（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6，頁 162）。馬克思的共產思想成為主義，乃至成為德布雷口中的「宗教」，倚靠的也正是十九世紀發達的書寫域：免費的學校、人人有書讀，以及便宜的報紙——這些因素成為散播工人階級意識的鐵三角。這其中特別是免費的報紙，同時扮演了宣傳者、集體煽動者，以及組織者的角色。就像列寧透過《火星報》為

黨播種，左派思想得以生根散布，發生在這個報紙大眾化的偉大世紀（頁324）。透過有主張的日報，政黨成為一個社團自我思考的場所，也正是這個每天定時跟讀者交流的閱讀工具，一種思想得以日復一日地被社會化。

社會主義思想於 20 世紀的沒落，也正起因於媒介域的汰換。德布雷為這個週期的衰退提供一個確切的事件：1968 年的「五月事件」，他認為從此之後，「書寫域」被「圖像域」取代。隨著通訊與傳播媒體的便利，個人關係的領域被擴大，也更加私有化。作為主義號召整體人群的文化後勤以及思想轉化、擴散的媒介生態，已隨著書寫域的式微而不復返。德布雷主張要重振思想，就必須思考如何介入思想得以傳遞、散佈的圖像域。

肆、「傳承」作為媒介生態的動力學

德布雷主張媒介不是傳播的附屬品，媒介研究不應只是電視、廣播、電話、或是網際網路等技術主體的研究，任何一個時空背景下的傳播不能沒有媒介，媒介學是含納這些傳播技術如何傳遞訊息、但範圍更廣泛的思想後勤學。

如果要以化約的「定義」濃縮德布雷龐雜的、猶如百科全書風格的思想史考察，媒介學關切思想傳遞的三個中介層次，分別是技術、文化與社會，透過這三個層次的交糅，思想得以擴散、傳承。人說了話、一些人記了下來並複誦、轉傳，再有一些人轉化為文字或圖像紀錄儲存下來，這些紀錄日後被複誦、複製、詮釋、整理、檔案化，乃至衍生出詮釋的社群，透過社群成員跨越不同世代間的複誦、再製與辯證，累積成文化。對德布雷來說，思想總是對應到特定的物質起源或過程，即便技術或科技在傳承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德布雷小心不掉入形式的決定論陷阱，亦即在單一技術形式上膨脹其打造或影響整體社會形態的主控角色。在德布雷對這三個層次的共構分析下，媒介成了一跨越時空的整體性的生態，對於中介各方社群成員過程的描繪，使得媒介學分析成了突顯思想傳承生態的動力學。

德布雷強調歷史的重要性，正是實證導向的傳播研究裡始終失落的一塊

拼圖。如果「傳承」這個字眼所提示的傳播研究的技術與歷史意涵至關緊要，它無疑在「傳播與社會變遷」這個主題上，與過往傳播社會學的功能論思維分道揚鑣、另闢蹊徑（見 McQuail, 1983）。回顧過往的傳播理論進程，不論是發展理論或者是依賴理論，分析傳播活動與社會之間的交互作用，研究往往聚焦在微觀的個別受眾與共時性的行為趨勢上。功能論假設受眾對於大眾媒介有依賴性，因此當代人類社會要圖轉型與發展，媒介提供大量、有用的訊息便成為必要的條件。換句話說，功能論將當代的大眾媒介嵌入整體社會系統中，媒介的價值是「有用」。

但功能論的思維正是媒介生態變遷下的產物，其本身跳脫不出目的論的眼界。十九世紀以來，大眾化媒介如報紙、廣播、電視與電影的出現，大大擴增了人類的傳播活動的範圍與複雜性，也使得這個組織化的建制被當成國族國家政體下的一個社會進步的推進器，因此，發展主義將傳播媒介的建制化，當成衡量社會進步的普世標準。然而，猶如傳播史學者尹尼斯（Harold Innis）所言，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執著於一時的社會變遷，是犯了「只看當前」（present-mindedness）的毛病（Innis, 1935/1995）。文化即是關切個人透過時間與空間評估問題的能力，也賦予人在對的時機採取對的步驟（Innis, 1951/1984, pp.85-86）。人類使用技術傳遞訊息，解決生活問題、凝聚共識，乃至鞏固特定的權力體制，是一個與文明狀態相生相息的課題。傳播實證研究為一時的社會之所需服務，卻往往忽略了文化與技術。前者是歷時性的積累產物、代代相傳，後者則現身於人類生活中每一種創造性的意識活動過程裡。媒介是意義的載體，透過媒介記載、保存與傳遞，文化底蘊方得以顯露。如果我們承認這也是傳播的課題，媒介研究的幅員本該何其之廣闊！

德布雷的媒介學既不囿限於一時，也意圖打破人／物的主、客體界線。人類學家牟斯（Marcel Mauss）主張精神與物質是所有事物的一體兩面。牟斯發現電影發明以後，美國電影裡女主角曼妙的姿勢也開始影響法國女人上街時的走路姿態。身體機能有其社會性，簡單如走路或使用圓鋤挖掘壕溝，都有文化規範的痕跡。因此，「沒有技術或傳遞能在傳統缺席底下為之」（Mauss, 1935/1973）。在德布雷的宗教社會史分析裡，先知、使徒、殉道者與傳道者正是以身體為媒介技術，而殉道正是傳承。人的身體既是器具也是

技術，「身體的技術」正彰顯了物質與精神、或意識與官能、自然與人文並非截然二份，而是互有連通。「傳承」由宗教的社會史獲得啟發，其打破意識或思想的「人本」框框，著重傳遞過程的物質條件以及因為傳遞產生的社會連結。因此，德布雷也將「transmission」這個字眼多義化為訊息的傳遞（神諭、基因）、病毒的傳染，猶如德布雷自承深受其影響的哲學家米榭·賽荷（Michel Serres）所示（見 Debray, 1997 第三章的討論）。

德布雷在教程中的第十講〈一個公民媒介學提議〉中指出，在當前由圖像域主宰的年代裡，人類歷史首次出現觀念和表現的流通直接控制了觀念的生產。自由社會中媒介輿論的生產，已超出任何政治審查可以管控的範圍。當政治不再是媒介的主人，媒介反倒是成了決定政治的因素。德布雷認為在口語、文字溝通主導的「邏各斯域」（logosphere）時期裡，上帝的權威建立在其不可見上，然而到了今日的圖像域，權威的建立已經被可見性所取代。也因此，對佔據統治地位的觀念和表現的批判不能再只是一個意識形態批判，而是對支配觀念和表現的機構的批判。德布雷的公民媒介學芻議，因此定位在傳遞技術、象徵功能與統治方式標準三者相互依存的集合。相較於布迪厄仍舊堅持以一個文人場域的自律性，為知識份子作為思想典律的權威地位辯護，並因此厲色譴責電視縱容的「速思」（fast thinking）、「能見度」對知識狀態造成的象徵暴力（見 Bourdieu, 1996／林志明譯，2002），德布雷反倒主張應該順應媒介域的不可逆，利用佔統治地位的媒介其特定的傳遞優勢創造新型態的媒體民主。

德布雷主張一個主權系統的運作，同時包括象徵持有者、政治控制者，以及團體，這三者透過媒介產生連結。以當代社會來說，象徵權力持有者扮演將私人信念公眾化的角色，代表人物是知識分子。政治權力的持有者則扮演將公共信念私人化的角色，以政治政權與資本勢力為代表。前者關切公開，而後者則在乎私有化。兩方的肉搏戰中，媒介變成了樞紐，媒介將思想行為轉變成政治操作，也將政治權力轉變成知識操縱手，透過媒介作為兩方交會的節點，共同指向一個目標，即作為被統治者的公民。在突顯媒介學作為思想、主義、信仰傳承、傳播的後勤學之餘，德布雷對於檯面上的「實體媒介組織」該如何增益知識信念的公眾化與保障公民的權力，著墨不多，但

《教程》末了這段話語的剴切疾呼，聊以作為德布雷的媒介／政治立場表態 (Debray, 1991／陳衛星、王楊譯，2016，頁 416)：

共同空間的國家管理不應該向任何個體利益或狂熱讓步，否則將自我毀滅，誰都不能作自我利益的仲裁人。

參考書目

- 林志明譯 (2002)。《布赫迪厄論電視》。台北：麥田。(原作：Bourdieu, P. [1996]. *Sur la télévision suivi de L'Emprise du journalisme*. Paris, FR: Liber-Raisons d'Agir)
- 許綺玲譯 (1999)。《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原作：Benjamin, W. [2007/1968]. *Illuminations*. London, UK: Schocken Book)
- 陳衛星、王楊譯 (2014)。《普通媒介學教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原作：Debray, R. [1991]. *Cours de Médologies Générale*. Paris, FR: Gallimard.)
- 劉文玲譯 (2014)。《媒介學引論》。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原作：Debray, R. [2000]. *Introduction à la médiologie*. Paris, FR: PUF.)
- Bourdieu, P. (1998). *On television and journalism*. London, UK: Pluto.
- Debray, R. (1997). *Transmitting cultur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ebray, R. (1996). *Media manifestos*. New York, NY: Verso.
- Debray, R. (1979/1981). *Le pouvoir intellectuel en France*. Paris, FR: Rams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UK: New Left Books.)
- Debray, R. (1967).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Armed struggle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NY: Grove Press).
- Innis, H. A. (1951/1984).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C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Innis, H. A. (1935/1995). The role of social scientist. In D. Drache (ed.), *Staples, markets, and cultural change* (pp. 429-437).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Mauss, M. (1973). The techniques of the body. *Economy and Society*, 2(1), 70-88.
- McQuail, D. (1983).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K: Sage.
- Vandenbergh, F. (2007). Regis Debray and mediation studies, or how does an idea become a material force? *Thesis Eleven*, 89, 23-42.

訂 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Lihyun L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 (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 (or US\$10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Research Articles in general

- A Fake News of Taiwan's Martial Law Period:
Nanhai Blood Letter
-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ism of patriotic online celebrity" and its implication in China: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Zhou Xiaoping' s papers

Research Notes

- The Research Trends of Nationalism in Digital Era:
In the Cases of Academic Journals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ast and Present

- Neighbor homicid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ook Review

- The review of Régis Debray' s mediology and his book 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

Academic translation

- Othering the European Union through constructing moral panics over
'im/migrant(s)' in the coverage of migration in three British newspapers, 2011-2016